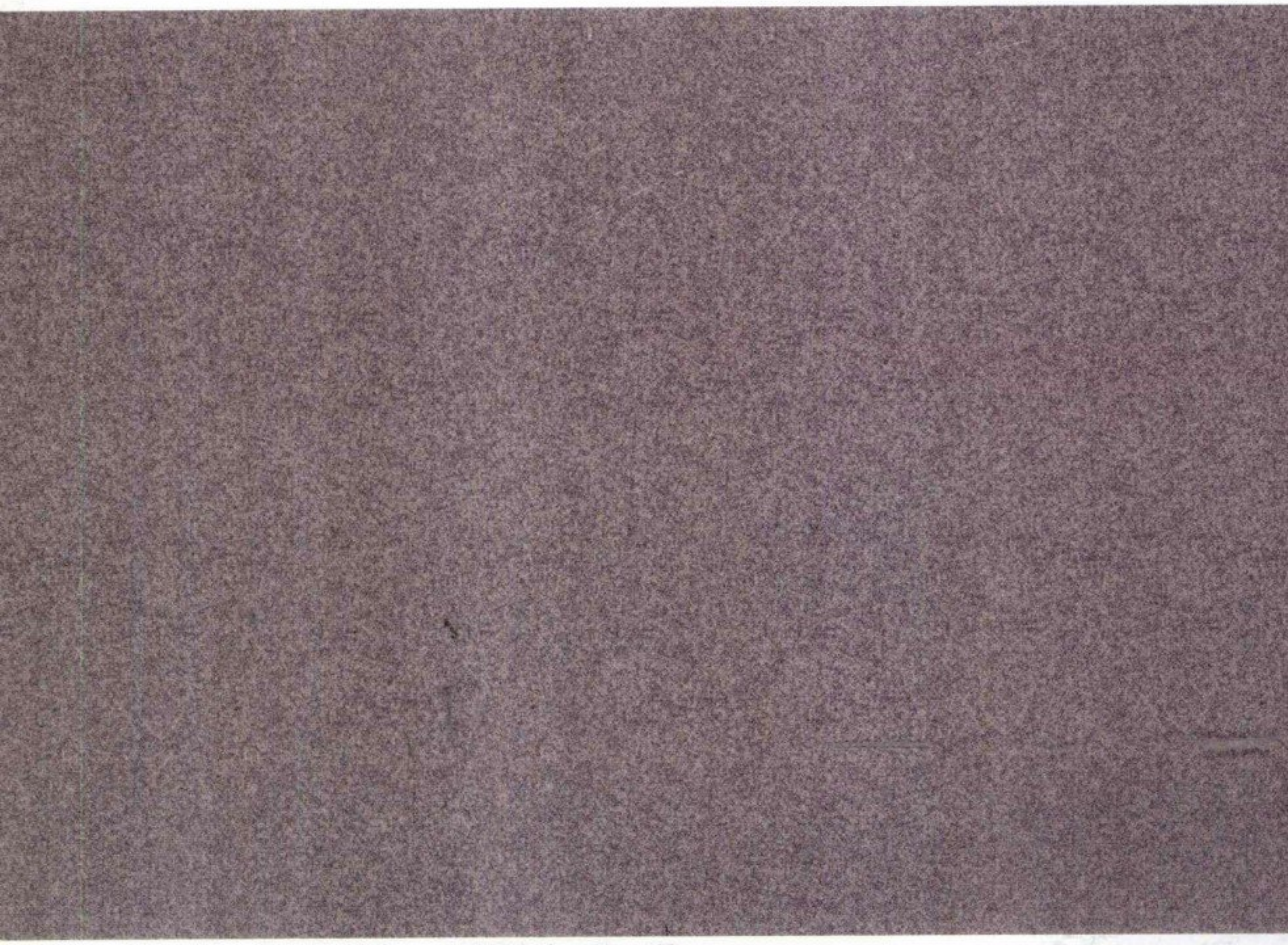
葛剑雄 著

人文千秋

陈平原 主编
文书系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姜　华　郑越文　　封面设计　孙　曙

上架建议：人文社科

ISBN 978-7-309-08745-1

9 787309 087451 >

定价：20.00元

www.fudanpress.com

人文千秋

葛剑雄 著

书系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千秋/葛剑雄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5
(人文书系)
ISBN 978-7-309-08745-1

Ⅰ. 人… Ⅱ. 葛… Ⅲ. 人文科学-文集 Ⅳ.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0257 号

本书原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三联人文书系"之一种,以书名《人文千秋》出版,现经原出版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人文千秋
葛剑雄 著
责任编辑/姜 华 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字数 137 千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745-1/C·232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老北大有门课程，专教“学术文”。在设计者心目中，同属文章，可以是天马行空的“文艺文”，也可以是步步为营的“学术文”，各有其规矩，也各有其韵味。所有的“满腹经纶”，一旦落在纸上，就可能或已经是“另一种文章”了。记得章学诚说过：“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我略加发挥：不仅“良史”，所有治人文学的，大概都应该工于文。

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另外，学问中还要有“文”——起码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学问”与“文章”之间的巨大鸿沟。胡适曾提及清人崔述读书从韩柳文入手，最后成为一代学者；而历史学家钱穆，早年也花了很大工夫学习韩愈文章。有此“童子功”的学者，对历史资料的解读会别有会心，更不要说对自己文章的刻意经营了。当然，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是无一定之规，今人著述，尽可别立新宗，不见得非追韩摹柳不可。

钱穆曾提醒学生余英时：“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我相信，此乃老一辈学者的共同追求。不仅思虑“说什么”，还在斟酌“怎么说”，故其著书立说，“学问”之外，还有“文章”。当然，这里所说的“文章”，并非满纸“落

霞秋水”，而是追求布局合理、笔墨简洁、论证严密；行有余力，方才不动声色地来点“高难度动作表演”。

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专著”不同，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迭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前年撰一《怀念“小书”》的短文，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外行人以为，书写得那么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其实，有时并非工夫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只是风气已然形成，身为专家学者，没有四五十万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类似的抱怨，我在好多场合及文章中提及，也招来一些掌声或讥讽。那天港岛聚会，跟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陈翠玲偶然谈起，没想到她当场拍板，要求我“坐而言，起而行”，替他们主编一套“小而可贵”的丛书。为何对方反应如此神速？原来香港三联书店向有出版大师、名家“小作”的传统，他们现正想为书店创立六十周年再筹划一套此类丛书，而我竟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

记得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锺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实在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像这样“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书，现在越来越少。既然如此，何不尝试一下？

早年醉心散文，后以民间文学研究著称的钟敬文，晚

年有一妙语："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如此自嘲，是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标"驱赶下拼命赶工的现代学者，悠着点，慢工方能出细活。我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或许，对于一个成熟的学者来说，三五篇代表性论文，确能体现其学术上的志趣与风貌；而对于读者来说，经由十万字左右的文章，进入某一专业课题，看高手如何"翻云覆雨"，也是一种乐趣。

与其兴师动众，组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经由一番认真的提名与票选，得到一张左右支绌的"英雄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以他的眼光、趣味与人脉，勾勒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某一侧影。若天遂人愿，旧雨新知不断加盟，衣食父母继续捧场，丛书能延续较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图景"会日渐完善的。

最后，有三点技术性的说明：第一，作者不限东西南北，只求以汉语写作；第二，学科不论古今中外，目前仅限于人文学；第三，不敢有年龄歧视，但以中年为主——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历史原因，选择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者。这三点，也是为了配合出版机构的宏愿。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

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小序



以往平原兄约我编书，有过愉快的合作。此次平原兄邀我加入香港三联书店“三联人文书系”计划，我自然欣然应命。差不多同时，李辉兄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三十年集”，将我列入名单，义不容辞，我也答应了。待到在计算机前检索旧稿时，方才发现这两套书都是以“三十年”为选辑的范围，并且都要求以本人有代表性的学术性文字为主。

其实，对我们这一代学人来说，“三十年”几乎就是学术生命的全部。我是过了而立之年才从中学进入大学，中学毕业后当中学教师十多年后才有机会读研究生。到一九七九年方将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印刷品，一九八〇年方使自己的名字成为学术刊物上的作者。“三十年集”等于是自己全面的选集，要同时编两种颇使我为难。好在两种书的宗旨和篇幅稍有不同，经过考虑，我总算理出一个头绪，确定了并行不悖的选编办法——“三十年集”自一九八〇年—二〇〇九年，每年选一篇，以学术论文为主，兼及其他，如回忆、评论等，自一九七八年起每年都有“纪事”一项，全面反映三十年来的学术和人生，近三十万字。“三联人文”也以时间为序，只选个人学术专著所涉领域以外的学术文章，以十万余字为限。两书所选各异，无一

重复。

在以往三十余年间，我在人口史、移民史、统一和分裂、历史疆域、地图测绘、环境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通过若干专著或普及性学术著作发表。本书所选，都是在这些专著之外的。除学术方面外，还涉及教育、信仰等社会问题，但也是从学术视角出发的，自问符合“最能体现自家学术心得及贡献”，“有较大的接受面”的编撰体例。

本书名为《人文千秋》，一方面是呼应“人文”书系，另一方面，考虑所收文字涉及的范围基本属历史人文地理。在“人文”后加上“千秋”二字，说明这些都属历史，都属过去。即使所议社会问题发生在今天，其实都是从遥远的过去演变而来的。取这个书名，也源于一段往事。二〇〇六年秋，我随“重走玄奘路”的车队翻越天山，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经过伊塞克湖（唐代热海）、碎叶城遗址、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唐大宛都督府）、撒马尔罕（唐康居都督府）、唐代铁门关，进入阿富汗，翻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喀布尔（唐细柳州），沿喀布尔河而下，越过开伯尔山口。一路所经，都曾是唐朝的疆域，如今早已是异族异国，当年的赫赫武功和恢宏建制已难觅踪影。感慨之余，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惟有人文足千秋》。

这些文章都是公开发表过的，遵编撰体例，均于文末注明原刊的名称和时间。除纠正了个别错、漏以外，未作修改，以存本来面目。

所编“著述年表”，按年收集了已发表专著、论文集、随笔集、杂文集、时评集、译书，但为节约篇幅，未列入所编书。

辛卯年元宵于浦东寓所

目录

总序 / 1

小序 / 1

“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的代名词 / 1
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 / 13
历史人才分布研究二题 / 29
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
——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 / 37
就事论事与不就事论事
——我看《怀柔远人》之争 / 49
教育问题之我见 / 59
我的人文和科学观 / 75
新版世界地图引发的争议
——《苹果里的五角星——〈系列世界地图〉诞生纪实》序 / 95
科举制度：存废皆有理 / 101
尊重历史，立足现实 / 105
评《1421：中国发现世界》
——兼论真实史料的重要性 / 113

迁徙的姓氏：追寻移民的脚步 / 125
从历史地理看长时段环境变迁 / 137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学术国际化 / 147
中国人的信仰 / 157
城市品性 / 165

作者简介 / 175
著述年表 / 176

人文千秋

“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的代名词

近年来，“炎黄子孙”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已经由文人学者扩大到社会各界，由诗歌小说扩大到报刊上各类文章，甚至已进入党政领导人的正式言论和官方文件，似乎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同义词，而且大有取代这两个词的势头。与此同时，修整炎帝、黄帝的陵墓，举行隆重的祭典，颂扬炎黄二帝的文字，表达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人如何崇仰炎黄二帝的报道也大量涌现。原因很简单，据说炎帝和黄帝是我们的两位共同祖先，当然也应该是台湾、港澳以及世界上一切华人、华裔的共同祖先。既然十多亿中国人和华裔都是同一血统，似乎就理应是一家人了。人们以为提炎黄子孙就能促进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至少能增进共同的感情。

但是，良好的愿望不能改变历史事实和国内外的现状，滥用炎黄子孙的提法更会造成不良后果，恰恰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首先，这种提法不符合华夏（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了解，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商文化的遗址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夏文化遗址虽然已有了发现的报道，但还有待于科学的鉴定和深入的研究，比夏代更早的炎帝黄帝时代目前还找不到任何物证。根据现有的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知识分析，炎黄二帝至多只是当时很多部落首领中的两位，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自然是有限的。

即使仅从文字记载看，也明确地说明了这只是一种传

说，绝不是确切的历史记录。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结尾不得不感叹："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面对各种各样的传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大史学家最后也不得不取了《春秋》、《国语》的说法，而"弗深考"，不再仔细考查事实究竟如何。

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这两位老祖宗原来是一对冤家。炎帝是天子，但实力衰退，统治不了诸侯；而黄帝却文武兼资，争取到了诸侯的支持，又动用了豺狼虎豹，与炎帝大战三次，将他彻底打败，自己做了天子。炎帝甘拜下风，成了黄帝的属臣，这两个部落也合二为一了。但《史记》和其他史书都提到了炎黄二帝曾争取、统治过的诸侯，除非这众多诸侯的子孙后代都跑到地球的其他地方去了，或者统统断子绝孙，否则今天的中国人总该有一部分是他们的后代啊！

退一步说，即使早期的华夏族的成员都是炎黄的后代，那么史书上也还记载了大量非华夏部族的存在。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数千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可分为多种类型。近年来在长江流域、东北地区等地的考古新发现更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直到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还有不少非华夏的部族，更不用说在中原以外。这些部族只有少数迁移出了今天中国的范围，而大多数都逐渐融合在华夏族之中了。可以说，到秦始皇统一时的华夏族就已经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了。

华夏即东汉以后的汉族，在融合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虽然也少不了残暴的压力和血腥的武力，但历来有一种积极的传统，那就是并不注重血统关系。任何异族只要接受华夏（汉）族文化，与华夏（汉）族认同，就可以成为汉族的一员。对异族的杰出人物，只要能为本族效力，统治者

就会委以重任。移居到华夏（汉）族地区的其他民族，只要不违犯法令，不与当地居民有利害冲突，一般不会受到强制同化的压力。所以虽然历史上汉族同其他民族间的战争和冲突相当频繁，但在汉族内部或汉族聚居区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清查血统一类的行动。西汉时的金日磾是被灭亡的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却以“外国人”（金自称）的身份担任了接受武帝遗诏辅佐昭帝的顾命大臣，子孙成为西汉后期有声望的大族。对此，当时和以后任何最正统的汉族史学家也从未表示过不满或怀疑，这足以反映汉族对异族的接纳标准只视其“归化”的程度。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不受到歧视和迫害，因而长期保持着本民族的特性，为生存而抗争；唯独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却长期过着和平生活，以至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心态，终于融入了汉族。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自秦汉以来，从北方进入黄河中下游的非汉族至少有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羯、丁零、突厥、高丽、回纥（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等，还有阿拉伯、波斯、日本、东南亚、黑非洲等各族的人口，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陆续加入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融合在汉族之中了。在南方，随着汉族的不断南迁，原来人数众多且族种庞杂的蛮、夷、越、僰、僚等等各族，有的已经完全消失，有的虽还作为一个民族存在，却已经缩到比原来小得多的地域，而今天南方各省区的汉人大多是他们的子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今天九亿八千多万汉人（一九八七年抽样调查数）中，地道的“炎黄子孙”反而是“少数民族”。即使是汉族，如果只认炎帝、黄帝这两位祖先也对不起自己真正的祖宗。

其次，这种提法不符合今天中华民族的实际。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汉族之外

的五十五个民族约有八千六百万人口（一九八七年抽样调查数）。其中有的民族，尽管根据汉族的文献记载多少能和炎黄二帝及其后裔扯得上一点关系，实际上却往往是古代大汉族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臆断，并无科学根据。有的民族，如藏族，历史上虽也不乏与汉族的交往，但基本上都是在相对稳定的地域范围内单一地发展繁衍下来的。还有些民族，如俄罗斯、塔吉克、乌兹别克等，则无论从什么角度都是不可能与炎黄拉上血统关系的。难道这些民族的人民也应该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吗？如果炎黄子孙不应该包括这些兄弟民族，而只是汉族的代名词，那么又岂能代替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显然，这种提法不仅伤害了兄弟民族的感情，而且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的原则的。

再次，这种提法并不利于统一大业和国际友好。

在国内，片面提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宣扬大汉族主义，只会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给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者以可乘之机。既然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那么不是炎黄子孙的民族岂不就不是中国人？岂不就能名正言顺地分裂了吗？

在台湾，固然绝大多数人是大陆移民或移民后裔，或许可以称得上炎黄子孙，但同样存在着非汉族的兄弟民族。以其中被我们称为高山族的民族为例，目前大概还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说明他们是炎黄二帝的后代，相反倒很可能是来自东南亚。如果只有用"炎黄子孙"来促进统一，那么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正是"台独分子"所大肆宣扬和企求的。

今天散居在世界各国的华裔，大多已经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无论感情上如何理解，从事实上和法律上说，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只能是朋友或亲戚，而不再是一家人；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只能是友好或

对祖先和故乡的情意，而绝不是爱国。要说爱国，他们应该爱他们所加入的国，也只有在遵守所在国法律的基础上，他们才能真正促进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友好，为中国起到朋友的作用。我们当然并不反对他们自称炎黄子孙，但这里的“炎黄子孙”只有血统上和情感上的意义，与前面所提及的特殊含义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我们把炎黄子孙当作中国人民的代名词，外籍华裔又怎么能够、怎么敢接受呢？在国际交往中滥用“炎黄子孙”或“爱国”一类名词，只能引起朋友的为难和反感，在华裔众多或本来就存在民族纠纷的国家只会产生不良后果。

中国历来对炎黄二帝的尊重既是一种优良的民族传统，也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表现。统治者打着这块招牌来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则更是一种不足挂齿的闹剧。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和独立各省一度使用黄帝纪年，一方面是对满清帝制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了狭隘的民族情绪。就像一度提过的“驱逐鞑虏”、“种族革命”的口号很快为“五族共和”的纲领所取代一样，黄帝纪年也很快结束了它的使命。海外华人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侮辱，又得不到国内腐败政府的合法保护，对祖国、祖先有强烈的感情。但无须讳言，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感情有其片面的、消极的一面，尤其表现在狭隘的宗族观念、地方观念和民族观念上。在今天，这些观念更与现代文明社会和正常的国际交往格格不入，对此我们应该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和态度，不必迁就迎合。如果因为是“炎黄子孙”就一定要拍手叫好，甚至把唐人街中黑暗腐朽的东西也当作“爱国爱乡”来宣扬，只能使我们失去大多数友好、文明、正直的华裔朋友。

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绝对纯血统的民族，如果有的话，也必定很快退化以至灭绝。华夏（汉）族能由世界上最古

老的民族之一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靠的不是祖先的伟大或血统的优秀，而是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凝聚了各民族的精华。同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来自她的各个民族，来自各民族自身的创造力和她们之间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基础是她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而不是共同的血统或同一个祖先。

当然，我并不一概反对称炎黄子孙，炎黄二帝即使是传说人物，加以尊崇也未尝不可。再说公民有言论自由，谁愿意用什么名词，爱认哪个祖宗是不应受干涉的，海外华人爱怎么说更是他们的自由。但是，“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的代名词却是必须讲清楚的，官方言论和正式档中更不应有任何含糊。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五日，第三版《史学》。

附记

本文写于一九八八年，曾载于上海《解放日报》内部刊，一九八九年七月五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史学》版。九月六日，员力先生在该报发表《也谈“炎黄子孙”》一文，对拙文提出商榷，为此我写了《再谈“炎黄子孙”并答员力先生》作为答复。但该报在次年一月发表了陈连开先生《中华民族与炎黄子孙异同辨》一文后就结束了这场讨论，这篇答文就没有发表。据别人告诉我，其他报刊上还发表过讨论拙文的文章，可惜这些报刊在发表前后都没有将这些文章寄给我，而我看的报刊又少，连看都没有看到，自然不会作答或表明态度。湖南某大学的学报还登过一篇批判拙文的文章，居然也没有通知我，大概并不想让我反批判吧！事后学生拿来给我看，除了几顶政治帽子外实在没有内容，看来此人连我的文章都看不懂，只是为了赶时髦

而已，当然不值得一驳。

拙文居然会引起一番不小的争议，这是始料所不及的，因为我以为所依据的都是史学界公认的史实，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经得起驳难，似乎不应有什么异议。从此文发表后的情况和近年的实际看，显然我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所以我在将此文收入本集时，仅改正了几个错字，其余一仍其旧，好让读者了解这场争论的起因究竟是一篇何等样的文章。

员文的意见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还是利用写附记的机会作一简单的答复。

我在文章中说："面对各种各样的传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大史学家最后也不得不取了《春秋》、《国语》的说法，而'弗深考'，不再仔细考查事实究竟如何。"员先生说我把意思完全弄反了，"弗深考"的不是司马迁而是指其他学者们没有深入考察。我反复读了《史记》原文，觉得未必是我弄错了，因为张守节所作的《正义》中也写着："太史公言博考古文，择其言表见之不虚，甚章着矣，思念亦且不须更深论考。"说的也是司马迁认为"不须更深论考"。员先生又说司马迁写《五帝本纪》既有文献依据，又作实地考察，且经过一番筛选工作，所以我说《五帝本纪》绝不是确切的历史记录"就未免太绝对化了"。其实，黄帝如果真的生活在五千年前，司马迁的时代就已在两千多年之后，实地考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黄帝时还没有文字，司马迁又找得到什么直接的"文献依据"？即使我不说得太绝对化，《五帝本纪》总不能当作信史吧！

员先生的第二点意见认为黄帝不是与炎帝作战，而是与炎帝的后裔作战，他的根据是唐朝人对《史记》的注释，而我的根据却是《史记》原文："炎帝欲侵陵诸侯"、"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分明写着是"炎帝"而不是什么"炎

帝后裔”。由于炎帝本来是传说人物，历来就有不同说法，有以为即神农氏，有以为是神农氏之后，有以为是与黄帝同出一族，我不敢说我的写法一定对，但也不认为员先生的意见有多少道理。

不过，以上两点都不影响拙文的立论，就是把这些话都删去，拙文的论据照样是充分而坚强的。

至于员先生的其他意见就不能苟同了。

员文说：“自从黄帝打败了炎帝的后裔之后，……一部分人向四方迁移，迁东的成为日后的东夷，迁西的成为日后的羌戎，迁南的成为日后的苗蛮，迁北的成为日后的狄貊，也就是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并且根据“文献记载”，考证出满族也是炎帝后裔的一支“息慎”之后。

的确，在汉文史料中有不少非汉民族起源的记载，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说成是炎帝的后裔就是其中之一。以此为依据，诚如员文所说，有好些少数民族“也可以与炎黄二帝及其后裔连系上”。但是判断一个民族的来源不能仅仅根据文献记载，更不能只根据汉文史料所作的片面记载。今天要确定一个民族是否与炎黄二帝及其后裔同源，至少应该对该民族历史时期的语言、文字、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质等要素作一番考察和分析，绝对不可轻易相信文献记载中的某些说法。我们并不否定传统的汉文史籍中有关其他民族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因为对那些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民族来说，这是了解它们历史的唯一记载。但是同时也必须指出：由于汉族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长期处于相对先进的地位，早就使汉族统治者形成了一种脱离实际的优越感，推行着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对其他民族鄙视、蔑视，对外部世界妄自尊大。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与汉族交往较多的

民族，包括那些曾经被汉族政权统治或曾经征服过汉族政权的民族，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些说法。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民族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再重复那些在民族不平等状况下产生的陈说。

例如，《史记·匈奴列传》中的确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样毫不含糊的记载，但是当今国内外的匈奴史学者大概没有人还相信这一说法，几种权威论著和工具书都没有提及匈奴与华夏族有过这种关系；而且即使从《史记》、《汉书》有关记载看，汉朝人实际上也没有承认匈奴是他们的同种、是“炎黄子孙”。

说到满族的先祖是禹时的“息慎”，我不知道员先生是根据哪一种“文献记载”，汉族的还是满族的？遗憾的是，对这样一条重要的证据，员先生却没有说明出处，使我们无法判断它的可靠性究竟有多大。因为“息慎”是“东北夷”的一支，而“夷”又都是炎帝之后，所以满族也应是“炎黄子孙”，这样的推理无论如何是太牵强附会了。把满族的先祖扯到炎帝头上，无非是满族统治者为了证明他们理应君临中华而编造出来的神话，或者是汉族面对女真或满族统治的自我安慰。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民族学的考察的，试问当代有关女真和满族的论著中有哪几种采用了？

员文指责我“将历史的‘女真’和‘满’分成两个不同的民族也不确切”，其实拙文只是将历史上曾经进入黄河流域的民族用习惯的名称罗列出来而已，并不是作现代的民族学分类。不过，将女真与满族分开倒不是我的发明，孙进己的《东北民族源流》一书[1]就指出：满族并不都是由金代的女真融合而成，“满族和金代的女真不同，它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1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二一〇页。

员文的第四点意见是针对我说历史上汉族"对异族的杰出人物，只要能为本族效力，统治者就会委以重任"这段话，认为"统治者委以重任，并非着眼于为本族效力，而是为维护他们的共同统治效力，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他的理论根据是"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在阶级社会里，其实质就是阶级矛盾"。我们自然不能否认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但也应该承认，民族矛盾有其特殊内容，并非阶级矛盾所能全部涵盖。不能因为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就只研究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不研究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拿拙文所涉及到的问题来说，尽管各民族的统治者都压迫和剥削本民族和外民族的劳动人民，但在吸收异族的杰出人物加入本族统治集团这一点上，汉族和其他民族是有很大差异的，拙文正是在讨论这种差异。汉武帝任用金日磾，并没有什么"共同统治"的需要，纯粹是吸收异族人才；而金氏之所以成为汉朝的功臣，也并非因为剥削了本族的劳动人民，完全是对汉族劳动人民统治有方的结果。同样，犹太人在世界各地与在中国的不同遭遇是无法用阶级矛盾来解释的，否则他们的结局应该完全一样，因为外国和中国那时都是阶级社会，都有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

员先生的意见显然不单是对拙文的批评，而是涉及我们对待民族历史和民族史研究的基本观点，这正是拙文撰写的动机之一，也是为什么要作出回答的原因。拙文写成已六年多了，时过境迁，其中有的话或许已过时了。如说"夏文化遗址虽然已有了发现的报道，但还有待于科学的鉴定和深入的研究"，而现在考古学界的意见大多已肯定了夏文化的存在。但拙文的基本观点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所以我在撰写《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1]和《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2]这两本小书时，都写入了这些内容。如果再出现什么批评意见或者像样的批判的话，只要我知道，是愿意作出反应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五日

1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2 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

人文千秋

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

拙文《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1]发表后，受到不少前辈和同行的赞成和鼓励，但也听到有人提出质疑：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时间分裂吗？统一究竟是不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这样的疑问完全在我意料之中。老实说，当我在酝酿这一论题时，估计将遇到的诘难比这激烈得多。正因为如此，我对这些疑问曾反复作过思考，自信掌握了批驳不倒的论据才敢动笔。但考虑到这些比较详细的论述已经写进了我的另一本小册子《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而该书又预定在去年底出版，所以才在论文中作了省略，而只写出了结论性的意见。由于该书没有按原计划出版，而且这本书也不是作为纯学术著作来写的，不一定能引起大雅君子的注意，专门回答一下这些疑问还是有必要的。

回答这些问题显然无需引用大量史料，也不必进行繁琐的考证，因为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了解历代分合的大势，大家对这些史实并没有太不一致的看法，主要的分歧还是衡量统一或分裂的标准。

一

统一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不妨寻根追源作一番探讨。统，原来是指丝的头绪。《淮南子·泰族训》说："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归于一致，将各个部分合成为一个整体这一意义的"统一（壹）"一词，它本身并不专指某一事物。如《汉书·董仲舒传》的赞中说："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那是指学说、学术思想。《汉书·西域传》的赞中说"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不相统一"，以及《后汉书·隗嚣传》的

1 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载沈一之主编《理论纵横·社会文史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一七—三二六页。

“帝知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则是指国家和“天下”，实质是就政权而言。

毫无疑问，我们所要讨论的统一是指国家之间或政权之间、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内部在政治上的一致、集中及结合为整体，而不是其他方面，如文化、民族、语言、风俗、经济、思想、宗教、血统甚至地理环境等等的一致性或整体化。说明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实际上有些人所指的统一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所以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比较他们与笔者在“统一”观上的异同。当然，我并不认为其他方面的统一与国家的统一毫无关系，或者认为政治上的统一可以孤立于其他方面的统一之外，但两者毕竟是完全不同的方面，而且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也丝毫不敢贬低对政治以外的统一的历史的研究成果，因为它们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研究它们的发展规律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和有益的，滥用这些成果与创造这些成果的人是无关的。但是确实有些人常常混淆了这些界限，把那些非政治的统一同政治上的统一联系起来；不管他们的目的是多么良好，或者纯粹出于“爱国主义”，这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至于为了迎合某种一时的政治需要，博得廉价的宣传效果，而无视历史事实和科学原理的附会和模拟，更是对学术的亵渎、对真理的践踏。

例如常有人列举在某地发现中国某朝的文物或器物，如果用以说明文化传播、经济往来、交通运输自然是很好的证据，但这与国家或政权的统一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今天中国大陆上行驶着那么多的洋车，商店里放着那么多的洋货，是不是也应该让我们的后人来考证一下中国已经被哪个外国“统一”了呢？又如有人提出早在多少年前中国人就到了某地，这对于研究旅行史、探险史、航海史、文化史或者气象史等当然是十分重

要的，但是人到了不等于占领，占领了土地也不等于该土地就是这些人的母国的一部分。有人考证出最早到达美洲的是中国人，时间在一万年前。姑且不管这结论是否正确，试问一万年前的“中国”在哪里？我没有请教过人类学家，一万年前生活在今天中国土地上的人该叫什么人，但这种称谓也只有人类学上的意义，而绝不是政治或国家的含义。谁都知道，欧洲的不少君主曾经是同一家庭的成员，甚至是同胞兄弟，有些国家都是同一民族，但这些国家却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统一。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煞费苦心找到的证据，实际上恰恰成了否定他们的结论的材料。例如以前在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时，举出的最早例证是三国时吴国的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到过台湾。但我们一查史料，就可以看到《三国志》（这是唯一的出处）上写得明明白白，这次出动“甲士万人”的海上远征唯一的成果是掠回了数千人，而且这两位倒霉的将领第二年就被孙权以“违诏无功”的罪名杀了。从这个例子正好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台湾当时根本不是吴国的一部分，否则就不会出现这类海盗行为。不仅如此，还证明当时东南大陆的人民对台湾岛上的情况了解甚少，否则卫温、诸葛直大概不至于白白送命。至于其他例子，如曾经有和亲公主下嫁、同样使用汉字、风俗与内地相同、完全采用某朝制度、自称为某人后代、崇尚孔孟之道等等，都可以找到各自的运用范围，而不必硬挤到我们关于统一的讨论中来。

二

既然我们讲的统一是就国家或政权而言，就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地域范围，而不是一个模糊的、经常变化的概念所能界定的。我们既然要

讨论中国的统一，就必须首先确定中国的含义、它所代表的地域范围。这在今天自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中国的疆域是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的，有精确的地图可以说明。但在历史上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直到一九一二年之前，中国还不是任何国家或朝代的正式名称、正式简称。

由于早期的华夏族是在黄河中下游繁衍起来的，所以认为这一带应该是天下之中，称为中国。中国是对周围的四方而言的，因此可以指中原地区，如《礼记·中庸》所称“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也可以指国君所在的京师，如《诗经》中《大雅·民劳》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到了春秋战国时，地处中原地区的诸侯国也都称为中国，黄河流域之外的诸侯国就没有这个资格了。例如楚国，虽然一度十分强大，足以问鼎周室，却不能算中国。吴国、越国也是如此，如《韩非子·孤愤》称“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是被明确列于中国之外的。

随着华夏民族居住范围的扩大（包括其他民族的被吸引融合）和华夏文化区的扩展，中国范围逐渐扩大。统治了中原地区或建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可以自称中国，它们的疆域也可以称为中国；而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法统或文化的政权，尽管其疆域范围并不包括黄河流域，也同样可以中国自居。如在西汉初年，陆贾曾对南越王赵佗说：“皇帝……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膏腴……”去掉其中的夸耀成分，可以看出这里的中国已包括涌进的大部分疆域，比战国时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当然还不包括赵佗所占据的岭南和刘邦尚未统治的周边地区。到了东晋、南北朝，南北双方都以中国自居。占据了黄河流域的政权，尽管统治者大多是非汉族，却认为自己已经是传统的中国的主人，当然是名正言顺的中国了；而对方已逃到了原来的蛮夷之地，只配称为

“岛夷”。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政权则以中国法统和文化的合法继承人自居，而对方只是强占了地盘的“索虏”。待到隋朝灭陈，南北统一，“岛夷”和“索虏”的地方便都成了中国。

但是，狭义的中国，即以中原为中国的定义继续为人们所运用，例如唐朝诗人陈子昂的《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诗中就有“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这样的用法。峡口山即今合黎山的主峰，在甘肃张掖地区，照陈子昂的意思，合黎山以西就不是中国，尽管他明知这里也是唐朝的领土。还有的人所指的中国范围还要狭窄。正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或法定的概念，所以不同时期、同时期不同的人和著作中可以有不同的所指范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也会有不同的用法。例如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像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在他的著作中还是二义并用的，有时中国指清朝全部疆域，时而只指内地各省，却不包括东北、内外蒙古、青海、西藏和新疆。

清朝后期，中国开始被用作国家的代名词，外国常以中国称清朝，清朝有时也以中国、中华自称。但这都不是正式的、法定的名称，在任何正式场合，如诏书、条约、照会等官方文件以及派遣使臣、典礼仪式中一直还是用“清、大清、大清国”，“中”只是对“外”而言，传统的中国含义依然通行。直到“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才成为它的简称，正式成为国家的代名词。

因此，我们在“中华民国”之前的著作文献中看到不符合今天中国含义的用法，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当作见不得人的把柄或什么严重的政治事件。例如魏源的《圣武纪》卷八《康熙复位台湾纪》引了雍正皇帝的即位诏书“台湾自古不属中国，我皇考神武远届，拓入版图”这样的话，这里雍正所指的中国是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绝不是

今天的概念，魏源也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引述的，都没有什么错，因为在康熙以前，台湾的确从来没有归属过哪一个中央王朝或大陆政权。如果译成英文，这里的中国只能用the central empire或者the central government，而不能用China，这是稍有中国历史常识而不抱偏见的人都能理解的，是不会、也不授人以柄的。不仅如此，在以往的著作中还常常会看到某地“自古不能中国”这样的话，例如对边疆各省区，甚至湖南、福建都曾提到。这同样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写这些话的人脑子里的中国只想到中原、中央王朝，绝不会有千百年、数十年后的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要说他们都是迎合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卖国贼岂非冤哉枉也？

总之，历史上所说的中国不等于今天意义的中国，也不等于某一王朝，可以指完全不同的地域范围。即使当中国用于代表某一王朝时也不一定等于今天的中国，因为只有清朝从乾隆平定天山南北路至鸦片战争失败割让香港前这八十二年中的疆域能够包括今天中国的全部领土，而其他任何时候总有一部分今天中国的领土未被置于中央王朝统治之下。例如汉代的极盛时期也从未占有青藏高原的主体，其稳定的北界是阴山山脉和辽河流域；唐朝的最大疆域没有包括西藏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范围缺少今天新疆的一部分和台湾岛；而台湾岛最终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是康熙年间才实现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讨论统一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范围。根据历史和现实，无非是三种标准：一是各个王朝的最大疆域；二是今天中国的领土；三是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最大疆域，即清朝中期这八十二年的统治范围。

第一种标准显然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前面已经说过，王朝不等于中国，王朝统一了不等于中国也统一了。

当周朝的臣民唱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时，我们能说中国统一了吗？当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庆祝灭六国的胜利时，我们能说中国统一了吗？当明成祖夺取帝位，明朝疆域臻于极盛时，又怎么能说中国已经统一了呢？而且，不少王朝都没有能恢复前朝的疆域，所以站在新朝的立场上可以说统一已经完成，而站在前朝的立场上只能说疆域分裂了。例如，宋朝建立后，先后灭后蜀、南唐、吴越、北汉等国，建立了它的最大疆域；相对于以后西夏立国和金人侵而言，这是宋朝的统一时期。但是站在唐朝的立场上看，只能说它的疆域被分裂了，先后分裂为辽、宋、西夏、大理等部分，直到元朝才重新统一。同样，明朝的建立对元朝来说也是分裂，它的疆域至少被分为长城南北两个部分，直到清朝才重新统一。只有第二、三种标准才能客观地说明历史时期的分合状况。

以往有一些很流行的说法，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例如人们常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中国空间指什么？如果是指中原，指黄河流域，那当然是对的；但秦朝不仅统一了黄河流域，还统一了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而且说这话的人心目中的中国似乎也不止是指中原或黄河流域。如果是指今天的中国，那又差得太远了。秦朝的北界是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西界是陇东高原，西南的稳定疆域只达到四川部分地区，势力范围或一度曾控制的地区包括云贵高原的大部，海上不包括台湾、海南岛。又如人们常说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样的话往往用之于官方文件、外交照会，但仔细分析也是不严密的。“自古”是指什么时候？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如果真是指几千年前，那时的中国又在哪里？那时的“中国”又指什么？如果以中国一词来代替当时的中央王朝或中原政权，说不定倒是自找麻烦，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今天不少地方当时

可能确实不在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其实，今天的中国不光是汉族人民的，也是其他五十五个兄弟民族的，当然不仅应该继承中原政权的遗产，也应该继承各兄弟民族的遗产，历史上曾经不属于中原王朝管辖并不意味着今天就不应该属于中国。而且，任何国家的统一都有一个过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从黄河流域开始，逐步扩展到周边地区，尽管中间时有盈缩、时有分裂，最终形成了清朝这样的疆域，而这一疆域又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继承。至于在清朝以前的某一时期，某地曾不属于中原政权，或曾独立自治，或曾隶属于今天境外的某一政权，这在任何国家的统一史中都是正常的事情，根本不涉及今天的主权，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承认历史事实？世界上谁也不能不认今天的越南曾经是汉朝、唐朝的一部分，一度又是明朝的一个行省，但难道能据此而不承认它现在是个独立国家吗？夏威夷直到一九五九年才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也没有听说有人据此对美国的主权提出什么疑问。所以这种“自古以来”的说法对历史事实而言往往是不严谨的，从今天国家的主权利益着想，似乎也不见得有什么帮助。

三

同样，任何形式的政治或政权的统一都有其明确的时间范围。只有这样，任何空间范围才有实际意义。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时，一定要打破传统的王朝观念。王朝的起讫不是统一的始终，因为任何王朝的疆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王朝的统一都不是从头到尾都能维持的。

为什么有些人计算出来历史上的统一时间比我的结论长得多，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是简单地根据历史年表上王朝的起讫年代计算的。如果是封建时代的史官或某朝某代的

臣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史学家还持这种态度就不能不令人吃惊——他们的头脑里还有没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讲不讲基本的历史事实？

目前通行的历史纪年，即使在逻辑上也有不少错误。例如西汉的起点是从公元前二〇六年刘邦被封为汉王的汉元年算起的，即使根据封建的正统观念，刘邦也要到公元前二〇二年才正式称帝。而明朝却是从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即皇帝位算起的，而不是从他占领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或称吴王建元算起的。又如南宋的结束止于一二七九年，实际上早在一二七五年南宋政府已经投降元朝，首都临安也已经被占，以后存在的只是残余势力，限于局部地区。如果根据这一原则，明朝的灭亡就至少应该定在一六六一年，因为永历政权到那一年才结束；但明朝的下限却又是定在一六四四年北京失陷的。要根据这样的标准来统计统一的时间自然不会有正确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不少王朝始建时只是众多割据者中的一员，至多只是其中最强大的一员，只占有前一王朝的一部分领土。同样，许多王朝的后期已经陷于分裂割据，国君只拥有名义上的统治权，或者已经退缩到很狭小的范围。在王朝中期虽然帝系并未中断，却往往会发生战争动乱，出现地方割据。所以以几个所谓的大统一王朝的存在年代来统计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汉存在的时间是二百一十四年（前206—公元8），但在刘邦灭项羽称帝时，秦朝原来四十多个郡中归他直接控制的只有十几个，直到景帝三年（前一五四）才基本消灭了诸侯的割据，又到了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才将岭南的疆域重新纳入版图，从这以后的一一九年才算得上统一，只占整个西汉王朝年代的百分之五十六。东汉共一百九十六年，但刘秀称帝时地盘相当有限，至少要到建武十二年

（三六）平公孙述才能算恢复了西汉疆土。即使不考虑匈奴、鲜卑、羌人始终占据北部、西北大片土地，东汉的一统天下也只能算到中平元年（一八四）黄巾起义为止。以一百四十九年计，只占东汉的百分之七十六。如果因为汉献帝这个傀儡的存在就作为东汉统一的延续，岂不是莫大的笑话！唐朝长达二百九十年，但国内基本统一是到武德七年（六二四）才做到的，而到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安史之乱爆发，分裂割据再也没有停止过。除了黄河流域、华北有藩镇割据外，东北有渤海国，西南有南诏国，吐蕃的领土一直扩展到陇山和大渡河一线，尽管唐朝的“正朔”一线不绝地维持到了哀帝天佑四年，实际上哪里还有什么统一可言！因为唐朝只有一百三十二年能算作统一，只占全部时间的百分之四十六。即使以统一程度最高的清朝为例，也应扣除实际上的分裂时期，如清兵入关、灭南明、平定三藩至收降台湾（一六四四—一六八三）这四十年，太平天国起义这十四年，统一时间占本朝的百分之八十。

另外，是否算统一不能只用封建正统的标准，不能只站在汉族的立场上看历史。北宋这一百六十多年能不能算统一？我以为是不能算的。道理很简单，北宋并没有继承唐朝的疆域，没有能恢复唐朝达到过的统一；而辽的历史比北宋还早，它同样占了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拥有与北宋不相上下的兵力和国土，实际上处于与北宋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就今天的中国范围而言，同时存在着北宋、辽以外的大理、西夏、吐蕃等政权，岂是北宋一家所能代表、所能统一的吗？宋、金对峙是大家公认的分裂时期，可是对宋、辽对峙却视而不见，被当成是北宋的统一时期，这实在无法自圆其说。

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或控制同样有一个时间问

题，不能因为某一王朝的军事活动一度到达了某地就认为该地区成了这一王朝的领土，也不能因为某一王朝曾经在某地设置了行政或监护机构就认为该地始终是这一王朝的疆域，因为这些情况往往只有短短几年、几十年，只占该王朝的若干分之一。

西汉、东汉所设的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地区西北至前苏联的巴尔喀什湖。但在两汉四百一十年间，西域都护府仅设置了一百零九年（前六〇—一六，七四—七六，九一—一〇七），而且在这百余年间并不是都能管辖那么大的范围，所以不能认为汉朝的疆域都是西至巴尔喀什湖。

说到唐朝的疆域，人们往往会陶醉于“西至咸海，北至贝加尔湖，东至朝鲜”的盛唐天下，可是却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愿意注意时间上的矛盾，因为尽管唐朝的控制曾经达到这三个地区，却从来没有同时并存过：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灭薛延陀后，北方控制了贝加尔湖以北，但到仪凤四年（六七九）突厥再起，即后撤至阴山一线；本部的极盛时期只维持了三年，即从龙朔元年（六六一）遣使招抚至麟德二年（六六五）撤退；开元三年（七一五）一度又进入葱岭以西，但天宝十年（七五一）又退回葱岭一线；东方的扩张时间更短，从总章元年（六六八）灭高丽，上元三年（六七六）即撤至辽东，以后又撤至辽西；其中只有西部的第一次推进与北部的最大疆域有三年重合，其余都不是同时的。这种情况在其他朝代也都存在。

四

历史研究应该透过现象看到实质，讲求实际而不能拘泥于名义，必须区别名义上的归属和实际上的统一。以往人们证明某国某地曾经为某朝所管辖或者曾经是某朝领土的一部分的证据，往往就是该国该地曾向某朝称臣纳贡。

的确，中国史书上可以找到很明确的记载，有的不仅有具体的时间、使者的姓名，而且连贡了什么及接受了什么赏赐都记载得一清二楚。但是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历史上的称臣纳贡情况虽然相当复杂，其中的确有少数事例是归属关系的确立，但大多数却是有名无实的。

一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由于中原王朝东亚大陆的统治地位和华夏文化的巨大影响，也由于历史上的联系和交往，周围的小国出于种种原因一般都愿意与中原政权保持称臣纳贡的关系，其结果是使它们既能避免吞并，保持实际的独立，也能获得贸易和交流的好处，还可能在遭遇内乱外患时寻求庇护。独立后的朝鲜、越南多数时期都保持着这种关系，但它们并不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实际上是独立国家。日本早在东汉初就接受过“倭奴国王”的印，以后也不断渡海“朝贡”，但能说日本曾经被中国“统一”过吗？

一是战败国与战胜国的关系。历史上常有一些边疆的非汉族政权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或经济上遭到困难时向中原政权称臣纳贡，以避免被消灭及获得资助或庇护；而中原王朝尽管一时处于军事优势，却也没有力量将对方吞并占领，因而乐意接受。例如西汉后期与匈奴就是如此。但汉、匈双方有明确的边界线——长城，军队或人民都不能随意进出，汉朝从未将匈奴视为国内或按国内加以统治，所以匈奴并未因称臣纳贡而成为汉朝的一部分。

一是以朝贡为名义的通商贸易。历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以世界中心自居，认为本国是世上最富足的国家，无所不有，不必依靠外人，所以一贯不重视对外贸易和经济活动。外国及边区的商人如以经商相求常常得不到合法的批准，经济利益也无保证。而且中国统治者如果公开购买外来物品，既有损于自己至高无上的尊严，也将受到属守儒家信念的臣子和理学家的批评规劝。但如果打起“朝贡”

的旗号，商人们不仅可以享受使臣的待遇堂而皇之进出，而且可以获得大大超过贡品的赏赐，因为中原王朝历来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为“国际影响”可以不惜工本，不顾本国百姓的死活。统治者既满足了虚荣心理，又可以名正言顺地享用各种“贡品”，自然很欢迎这种“进贡”。当然有时一些小国朝贡的积极性实在太高，不得不规定若干年一次及每次的人数。但无论次数、人数多少，这与领土归属、政治统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更有甚者，中国以往的统治者和史臣们出于自我中心的错觉留下了不少一厢情愿的记载。这些史料的价值只在于反映了他们的无知闭塞和狂妄自大的心态，而不是所记载的客观事实的真实性。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十八世纪末乾隆皇帝通过英国使臣马嘎尔尼“赐”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朕批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今天看来，这无异痴人说梦，但在当时，却是这位“天朝大皇帝”引为自豪的杰作，并由史官郑重记录在案的。幸而他早死了几十年，没有亲眼目睹英国国王的“恭顺”和他的子孙一次次的“赏赐”。但如果世界上没有英文或者其他文字的历史记载，只剩这封信留下来，情况又将如何呢？我们有的历史学家会不会把这作为英国当时“穷绝来归”而未蒙乾隆接纳的证据呢？这或许只是近于儿戏的假设，可绝不是无事生非的杞忧，因为对中国历史上这类记载深信不疑的还大有人在；而且自乾隆后，这类阿Q 式

的记录从未绝迹，直至当代不是还常有明明在外面碰了壁、丢了脸、吃了亏却还要关起门来吹嘘“伟大胜利”的事吗？如果都信了这些话，那么不仅可得出中国从未积弱的判断，而且能够找到“世界革命”已经胜利的铁证。那些对历史上“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深信不疑的学者为什么不想一下：说中原王朝统一着这些进贡者不也同样滑稽可笑吗？

五

长期以来，对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有一种很片面的观念，似乎只有加入中原王朝才是统一，是进步的；否则就是分裂，是反动的。因而在判断一个边疆政权、地方政权或少数民族政权时，总要千方百计寻找证据来证明它应该归属于中原王朝，实在不行就冠之以“分裂政权”。

这种观念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中原王朝的疆域是逐渐扩大的，并且时有盈缩，中国的国土和人民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已经统一了的政权分为几个，或者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称为分裂；但本来就存在于这个政权之外的政权或地区就无分裂可言，只能说是独立或自治。

直到清朝中叶之前，今天中国的领土总还有一部分存在着独立政权或自治地区。如在元朝之前，青藏高原一直是由吐蕃及其先人建立自主政权或者自治的。唐朝文成公主的出嫁是一种政治和解和文化传播，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吐蕃的独立国家地位，即使在以后吐蕃陷入内乱分裂的情况下，中原王朝也没有谋略把它纳入自己的版图，直到元朝运用军事和宗教的双重力量才使它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吐蕃对中原政权只有和平与对抗的关系，没有什么统一与分裂的关系；要说有分裂那只是它内部的事情。这与成了元朝一个政区的西藏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同样，在

康熙之前，大陆上的政权还没有有效地管辖过台湾，该岛或由土著民族自治，或由大陆移民或海盗控制，或由外来侵略者占据；这些当然都不能称为分裂。

还有一些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或者由于当地人民对外来统治者的抵制反抗，中央和地方政权不愿管辖或者管辖不了。有的虽然名义上是某州某长官，实际上是世袭的部族首领自行其是。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存在，有的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这绝不是什么分裂，而是地方或民族的自治，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漫长过程中是完全正常的。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在今天中国的领土上出现过很多独立的、自治的政权，通过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种族的、宗教的等各方面的手段和媒介，这些政权进行了无数次征服与被征服、自治和被统治、合并和解体、统一和分裂，最终形成了统一的清朝国家。还有少数政权和民族，这一复杂的过程绝不是统一和分裂所能完全包容的。至于分裂是不是必定反动，我在书上已作了初步探讨，限于篇幅，就不在此赘述了。

如果我们在这五个方面有了共同的认识，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有了共同的衡量标准，那么关于我的统计方法尽管还会有些具体的意见，但在总体上是能够被接受的。这样，要进一步讨论统一是不是中国历史主流就有了一个比较一致的前提。而且由于对统一这个概念有了更加科学的界定，我们对它的历史上的作用将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这对于我们认识历史、面对现实和把握未来都是十分有益的。

原载上海市历史学会编《历史·国情·现代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四六—六二页。

人文千秋

历史人才分布研究二题

翻开《绍兴名人辞典》，竟发现了慈禧太后时的权阉李莲英的大名，但仔细一看，原来他只是祖籍绍兴（不知是第几代），本人出生于直隶河间府大城县。要不，说一口绍兴话是当不了太监的，至少不能成为慈禧的心腹。

此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李莲英究竟应该算哪里人？是根据祖籍，还是根据出生地？结论似乎很简单，但遇到实际人物时，往往要复杂得多。

历史上的人才分布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并且很容易引起人们，特别是与此有关地区的人们的关注。在中国走向进一步改革开放，各地纷纷致力于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的今天，从历史上人才分布的变迁考察本地的文化背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无疑要比单纯的学术研究具有更大的意义。

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原因之一固然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用现代的理论和手段进行的研究似乎还很少见；但方法上的缺陷和认识上的片面也是影响研究成果的重要因素。兹列举二例。

一

如何确定人才的地理位置或范围，是人才分布（或人才地理）研究的重要前提。但一般的研究都以人物的籍贯为统计指针或确定其地理位置的唯一依据，如一些流传甚广的论文和地图对从西汉至明清的各类人才，如三公、九卿、进士、诗人、宰辅、三鼎甲的分布，无不是根据他们的籍贯确定的。事实上，这种方法不仅存在很大的误差，甚至完全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没有可信的基础。

毫无疑问，作为人才分布研究的基础，是造就人才的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各个作为人才的人物是在什么地方接受使之成为人才的影响或教育的。因此，

最主要的是他们成为人才最关键的一段时间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从这一角度看，史料中人物的籍贯往往不能代表这样的地方。

古人传记或自述中的籍贯大多是祖籍，但由于种种原因，真正是在祖籍度过这一段关键时期的反而不一定是多数。

尽管中国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这主要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农耕的农民以及单纯的地主，基本不包括被我们列为人才的人物，如有相当地位或作为的文武官员、文人学者等。因为这些人一般不可能一直住在穷乡僻壤，大多活动于通都大邑，他们的后人出生或成长在外地的可能性就更大。即使是在社会安定的时期，这些人的流动性也比一般百姓大得多。如秦汉以来在首都任职的官员和各地的行政长官多数不是本地人，有的离开原籍已不止一代，但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他们一般不会改变自己的籍贯。东汉时出现了好几位籍贯是西北边郡的知名学者，但实际上除了个别人以外，他们都是在首都洛阳等地居住或接受教育。明清时就有不少生长在京师的人物，籍贯却还是南方的祖籍。南方对他们的影响只是血统（如果父母双方都是南方人的话）和家庭的传统，但北京对他们的影响却是他们之所以成才的决定性因素。

自从门阀制度盛行以后，高门世族成为士人立命进身的基础，各姓人士无不标榜本族的郡望，王氏必称太原，谢氏必称陈郡，杨氏必称弘农，赵氏必称天水，等等。因此，已在京师任职数代的大族，必然还要以郡望所在为籍贯。像出身北朝至隋唐一些大族的人物所用籍贯，大多并不是他们实际生长的地方。而且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一些人进身无门，不得不冒用他族的郡望，伪造世系。这些人的籍贯就更与他们的出生或成长地无关了。

自秦汉以来，历代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但对外出当

官、游学、经商或逃亡的人来说，只要他们还没有在外地取得合法的户籍，他们甚至他们的下一代的户籍就依然登记在原地。如汉代在京城的官员，除非特许入籍首都，否则即使在当地生儿育女，本人和家属都只在原籍登记。科举取士的前几轮一般都按地区分配名额，对应试人的籍贯登记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按户籍为准。当然也有少数人为了应试方便等原因而冒用别的籍贯，但完全可能受到追究；而且一旦冒用，往往就得将错就错一辈子。所以简单地根据籍贯统计出来的科举人物，往往不能客观反映这些人的实际分布，特别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地理环境。

由于长期存在的民族歧视，在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时期，尤其是明清以来，非汉族人士在取得了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以后，或者为了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隐瞒以至改变自己原来的民族成分，编造或附会自己的汉族世系，为此往往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祖籍或籍贯。如近代贵州布依族学者莫友芝，一直被称为出于江宁莫氏，当然是汉族。已故云南纳西族学者方国瑜，解放前就曾自称是安徽桐城方氏。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运用这些数据，结果必然是人才大大集中于汉族、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和世家大族，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和普通家族中的人才就会比实际少得多。

在社会发生战争动乱，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籍贯和出生地、居住地完全脱离的现象更为普遍。如从四世纪初永嘉之乱开始的人口南迁和向其他周边地区的迁移至少持续一百多年，仅迁入南方的移民累计就超过两百万。这些移民一般都已在南方定居，但直到六世纪后期南北统一时，士大夫们都还在使用北方原籍。从一一二六年靖康之乱开始的人口南迁几乎与整个南宋相始终，移民总数多达数百万，遍及南方各地。但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移民及其后裔使用的自然也是北方的原籍。在这些特殊的时期和地区内，以籍贯为基础的统计数据可以说完全不反映实际情况。如见于《南史》列传的七百二十八个人物中，北方移民及其后裔有五百零六人。如果我们根据他们的籍贯统计，那么南方籍的人物只有二百二十二人，似乎即使在南朝，南方的人才也少得很。但实际上，这五百零六人中真正生长在北方的是极少数，其他大多数人早已在南方定居，当然是南方的地理环境而不是北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中的各种人才。

还应该看到，即使籍贯与出生地一致，也还有种种特殊情况。从人才研究的角度讲，最主要的还是要确定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某一方面的人才的主要因素来自何方、产生在何地。例如自明清以来，在各地、各级衙门十分活跃的“绍兴师爷”中不乏优秀的行政、管理、法律、经济、社交、秘书人才。尽管这些人都是绍兴籍，但如果一定要在绍兴本地或从绍兴的地理条件中寻找他们“成才”的原因，恐怕至多只能从当地的人口压力和家庭的择业传统这两方面得到解释。不过这也至多决定了这些人的职业，却不能说明他们何以能有如此大的能耐，因为使他们“成才”的主要环境还是自幼耳濡目染和以后亲身参与的官场运作。

对于具体人物，情况就更加复杂。如周恩来的父亲是浙江绍兴人，母亲是江苏淮安人，本人在淮安出生并度过童年，但他受教育时间最长的是在天津，另有二年在日本、三年在欧洲。作为绍兴人的父亲、淮安人的母亲和他本人在淮安的童年对他的成长当然会有影响，但与天津相比哪一方面更重要呢？如果根据籍贯统计，周恩来应算在绍兴；根据出生地统计，他应该算在淮安；却不可能算到天津。又如先师谭其骧先生出生在沈阳，两岁时回到原籍嘉兴，十五岁到上海求学。外国的名人录只登记出生地，他就得

统计在沈阳，但沈阳对他的影响却可以忽略不计，其重要性与嘉兴、上海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由于史料的缺乏，对历史上大多数人物很难作如此具体的分析，往往只留下了籍贯，却无法搞清他们真实的出生地和生长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尽可能作出客观的估计，至少要对统计的依据作必要的说明。

还应该指出，有的论文和地图虽然有很具体的统计数字，却不说明这些数字的来源和统计的标准。这样的结果，即使不是毫无意义，也是令人怀疑的。

二

对文化或人才发达地区的确定，不能仅仅根据某一类人才的数量，而应该有比较全面的指标。

首先要有人均指标。人才既然是全部人口的一部分，是某一具体人口的产物，就必须考虑他们与全部人口的关系、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不仅是他们的绝对数字。如明朝的三鼎甲，南直隶有六十六人，总数第一；浙江和江西都是四十八人，并列第二。但南直隶的人口估计是浙江的近一倍，江西人口可能比浙江略多，因而以人均计，浙江遥遥领先，江西其次，南直隶只能居第三。又如清朝乾隆初所举博学鸿词，江苏七十八人，浙江六十八人，江西三十六人；但以人均计，浙江仍稳居第一，江西略高于江苏而居其次，江苏仍为第三。

其次，人才不应限于科举人物或儒家文化的范围，还应该包括其他更广泛的类型，如经济、军事、艺术、科技等等。当然由于现有史料的缺乏，特别是由于在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下，没有科举功名或社会地位的科技、艺术人才往往很难见于记载；即使侥幸得到记载的，一般也过于简

略。但这些人物的重要性和代表性无疑比大多数平庸的科举人物要大得多，应能更全面地显示所在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因此完全值得我们下工夫去发掘收集。至少自明清以来的方志、笔记和其他史料中还是可以有所发现的，只是因为数据相当分散，其中一部分又混杂有迷信荒诞或夸大片面的内容，收集整理工作非常困难。

再次，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应按不同的等级量化，不宜等量齐观。必须指出，不同层次或不同类型的人才产生的条件和所起的作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般说来，产生初级及中级人才的条件在各地都可能具备，并且完全可以与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步；但产生高级的、杰出的人才的条件就不是每一地区都能拥有，也不一定与当地的经济实力成正比；天才的出现，则更多地体现出个人的因素，很难单纯从环境方面加以解释。同样，文学家不必成长于经济发达地区，三鼎甲也可能出在乡村山区，但天文学家大多离不开朝廷所在的都城，经济人才多数产生在通都大邑。又如，即使在穷乡僻壤，也会有私家教授；而各种官学、书院、画院和艺术机构基本都设立在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中心，都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根据某一类人才或某一类文化设施来分析文化发达程度，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

最后还应该指出：由于中国历史上目前所能统计到的各类人物大多属士大夫阶层，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极大，因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例如，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期，高门世族垄断了高中级官僚阶层，政治、军事、文学人物往往集中在几个大族，他们的籍贯当然也就非常突出。如东晋、南朝的琅邪临沂（治今山东费县东）王氏和陈郡阳夏（治今河南太康县）谢氏二族（实际多数居住在今南京和浙江绍兴一带）在有关的人物统计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但真正够得上人才的却并不多。

而且由于出身寒门素族的人没有入仕或成名的机会，被埋没的人才不知其数。统治阶级内部的朋党、地域集团之争，也使政治人物相对集中在某些占优势人物所在的地区或家族，而非主流集团人物所在的地区或家族则处于不利地位。考察政治因素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到，尽管从总体上说，文化中心是与政治中心一致，并且会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而转移，但却不是同步的，一般是滞后的。如历史上的长安、洛阳、南京、临安、北京都曾在失去首都地位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文化中心的作用。各个地区性的行政中心也有同样的情况。甚至一个家族，在政治、经济地位下降以后，由于传统的影响，也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着高于其实际社会层次的文化水平。不过由于赖以存在的主要基础已经丧失，它们的衰落只是时间问题。

在史料不足、量化困难的条件下，比较稳妥的办法还是将与人才有关的种种因素叠加统计，综合分析。如考察一个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可以从人口构成（包括科举在内的各类人才的人均数量、人口的职业构成、外来移民的类型和所占比例等）、教育状况（有多少公私学校、在全国或地区的地位、教师和学生人数等）、学术水平（拥有多少著名学者、学派、著作、涉及的研究领域、在全国和地区的地位）、出版事业（有多少书坊、书铺、印刷发行了多少书籍、流通的范围等）等各方面的数字加以统计或估计等级，再结合当地的社会风尚、经济水平和历史传统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无疑会比仅仅根据若干类人物的统计数要合理可信。

原载缪进鸿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三〇一三四页。

人文千秋

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

——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

自从有了“大古都”的名称后，先后有过“五大古都”、“六大古都”的说法，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又提出了“七大古都”说。此外，有的地方认为它应该继“七大古都”之后居第八或第九，实际上提出了“八大”或“九大”古都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过一本《十大古都》。另一方面，有人不赞成“七大古都”说，有人对这些大古都次序的排列也有不同意见。

以上各种说法或意见，有的是可以兼容的，如提“八大”或“十大”的人并不反对“七大”，先师提“七大”也不反对“五大”。有的提法却是排他的，如先师认为“六大”是不合理的，同时认为古都有不同的等级，总有若干个是不相上下的，只能列为同一等级，不能随意定一个数；有人认为大古都只能在统一王朝的首都中确定，不能扩大到分裂割据政权的都城。

应该承认，除了个别人是明显违背历史事实，强词夺理以外，其他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侧重点不同，或使用的标准不一致而已。学人见仁见智，对具体问题有不同见解是完全正常的，但也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一些重大的原则和标准尽可能求得共识，使中国的古都研究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也使中国古都学会有关“大古都”的决议具有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一、对古都作量化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对古都的定义，似乎并没有异议，那就是：凡是历史上曾经作过一个政权的政治中心的城市，无论是一统王朝还是分裂割据政权，无论是属于什么民族，也无论今天是否还存在遗址遗物，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古都。

古都有不同的等级，对古都应该分等级、排次序，或者说古都有相对的大小之分，这也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来衡量古都的大小，采用什么具体的标准，各项指标之间又如何加以综合。比如说，一个古都可以强调它的建都历史最长，或者建都的时间最早；可以突出它当时拥有的疆域最广，或者这个政权的国力最强；能够以建筑规模最大取胜，或者以保存遗物最多著称；如此等等。如果这些优点集中在一个城市，那无疑就是中国最大的古都了。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城市会拥有全部第一，不同的第一之间又怎样来比较呢？如果各个古都各项指标的排列次序也都一致，如某城都是第一，某城都是第二或第三，那也好办。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如甲城拥有这项第一，乙城稳居那项第一，丙城却有三项第二。而且，除了比较容易确定次序的标准以外，还有一些难以量化的标准，如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国际或国内的影响、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往往难分伯仲，或者根本无法比较。还必须认识到，古都等级的确定不仅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还涉及到其他各种现实的因素；既不能完全根据历史事实，也不能全部取决于现状。

如果我们能够为确定古都的重要性制定出几项共同的标准，并且确定每项标准所应占的比例，就不难给所有的古都排出相对合理的次序。这就需要对古都作定量分析。

那么，有没有量化的可能呢？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有相当大的难度。

主要的理由是，有关中国古都的史料是相当多的，目前已经发现并得到确认的遗址、遗物也越来越丰富，这些考古发现既证实了文献资料基本是可信的，也弥补了记载的不足，所以我们已经有条件大致复原出大多数古都的原貌，确定其基本的时间、空间坐标。

古都的一部分指标完全可以量化，如建都的起讫时间、城市的规模、与今天作为它的后身的城市的重合程度等，

而且古都学界对这些事实并无异议。

古都的另一部分指标所依据的事实是清楚的，只需要对量化的方法取得一致，即将它们折算为相应的数据。如古都的性质：是全国性的一统王朝，还是地方性的割据、分裂或自治政权；是名义上的首都，还是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所拥有的实际统治区的大小；后身城市的地位是今天的首都、省会还是省以下单位等。

还有一些指标本身就是模糊的，如一个古都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对统治区的控制程度，当时对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后身城市在国际和国内的知名度等，客观上并没有可资利用的数据，但我们可以根据史料的综合分析和相互间的比较，定出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等级值。各种等级值相乘的结果，一般可视为这个古都的综合指标值。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都都具备了作量化分析的条件，但对绝大多数古都，特别是有资格进入大古都行列的城市是完全可行的。这样的结果也不可能完全精确，但至少为确定古都或大古都的次序提供了比较客观的标准，避免了主观性和随意性。

二、对古都作量化分析的主要指标和评定方法

在选择古都的主要指标之前，必须首先对几个基本观点统一认识。

第一，历史事实是决定古都重要性的前提。古都并不是一般的城市，无论今天这个城市多么发达、多么重要、多么宏大，只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作过一个独立政权的政治中心，就与古都无缘。因此我们在选择这些指标时，应该把历史上这个城市作为都城的有关事实和数据放在首位。

第二，必须确定历史上的都城与今天作为古都的城市

之间的关系。尽管名字不必相同，城址不必完全重合，但现在的城市与历史上的都城必须有继承关系，即现在的城市是由历史上的都城发展而来的，迁移过来的，或者在遗址上重建的。因此，古都城址与今城市的重合程度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城市一般只能指传统的市区和郊区，不是指作为行政区划的市的范围，不能扩大到近数十年来因为行政区划调整而增加的辖县。

第三，今城市的地位和影响同样应该重视。对古都的研究并不是纯粹的历史课题，古都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今城市是首都、省会，还是市、县，今城市的重要性和知名度的大小，对于古都人文价值的发挥起着不同的作用，因为这些都是古都的价值能否发挥作用的基础。如果一个历史上的都城已经完全成为废墟，又不坐落在今城市之内或附近，那么无论它当年是何等辉煌，今天只能是一个遗址，而不能成为古都了。

第四，应该站在今天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立场上，而不是用封建正统的、某一个民族的或某一个地方的观念，来评价古都的重要性。以往的学者往往只注重正统王朝、中原的或汉族政权首都的地位，而不重视同时存在的边疆的、非汉族的、历来被视为非正统的政权。如南北朝时期的平城、洛阳、邺与建康，宋金时期的临安与燕京、开封，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首都的地位是相同的，我们只能根据它们的具体指标来确定其重要性，而不存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别。有人至今还把杭州视为南宋与金时期中国的中心，却不顾当时宋、金、西夏、大理、蒙古等政权同时存在并相互独立的事实，也不考虑当时杭州实际统治的范围的大小，自然会得出偏颇的结论。

决定一个古都今天的地位的因素很多，有一些是某一古都的个性，但有一些却是各个古都的共性，拟从中选出

主要的几种，并确定评估的方法如下：

（一）建都时间

以年为单位，每年一分。建都时间不足一年或不足一年的尾数均作一年计。虽无首都名义但实际上已成为政治中心的城市，按其实际时间计算。仅有陪都名义而无首都实际作用者、仅作为巡幸或驻跸者不计。建都时间长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容易精确，因此以这项指标作为基数，而以以下各项资料作为相乘的系数。

（二）都城性质

以大一统王朝（即在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内只有一个王朝，如完成统一后的清朝）的首都为最高数一，以下依次递减：基本统一的王朝，如西汉中后期和唐安史之乱前的长安、明前期的南京和北京等为零点九；商、西周及对峙时期的主要政权的首都为零点八，其余政权依次为零点七、零点五或更低，如北宋的开封为零点八，辽都上京和中京为零点七，西夏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大理的大理城为零点五；分裂时期的主要政权的首都为零点七，其余依次为零点五或更低，如五代时期的洛阳、开封为零点七，前后蜀的成都、楚的长沙、南唐的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吴越的杭州、南汉的广州等为零点五，南平的江陵府、北汉的太原府、闽的长乐府（今福建福州）、清源的泉州等为零点五；春秋战国时期东周和各国的都城，按不同阶段的实际形势定为零点七至零点四不等，如东周初期的洛阳和战国后期的咸阳为零点七，齐、晋、楚、韩、赵、魏、燕等国的都城可定为零点六或零点五，更小的诸侯国都可定为零点四。实际政治中心按其名义首都应得的系数减去零点一，如东汉末年的许（今河南许昌）属分裂时期的主要首都，应为零点七，邺成为实际政治中心期间可定为零点五。名义上的首都仍按实际首都的系数确定，因为

一方面这类首都毕竟还在行使一定的首都职能，另一方面我们在确定其首都功能系数时已经考虑了这一因素（详见下述）。

（三）都城所代表政权的疆域幅员

以当时在中国（此概念大致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定）并存的全部政权的疆域为一，大致测定该政权所占的比例，各政权的系数合计不能超过一。但考虑到首都所起的作用应限于已开发地区或已设置政权的区域，所以在测定总面积和各政权的面积时，都应扣除未开发地区或未设置政区的部分，也不计未设置首都的游牧民族政权或还处于开发初期的其他民族地区。如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仅计各诸侯国。建都期间的疆域范围，选其比较稳定的阶段，不计临时性的变化。但如果该政权的疆域前后变化太大，可分段确定不同的系数，分段计算。

（四）首都对政权的控制程度

根据各政权行政制度的总体性质确定：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如明、清为一；中央集权政权如唐安史之乱前、宋为零点九；部分实行分封制或部分被分裂割据的政权为零点八，如西汉前期、安史之乱后的唐；分封制政权如西周为零点七；分封与部落联盟结合的政权如商为零点五。处于分裂状态的政权如五代各朝，由于已经只计其实际控制的疆域，因而只考虑其行政制度本身，仍可按中央集权政权定为零点九。而部分分封或部分被分裂割据的政权，则因依然计其全部疆域，故应考虑其实际行政控制能力的下降。

（五）遗址遗物的保留程度

指迄今为止，一个都城在拥有首都或政治中心地位期间还存在并被发现的遗址和遗物，不包括其他时期留下的遗址遗物。如杭州应限于南宋，而不包括北宋或唐代的；

南京只指六朝和明初，不能计元代或清代的。以北京为最高值一，其他古都依次模拟，定为零点九至零点五不等。如今城市的名称与当时的都城名称完全相同，也应视为一种遗物得到保留的因素，可在不超过零点一的幅度内适当增加其系数。

（六）今城市的政区等级

以首都为最高数一，以下依次递减：省会、直辖市城区、自治区首府为零点九，地级市城区为零点八，县级市为零点七，县为零点五。县城以下单位本身不是城市，不可能作为任何一个古都的后身，只能依附于所在今县的县城，因而不必考虑县城以下单位。

（七）古都与今城市的重合度

以古都的遗址或复原范围的中心与今城市习惯计程中心之间的距离为准。距离在五公里以内（含五公里，以下同）又与今城市的市区（不包括与传统城区分离的今建置市区，以下同）大部分重合的为一，如明、清的北京与今北京，南宋的临安与今杭州等；距离在五公里以内但只有一小部分与今市区重合的为零点九；距离在五公里以上十公里以下的为零点八；十公里以上十五公里以下的为零点七；十五公里以上二十公里以下的为零点五；二十公里以上二十五公里以下的为零点五；其余以此类推，最低值为零点一。

（八）古都与今城市的继承性

凡古都废后的政区即与今城市的前身在同一政区并治所相同的为一，如明、清北京与今北京市，北宋开封与今开封市；古都废后虽未明确归属，但以后明确属于今城市所在县级政区范围之内的，或者古都废后设置的政区虽已迁移，但遗址完全坐落在今城市范围之内的，均为零点九，如殷都与今安阳、南朝陈都建康与今南京市；古都废后所

设置的政区及主要居民迁治的政区即今城市前身、二者又为邻县的为零点八，如今安阳的前身为北齐灭后邺都所迁，邺都遗址所在的临漳县为今安阳县的邻县；有以上迁移关系但与今城市所在县仅隔一县的为零点七，其余均为零点五；古都废后与今城市的前身所在政区既非同治又无迁移关系，在本县范围内为零点五，邻县内为零点四，其余均为零点三。

（九）综合知名度

这是一项比较模糊且难以定量的指标，但可以通过比较来确定。所谓综合知名度，就是既基于建都时期在国际与国内的知名度，也要考虑都城废后直到今城市在国际与国内的知名度。拟选择公认的最知名古都北京为一，将进行评估的其他古都比较后以零点一为差距分为若干级。如以“七大古都”言，西安可定为零点九，洛阳可定为零点八，杭州、南京可定为零点七，开封可定为零点五，安阳可定为零点五。但这项系数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一个古都有了重大的考古发现，或者作为古都后身的今城市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了，这项系数就应加以修正，而其他古都的系数可能就相应降低了。

其他还有一些因素可以考虑，但限于目前的史料和考古发现，要对古都普遍加以评估还有困难。

例如古都的城市面积，本来是一项很重要的指标，但有些古都已经作了很彻底的发掘和调查，有的有比较详细的文献资料，有的却至今无法复原。而且社会是在进步的，后期的首都的规模超过早期的首都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首都不如后期的重要。如果只讲绝对数字，那么早期的首都或许都无法与今天的大都会相比，岂不成了越近越重要吗？显然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将古都与当时世界上和中国内部的其他

城市相比，确定他们的相对地位，由此来评出应得的系数。如当时居于世界第一或前列，应定为一；中国范围内居第一，可定为零点九；其余类推。

人口数字也是如此，绝对数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百分比以及占该政权总人口的百分比。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能够确定这一百分比的古都还很有限，有的根本没有可信的数字，有的各人的估计数又截然不同。

经济和文化的发达程度同样是难以量化的，只能在同时代作比较，但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作这项评估的意义并不大。因为我们的评估范围只是当时的都城，如果是在大一统王朝，其首都的经济文化肯定要比同时存在的民族政权、边疆政权或短期割据政权的都城发达；如果是在分裂时期，各政权的都城间除了少数相差悬殊的情况外，往往很难比较。如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要列出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程度的序列恐怕不是容易的；三国时的洛阳是在废墟上恢复的，未必胜过成都、建业；北魏的洛阳虽可肯定已超过了南朝的建康，但东晋与南北朝其他阶段各都城之间就有各领风骚的现象。

不过，如果是对某些具体的都城进行评估，而这些都城又具备了定量或比较的条件，还是可以补充若干系数的。

三、以南京、安阳、杭州为例的评估

笔者的这项研究还在继续进行，详细的结果尚未最后形成。为了就教于古都学界同人，也为了答复有人对“七大古都”说的责难，现在就先以“七大古都”中的南京、安阳、杭州为例，运用本文提出的方法作出评估。评估的项目同上列九项，表中用了简称。各项数据的确定标准已见上述，不再一一列举。列表见下页。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上这三个古都的排列次序是南京、安阳、杭州。安阳的综合指数高于杭州，列于“七大古都”是当之无愧的。当然，由于其中部分指针缺乏准确的数据，不同的作者所取的系数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笔者已尽量采取客观的态度，在以安阳与杭州的比较中特别注意了这一点，自信是经得起驳难的；至少可以说，安阳与杭州是不相上下的。

	南京					安阳				杭州	
	建业	建康	江宁	应天	天京	殷	邺1	邺2	邺3	杭州	临安
建都时间	60	270	38	53	12	273	16	35	43	71	138
都城性质	0.6	0.7	0.5	0.9	0.7	0.8	0.8	0.6	0.7	0.5	0.8
疆域幅员	0.3	0.4	0.2	0.9	0.3	0.7	0.5	0.4	0.3	0.1	0.4
控制程度	0.8	0.9	0.8	1.0	0.8	0.6	0.8	0.8	0.8	0.8	0.9
遗址遗物	0.5	0.6	0.6	0.9	0.8	0.7	0.5	0.5	0.5	0.7	0.8
今城等级	0.9					0.8				0.9	
重合度	1.0					1.0	0.6	0.6	0.6	1.0	1.0
继承性	1.0	0.9	1.0	1.0	1.0	1.0	0.4	0.4	0.8	1.0	1.0
知名度	0.7					0.5				0.7	
合计	2.72	23.15	1.15	24.34	1.02	25.68	0.25	0.32	0.69	1.25	20.03
总计	52.38					26.94				21.28	

说明：邺1指东汉末实际政治中心及魏都（204—220）。
邺2指后赵及冉魏都城（335—370）。
邺3指东魏及北齐都城（524—577）。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第六七—七五页。

书系
人文千秋

就事论事与不就事论事

——我看《怀柔远人》之争

《二十一世纪》先后发表了周锡瑞、艾尔曼和胡志德、张隆溪的观点各异以至针锋相对的文章[1]，张隆溪的文章还引述了我的观点。这些文章以及它们所讨论的何伟亚的书《怀柔远人》，都是中国历史或与研究中国历史有关的问题，但参与者却还没有一位是在中国的中国学者，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应该说几句话，尽管中国的“后现代”或“前现代”学者也许都会反对我的意见，当然更谈不上作他们的代表了。

但我也有些犹豫，因为读了艾、胡二位对周锡瑞的反批评文章后，特别是看到他们对周锡瑞“向『后现代』宣泄恶意”的指责和“周锡瑞对何伟亚的批评如果机遇好，大概还会得到来自各个政治阵营的许多名人及领袖们的首肯，比如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严复、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福山、克林顿乃至江泽民”这样的政治判断以后。因为首先，我根本不认识何伟亚、艾、胡二位和周锡瑞，此前没有读过他们的论著，张隆溪虽在哈佛燕京时见过几次，也已十多年没有联系，谁知道他们是哪一派？“后”还是“前”？要是机遇不好，撞上那一派的枪口，岂不自讨晦气？其次，我手头没有《怀柔远人》的原版书，自然无法像他们那样作逐字逐句的讨论，更难作中、英两种文字间的对勘。

不过我还是主张，讨论问题不妨就事论事，不必扯得太远。看一个观点、一句话是否正确，可以不问持有此观点或说此话的人是谁，有什么身份，代表哪一派。批评一本书、一个观点，同样不要动辄与“后现代”、“前现代”联系在一起。当然，我绝不反对就某种学术流派、某种思想体系进行评价或讨论，但这至少应该在具体问题讨论出

1 〔美〕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h）：《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美〕胡志德（Theodore Huters）：《马戛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张隆溪：《什么是“怀柔远人”？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式史学》，《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二月号。

一个结果来以后，而不是先入为主，因人、因派立言。既然是讨论《怀柔远人》，应该先就书论书，对批评或赞扬的人都不必问是什么派。或许我说的完全是外行话，但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的读者多数还是我这样的外行。

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马路上的“大辩论”，参加者先要自报家门，什么出身、什么身份，然后才能发言。又记得当年如要批评某一句话或某一个人，先得弄清他的身份或背景，否则，说不定就会被套上一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态度问题”或“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帽子。同样一句话，此人说了就是真理，彼人讲了即成反动。这次看到诸位的笔仗，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了这些旧事。

至于“来自各个政治阵营的许多名人及领袖们”的机遇，我看还是不要考虑为好。真有这样机遇的话，或许何伟亚的书比佩雷菲特的书更会得到毛泽东的青睐。要是这本书早出二三十年，说不定我们不得不多学一条“最高指示”。这自然只是一种假设，请不要当真。但我宁可相信这一段话有翻译上的错误，否则艾、胡二位所“敬重的学者”何至于将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严复、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福山、克林顿与江泽民这些价值观念截然不同的人物列在一起？试问二位能举出哪一种这些人物都一致赞赏或反对的观点来吗？

即使诸位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请求对我的文章网开一面，就事论事，因为我只想对《怀柔远人》的一个基本估价说一点看法，而不准备对它可能代表的“后现代”说三道四。

不过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就事论事就不够了，我想研究其他历史也应该如此。

各位用颇多篇幅讨论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老实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或高明的地方，对中国学者，特别是史学家来说，这本来就是常识。能识字看书并能正确理解史料的含义的人未必就会产生高明的见解，但连字面意思都不能正确理解的人的高见又从何而来？一个不懂英语的人要研究英国历史，虽然不是绝对不行，却完全取决于有没有合格的翻译，要不岂非胡闹？就是读懂了文字，还只是有了就事论事的本领，何况确实还没有完全读懂？

譬如“文化大革命”，从字面上说，无论如何革命，如何大，总不会超出“文化”的范围吧！要翻译也罢，考据也罢，只能在“文化”上做文章。只有了解这段历史真相并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文化”的含义。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可谓不胜枚举，我想对“怀柔远人”及有关的词汇应该这样来理解。

要评价乾隆对待马嘎尔尼来访的态度是否合理，措置是否恰当，当然要仔细研究具体的史料，但更重要的是从整体上理解乾隆及清朝政府对待外国的观念，以及产生这种观念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我曾经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过《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与开放观》一文[1]，对自秦汉以来至近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作过分析。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作过进一步的论述。对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一事，我也曾在《读书》上发表过《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和《世界上不止有中文》，在后一篇中还专门将故宫档案《英使马嘎尔尼来聘案》与根据英文原本翻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作过对勘，并对此事作了历史性的分析[2]。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能够了解这段历史，我没有将这两篇文章写得过于学术化，因而大概没有被当

1 载一九九三年第十五期，后经修改后收入刘青峰主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二一—二三〇页。

2 《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七期、第十一期。

作中国学者的研究而受到外界的注意，所以得感谢张隆溪这次正确的引述。但在国内，某位“后学”在《原道》第二辑一篇文章的注中已经表示反对我的观点，只是没有说明具体理由。

简言之，从春秋战国开始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和与此相应的“华夷之辨”，经过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的强化，已经根深蒂固，不受到激烈的冲击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即使由于军事上处于劣势而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或者实际上不得不承认对等的或臣服的地位，在自己内部却只当成是对“夷狄”的怀柔和羁縻，心态上更是如此。如北宋对辽、金，南宋对金、蒙古和元。但由于入主中原的非汉族又以“天下之中”或正统的华夏继承人自居，这种天下观因此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主人而已。

唐太宗出身在一个非汉民族大量移居中原并与汉族广泛通婚的时代，连他本人的家族也具有“胡人”血统，在历代帝王中，他的对“夷狄”的观念是最积极、最开放的。如他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但其前提还是“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还是他视“四夷”为赤子，而“四夷”对他如父母。[1]与那些实际上视“四夷”为禽兽的人相比，唐太宗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他将“四夷”与自己的百姓一视同仁，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承认。但他绝不会承认自己与“四夷”的首领、唐朝与“四夷”政权存在兄弟关系，享有平等的地位，所以这之间只能是父子关系，他就是以慈父自诩，而希望“四夷”能当孝子。

我们当然不应苛求古人，因为产生这样的天下观是很正常的，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直到工业革命在西方出现

1 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贞观十三年）及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第六一四九、六二一五—六二一六页。

之前，中国所拥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使它很自然地成为东亚以至整个东方的中心，它从来没有受到过外界真正的挑战——有哪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更大优势的民族或政权能够改变这种观念，或者进而征服中国。入主中原的非汉族最终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就是乾隆本人，当他统治着清朝一千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和四亿人口时，他首先也是以尧、舜、禹的后代和秦、汉、唐、宋的继承人自居，而不仅是作为满洲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

十五世纪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播了一些西方文明，但他们能接触到的中国人是极其有限的，其中能够稍为理解的人就更少。乾隆的祖父康熙或许是清朝统治者中最开明的一位，但他对西方文明的接受也仅限于具体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更何况在传教士基本被逐的乾隆时代和远不如康熙开明的皇帝。

无论马嘎尔尼使团和英国政府出于什么目的，无论这次使命的历史作用如何，在中国这一方面、尤其是对乾隆来说，只是接受一次“远夷”的进贡。之所以要特别隆重，是因为来者声称补行“恭贺万寿”之礼，而且该国在万里之外又主动请求来朝，这足以证明天朝的威望的确已经“无远弗届”。今天我们批评乾隆如何顽固保守也罢，赞扬乾隆如何明智正确也罢，其实都是太抬举了他。因为他对马嘎尔尼使团的接待方式、他所坚持的礼仪（包括必须行叩头礼），都不是他别出心裁，而是当时以至千百年来的通礼定制，既不是对英国人的优待，也不是什么歧视。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如何接待“外藩”或“夷狄”首领的争论，如西汉后期对如何处理匈奴单于“入朝”[1]，唐太宗时

1 见《汉书》卷八《宣帝纪》及卷九四《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七〇页。

如何对待突厥等族的降人[1]，但对接待马嘎尔尼“来朝”一事，乾隆朝野毫无异议，以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学历史教授还在课堂上引述史料，证明乾隆的“天威”使马嘎尔尼最终不得不下跪[2]。

这种观念和心态，不仅长期存在于中国统治者心中，在中国民间也具有广泛的基础。文化大革命初期，来访的外宾是否佩戴毛主席像章，手持“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开口是否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度成为判断他是否友好的标准。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访华，并预定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中与他会见后，我听到的上海市党政干部会的传达报告就称这是“帝国主义的头目终于打着白旗到中南海投降了”。毛泽东本人和少数中国领导人或许清楚尼克松来访的真实意义，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项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却着实陶醉了一番。与此同时，上海又作了空前规模的隆重准备，连美国人根本不可能到的地方都尽最大的努力作了清扫和粉刷，尽管接待的方针也是“不卑不亢”（这是乾隆当年上谕中就用过的话）。这些事例应该能帮助人们想象当年乾隆“怀柔远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或许有人可以举出他们的什么新发现，来证明乾隆有过与传统做法不同的“驾驭外藩”之道。但根据我对原始资料的理解，实在看不到这种迹象。而且，任何正确的判断和举措都是以全面正确了解情况为前提的。但实际上，乾隆及其身边的大臣根本不了解马嘎尔尼的真实意图，对英国也几乎一无所知。他们都不懂英文、拉丁文或任何一

1 见新、旧《唐书》中《太宗纪》及有关传记，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第三七九八页。

2 此事记得见于周一良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连载于北京的《史学理论研究》杂志，洪业（煨莲）教授上课时引《蕴山堂集》诗句证明。但客居无书，无法注得更具体。如误记，亦请谅解。

种西方语言，而全部英方文件的翻译又被有关官员下令按中国的惯例作了歪曲性的改写[1]。不用说什么“工业革命”、“东印度公司”、“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扩张”，就是连英国究竟在哪里、有多大，他们也不知道，又怎么可能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呢！在乾隆及其臣工们的眼里，马嘎尔尼一行无非是想以祝寿进贡为名，捞取天朝的好处，并提出了非分之想，表现得桀骜不驯，因此必须既以“天威”加以震慑，又要用厚赐来怀柔。正因为如此，在关系到天朝体制的方面，哪怕是一些细微末节，也难以通融，而对经济利益则毫不计较，给予的各种“赏赐”和允许免税出口商品数量都大大超过了英国人的愿望。至于在叩头问题上的变通，只是乾隆不想把这件已经尽人皆知的“远航祝寿”太平盛事弄成不愉快的结果，扫了自己的兴，对英国这样从未沾染过王化的“远夷”也不值得过于顶真。还应该指出：马嘎尔尼最终没有行叩头礼的事，除了乾隆与英国人之外，在中国极少有人知道，并未造成什么影响。我很怀疑知道的人被要求保密，或者命令他们作相反的传达，所以才会有人写出歌颂“天威”使英夷身不由己地下跪的诗句来。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经常能听到国际形势如何大好，洋人如何被中国所折服的“内部报告”一样。

实际上，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时，乾隆的孙子道光皇帝和满朝大臣对英国的了解依然相当可怜，以至连起码的判断和准备都不可能。关于这些，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一书[2]已经作了非常客观而规范的学术性论述，我就不必多说了。

最后，鉴于诸位都谈到了史料的发现和解释问题，我还想说几句话。新的发现不一定来自新的史料，这一点我

1 详见前面提到的发表于《读书》的拙文。
2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

完全赞成。但任何新的发现都必须建立在该史料所涉及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中国以往的官方史料、书面记录往往与实际相差甚远，甚至会截然相反，例如“款服”很可能是用金帛美女换来的，“去思碑”的对象往往是一位贪官，安居乐业的实际完全可能是家破人亡。但是史料与实际的差异又各不相同，如果一味作毫无依据的推断就难免失之公允，自我陶醉的“新发现”很可能成为一个笑话。

中国人和懂中文的人研究中国历史，未必都比洋人或不懂中文的人高明，但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事实、对史料的字面意义都不能正确理解的人——不管他是哪一国的——又怎么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呢？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于日本京都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四月号，第一三五—一三九页。

书系

人文千秋

教育问题之我见

有人称今年是中国的教育年，又有人称二十一世纪为教育世纪。具体的提法并不重要，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人终于开始认识教育的重要性了，尽管这一天已经来得太迟了。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说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只是一度不够重视而已。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尊师重教，有其特定的含义，在对教育作出一般性肯定的同时，强调的是政治和道德。由此而产生的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正是过去教育弊病的根源之一。所以，我们在肯定中国教育的传统时，也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教育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弊病，从全新的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新世纪对“师”和“教”所提出的要求绝不是传统的延续。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认真反思以往和目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从一九五〇年上小学开始到目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这五十年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读书，小学、中学和研究生；三分之一教中学；三分之一当大学教师。虽然谈不上有什么经验，至少也是以往半个世纪中国教育的亲历者，所以我有义务贡献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否正确。

一、“十七年”不是黄金时代

不彻底揭露以往的弊病，不清醒地认识存在的问题，就不会有改革的内在动力，也不会有正确的方向。

教育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还是能“彻底否定”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做到。但对“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却含情脉脉，常常作为优良的传统来称颂，用以对比十年动乱，也用之于对比今天，无形中使没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一代人误以为那时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黄金年代。这至少是一种相当片面的总结，一种误导。

我是一九五七年秋进初中的，不久就知道教师中有右派分子。刘绍棠十八岁成名，由“一本书主义”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一直是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的反面教员。以后又增加了因为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问题严重而“叛国投敌”的傅聪，据说他只能在外国酒店里拉小提琴度日。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教育革命，使我们这些中学生也沉浸在狂热之中，整天放不完的“卫星”、报不完的喜——全班消灭错别字，消灭不及格，全校通过劳卫制（劳动卫国体育锻炼标准）。但刚送完喜报，新的“卫星”又放了上去，有的班级已全部达到五分，更有的班组提出初三学完高中课程了。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钢铁元帅”升帐，学校不止一天地停课，学生的任务是收集废钢铁——将弄堂的铁门、一些房屋的钢窗和一切钢铁构件拆下，将完全可用的铁锅和用具砸碎，由教师在操场上架起土高炉，通宵达旦炼成一堆废渣，然后师生一起抬着这些“钢”到区里报喜。到了全市消灭麻雀时，我分配到的任务是站在屋顶号呼驱赶，不让麻雀有喘息的机会。为了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下午还要到学校附近的巷子里去教老妈妈识字，要到她们摘掉文盲帽子才算完成任务。

一九六〇年我考入高中，这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专门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重点中学其实也是相当革命的，至少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是如此。高中阶段经历的大事，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是“反修斗争”，当然还有“反右倾，鼓干劲”，批“三自一包”、“三无一少”，例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形势报告。所以当时我坚信，我们吃不饱饭、有时只能用“光荣菜”（卷心菜老叶加豆腐渣）充饥完全是苏修逼债的结果，但比起世界上三分之二还没有解放的人民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同胞，我们是何等幸福！在反修学习的讨论中，我滔滔不绝地重复报纸上看

到的和形势报告中听到的内容，理直气壮地批判修正主义的罪行，例如赫鲁晓夫重用知识分子，排斥工农干部，提拔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当中央委员，替换老布尔什维克和老红军，岂会想到改革开放后我们“修正”得更彻底！

在我高中的后两年（我因病休学一年多，到一九六四年才毕业），由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条最高指示的发表，阶级斗争的弦已经越绷越紧。除了不断听到国内外阶级敌人如何不甘心失去自己的天堂、如何进行种种破坏以外，家庭成分和出身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到了决定一切的程度。一九六三年夏我原来所在班级的同学参加高考时，就有同学完全因家庭问题而落榜，而其他班级一位品学兼优、在数学和语文方面都有很高天赋的同学因父亲被镇压而与升学无缘。到一九六四年我的第二批同学参加高考时，一位数学极好、成绩全优的同学与他报考高中的妹妹双双落榜。事后得知，早在五月份班主任就告诉他上大学绝无可能，他还心存侥幸，更没有想到连妹妹上高中也会被禁止。在高考发榜前，忽然一位成绩较差、英语几乎不及格的同学来找我突击补习，原来他接到通知去外语学院复试，尽管他从未报考外语专业。结果他被外语学院录取，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哥哥是某单位的党委书记，显然属于根正苗红。

到一九六四年九月我担任实习教师，一九六五年正式成为中学教师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学校的主要工作和教师的主要职责也已转到了阶级斗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阶级敌人将他们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支持这一理论的大量“证据”就是这些人千方百计让子女读中学，上大学，而出身于这些家庭的学生普遍比工农和干部子女的成绩好。毛泽东“春节谈话”的传达，更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学校的一切教学活

动。既然毛泽东批判了考试是搞突然袭击、教师将学生当敌人，教师就只能承认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而具体表现就是爱成绩好的学生（他们大多出身于敌对阶级），恨成绩差的学生（他们大多出身于劳动人民），并将他们当敌人。其实，学校和教师的教学方法虽然不无问题，却根本没有将学生当成敌人，考试也并不都是突然袭击。毛泽东的说法只是根据个别高干子弟的片面汇报，完全是为了适应阶级斗争路线的需要。在这种说法的煽动下，一些自以为受了压制的干部和工农子女已经将学校领导和教师当成敌人，只等文化大革命一声号令了。这种情况在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或重点学校尤其突出，所以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学校教师的遭遇更加悲惨。

我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虽然是一名努力听党的话的团员，但还不是党员；虽然不是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当时我父亲被定为“小业主”，文化大革命后纠正为“个体劳动者”），但也不属于敌对阶级。在“十七年”的大部分我是学生，只当了三年教师，年龄只相当于同时的大学生；我的经历只能代表“十七年”的教师和学生中受害最轻的那一部分。此外，我完全没有大学的经历，自然不能代表大学的情况。不过，根据我进入大学后的见闻和这些年来看到的数据，可以肯定，大学的情况只会更“左”。我完全有理由说：“十七年”的教育，特别是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早已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绝对不是令人怀念的黄金时代，更不能成为未来教育改革的样板。当然，在此期间的学校和教师并不是没有值得肯定的成绩和可以继承的传统，但这是由于错误的教育路线和方针还来不及加以彻底破坏，而不是它们的成果。

目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弊病或存在的问题，从表面看

似乎与改革开放以前差不多，某些方面甚至更加严重，但我们必须看到两者的本质区别。解决的办法是改革，是创新，而不是回到“十七年”去，更不应该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谓“教育革命”中去寻找“经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或“十七年”的人如果自己想享受一下，可以悉听尊便，但如果想拿我们的下一代来作试验，就将成为千古罪人，必定受到历史的惩罚。

二、素质教育并不排斥应试

现在提出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就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素质而言，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但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作为教育的两个侧面，提倡一个，反对一个，似乎两者是根本对立的，却既不符合实际，在理论上也说不通。

所谓应试教育，据说就是将考试当作教育的目的，学校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考试转，或者只根据考试的结果来评价教育质量和学校的水平。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考试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学生重视考试，当然是为了获得好成绩，取得精神或物质的奖励，升入高一级学校，或找到好一点的工作。教师重视考试，当然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成绩，作为自己对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标志，也作为晋升职称和工资的根据。学校重视考试，因为只有考试的结果才能说明本校的教学质量和成绩，提高排列的名次，进入或保持各类重点学校的地位。而教育行政部门之所以重视考试，无非是希望通过考试来检查和考核所属学校及其教师的业务水平、教学质量和办学能力。就是家长重视考试，也只是为了了解子女的学习情况，目的还不是为了子女的前途？试问，有谁会将考试当作唯一的目的？所以，反对以应试为目的，本来

就是找错了对象，或者只是找到了一个假想敌，还能反出一个什么好的结果来？

再说，你可以找出考试的成千上万的弊病，却找不到任何可以代替考试的方法和手段来。不仅从小学到研究生都离不开考试，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只要不是人人都有的机会，只要客观条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主观需要，只要有区别人与人之间差距的需要，就必须要有一种加以选择和区别的办法，而考试无疑是最公正的手段。考试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却并无二致——让受试者在同样的条件下，显示出自己的知识、技能、经验、能力或优点，以便检验其已经达到的水平，加以区别，排出顺序，确定等级。有时我们将实践当作考试的一种方式，比如一个人能够开着汽车顺利通过闹市区，或者安全驶完一段险路，可以说他已经掌握了驾驶技术。但如果要你确定他的技术等级，或者要将他的技术水平与其他人比较，那就只能设计出一个规范的标准，给他们予同样的条件，就必须用考试的方式——尽管未必要在课堂，或采用书面回答——却必须使用相同的标准，或者由同一位考官作出判断，否则就不会有公正的结果，也就失去了考试的意义。

我们提倡素质教育，重视学生的素质，采取措施提高学生的素质，固然非常必要，但如果不通过适当的考试，又如何能肯定或检验学生的某项素质确实提高了？而且，每个学生的提高程度不可能都相同，要确定每个学生的提高程度，除了考试又有什么其他办法？例如，我们要了解学生的身体素质，可以通过体格检查，由于使用的仪器是标准的，医生的判断也是尽可能标准的，这实际上是一场考试。要反映身体素质的另一方面——运动水平，更只能通过一个个项目的考试。就是比较抽象的思想和道德素质，也只能通过具体的标准来进行鉴定，采用知识、言论、行

为等多方面的指标才能确定，这不也是考试吗？要是没有这些考试，素质教育的成绩岂不成了随心所欲的评判？再说，在学生毕业离校以后，等待着他们的也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公务员、律师、会计师、经济师……哪一样不要考试？招工、招聘、提升职称、申报项目、申请资助、评奖、竞选……哪一样不是种种形式的考试？谁都知道，除了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优秀以外，应试的本领（或者直接称之为考试诀窍）同样是很重要的。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如果没有显示自己的优秀素质和能力的手段，必定会白白丧失大量的机会。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大多数学生的应试能力还不够，还要大大地加强。

有人为了进行对“应试教育”的批判，往往把目前的教育比之于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将“应试”的后果模拟于科举考试的弊病，其实同样是不公平、不科学的。恰恰相反，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的一项杰出创造，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所以才能在中国持续千年而不衰。而且在世界上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都形成了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各类人才的制度，如招生、招工、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晋升、特殊人才的发现，一般都是由考试决定的。

在分析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片面认识时，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把制度比喻为一条流水生产线，那么需要由这项制度来操作的具体内容就像投入生产在线的原料，原料不同，最后的产品自然也不同。所以，制度是否合理就像一条生产线的设计是否合理一样，而产品的优劣并不仅仅取决于生产线本身，还与投入的原料及操作人员有关。这样来判断一项制度，就可以区分哪些是制度本身（生产线）的毛病，哪些是执行制度者（操作人员）或具体内容（原料）的问题。”我认为，科举的弊病主要在于考试的内容（如八股文）和执行制度的人（各级考官）的

腐败，而不是制度本身。正因为如此，清末废科举只是废了考试的形式和内容，并没有废除考试制度。同样，我们今天可以改革考试的方式和内容，但绝不能取消考试。

近年来在高考和其他统考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没有超出方式和内容的范围。如语文考试的形式和内容、八股式的作文要求、一些试题含糊不清或概念错误、阅卷教师评判有误、考试中的舞弊、过早分科、复习过程中的投机猜题、考试前的反复模拟、学生的真正水平得不到显示、个别优秀学生落榜、学校和教师忽略未列入考试范围的教学内容等等，大部分是可以改进的。但考试作为一种手段，是无法解决手段以外的问题的。在供需悬殊的情况下，如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能进入高一级学校或重点学校，竞争的激烈既然存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至社会各方面都在考试上做文章也就无法避免。世界上的杰出人才，哪一个不是通过激烈竞争才脱颖而出的！只要竞争规范，激烈一些又何妨？如果按照有些人的看法，考试有百弊而无一利，岂不是应该取消吗？那么用什么方法来选拔学生呢？莫非要回到“工农兵推荐”的老路上去吗？

有人以为推荐的最大弊病是不正之风，是谋私，其实推荐的最大问题还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即使举荐者完全出于公心，他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标准和好恶来区别优劣，排定名次。一位小学校长心目中的天才，可能与大学教授的标准大相径庭；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尖子，肯定不会处于同一条起跑在线；传统教育观念下的优秀学生，未必能适应新学科的需要。如果一定要实行推荐的话，我们将不得不首先了解和确定推荐者的水平，然后才能相信他们的推荐对象。所以推荐的方法，在很小的范围中还行得通，如现在一些高校给某些质量有保证的重点中学以一定的保送名额，国外一些高校将负责任的推荐信作为录取研究生

的重要根据，诺贝尔奖评委给他们信得过的若干个人以推荐候选人的资格，但要扩大到全局就无法实行，这也是推荐至今无法取代考试的主要原因。

总之，应试教育不是素质教育的对立面，应试与提高素质并不矛盾，规范合理的考试制度是提高学生素质和教育水平不可或缺的环节。

三、症结所在：资源不足和需求过度

最近金华发生了一名高中生因名次达不到母亲的要求而与母亲发生冲突，以至杀害母亲的惨剧。这一恶性事件和由排名次、加重学生负担引发的问题促使教育行政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减轻学生负担，命令禁止学校给学生按学习成绩排名次。这些措施当然是正确的，也能收一时之效，但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这些措施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就说排名次吧，公开的可以不排，暗底下能不排吗？除非全部取消成绩，不记分数，否则学生的成绩总会有高低，分数总会有多少，教师不排，学生也会排；全校不排，班级中也会排，小组中更会排。如果全部不排名次，需要某种学生时如何选拔？总不见得什么事都全部上吧！先进模范如何确定？难道能乱点鸳鸯谱？更何况学校里排名次的事多得很，学习成绩不排，还有文娱活动、体育比赛，总得有名次吧，否则如何激励学生竞争向上？如果因此而釜底抽薪，取消一切竞赛和评比，排名次固然可以避免，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恐怕不会比排名次的消极作用小。

再说减轻负担。来自学校或教师的负担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加以减轻，来自家长和社会的压力就无法由哪一个领导部门或个人来消除了。在机会有限的情况下，除了那些稳操胜券的学生（如个人绝对优秀，家庭有强硬背景等）外，

其他人都会各显神通，尽其所能，而绝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就是自愿加重负担，用多做习题、多看辅导材料、多补课等办法进行强化训练。这是谁也不能禁止的，也是谁都禁止不了的。

所以根本的原因还是教育资源匮乏，远远无法满足民众的需要，使求学、升学、选择学校或专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的教育基础本来就相当薄弱，改革开放以前又饱受大小政治运动之害，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有的学校和教师受到很大的破坏和摧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了巨大进步，但欠债既多，投入又长期不足，现有条件依然适应不了全社会的需要。

国家有义务教育法，但不少地方缺乏义务教育的基本设施和手段，连学校和教师都不够，只能靠实行“希望工程”来弥补。而且现有中小学的设施和师资大多还很差，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只有少数重点学校或特色学校，以及近年来出现的被一般人称之为“贵族学校”的民办学校，才能使学生的质量和升入高一级学校有较大的保证，这当然会成为绝大多数学生和家长追逐的目标。但后者要收高额费用，能通过考试进入的只有前者。现在不少地方取消了重点小学与初中，但条件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谁不想进好一些的学校？正当的办法想不出，就只能走不正当的门路。而且即使初中没有重点，要上大学还得过高中这一关，而高中的重点与非重点差别更大，竞争只会更激烈。与全国的高中毕业生相比，大学入学名额真是粥少僧多，地区间的差异也实在太大，如北京、上海能进大学的高中毕业生超过三分之二，有些省区却不足六分之一；以至同样的分数，在北京、上海能进一类大学，在其他地方或许连电大都进不了。毫无疑问，那些地方的竞争必定比北京、上海激烈得多，学生受到的压力也要大得多。

这里我不想全面评价重点学校的优劣，但在教育资源不足、学校之间差距悬殊的情况下，重点学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谁也取消不了。要取消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将重点学校降到一般的水平，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一是将其他学校提高到重点学校的水平。我们当然应该采用后一种办法，但现在远没有做到，竞争的压力自然也不可能消除。

既然中国的教育资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不能满足国民的需要，政府和社会对学历和学位的要求就应该与现状相适应，不要提不切实际的要求，不应该盲目追求高学历、高学位。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然应该，但知识与人才并不与学历、学位绝对成正比，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高学历和高学位。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大学，更不是都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社会需要不同层次的各类人才，并不需要每一个成员都达到最高学位。即使是在一所名牌大学或研究所，也需要一定比例的辅助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个人的素质存在差异，总会有一些在体力、智力方面不适宜接受高等教育，或者无法获得高学位。对一般的岗位要求过高的学历和学位，既浪费了人才，也过度消耗了教育资源，加剧了供需矛盾。

例如，对干部“知识化”的要求往往变成了“文凭化”或“学位化”，于是出现了科员拼“五大”，科长专转本，处长要硕士，局长混博士这种全员求学位的怪现象。干部的实际知识水平没有提高多少，却从本来就不足的教育资源中又挖去了一块。又如，一些单位不顾人力资源的成本，片面提出学历或学位的要求，如中学教师要招博士，一般文员非本科不用。加上传媒的不适当宣传，给大家造成了一个上不了大学就没有出路、当不了博士就不能成才的错觉。实际上，不同的岗位需要不同的人才，不同的学历和

学位适应不同的需要，任意错位不仅造成人才的浪费，而且会适得其反。像博士到中学工作，如果是去研究中学教学，当校长，作讲座，或许能发挥作用，如果是当一般教师，就未必比师范本科毕业生强。

在教育资源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政府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况制定人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规划，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使两者相适宜。舆论界也不要作不切实际的宣传，刺激民众对教育资源的过度需求。这样使广大学生和家长保持清醒的、现实的目标，减轻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减负才有可能，教师、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或许就能少用或不用排名次的方法了。

四、并非教育的“教育”问题

经常看到一些有关教育的消息，如小学生书包太重，中小学生补课成灾，学校滥发复习资料，教师热衷于当家教，等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教育主管部门或一些学校采取了改进措施的报导，如有的规定课外一律不许补课，有的下令不得再发行课本以外的补充教材，但效果似乎并不大，往往旧的陋规没有完全改革，新花样却又出来了。所以我对教育行政部门最近采取的措施虽然乐观其成，却不无疑虑，因为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相当多的问题并不是出于教育思想或观念方面的原因，更不是简单的教育方法。

就拿补课来说，本来只是对学习差而跟不上进度的学生的权宜之计，或者是在重要考试之前的一种应急措施，现在却成了一些学校中“正课”的一部分，从起点班到毕业班，从差生到优生，从开学到假期，有的甚至规定人人都要参加各种补课班。于是出现了该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却要放到补课班上讲、考试的复习范围只有在补课班上才能

透露的怪现象。又如课余辅导，本来是为了满足少数学生的特殊需要和兴趣爱好，现在却成了一些学校的常规教学内容，学生个个都得参加，不是学外语，就是练电子琴，或者学书画。不少幼儿园也办起了人人有份的辅导班，有的连“教材”、乐器等也得统一购买。

教师个人也各显神通，各类学校中几乎都有一部分人在各种补习、辅导班中兼课，担任个别家教，还有包住包吃寄托式的家教，学生家长一起参加或单独辅导家长的“家教”，个别教师还定了只有请他为家教才拿出辅导绝招来的陋规。

不用说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校长、教师，就是稍有教育常识的人也都明白，这些做法绝不是正常的需要，效果如何也是不言自明的，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乐此不疲，此风会愈演愈烈，屡禁不绝，花样越来越多呢？我以为根本的原因还在师德和经济利益这两方面。

如果校长和教师都重师德，就不会将本来应该做的工作当作“补课”、“辅导”或“家教”来安排，更不会围着一点蝇头小利转。常听到某小学规定学生要订几份规定的报纸，购买上门推销的保健用品，让学生参加由旅行社承包的长途春游，使用由校长或教师编写的“辅导教材”，等等。有关人员要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难道会干这样的蠢事？

但是，如果离开了教师正当的经济收入，师德的提高也难以落实或持久。近年来，教师的收入的确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主要部分并不是靠工资，而是来自学校的产业或名目繁多的创收，来自集体或个人的“业余”收入。因而教师收入的高低，往往不是取决于学校的质量或本人的水平，而是学校创收的能力和本人的额外收入。这类收入往往远远超过教师的正常工资和奖金，但它们非但不与师德

和水平成正比，甚至可能完全倒挂。这种现象不改变，不用说起不到激励作用，就是按劳分配也做不到。

根本的措施，还是要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使校长和教师从创收的怪圈中解放出来。当校长和教师不必整天考虑经费和工资外的来源时，师德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才会有可靠的保证。要是政府一时还不能解决全部经费，也可以考虑其他来源。例如据调查，上海居民每年花在子女课外辅导上的钱就有几个亿。实际上，这些钱有的被南郭先生骗走了，有的流进了办班专业户的腰包，或成了书商的暴利。如果能全部用之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师的收入，从而使学生真正得到提高，岂不更好！所以一方面政府应该保证义务教育所必需的经费，提高这一部分教师的工资，使他们不必依靠补课一类额外收入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公务员需要以薪养廉，教师难道就不需要？另一方面，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产业，容许私人和社会力量兴办非义务制的学校，满足社会的需要，也使另一部分教师能够在这类学校中获得较高的报酬，不必再用补课一类的形式。

当教师的正常收入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收入较高而又稳定的阶层时，加上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师的尊重，教师自然就会成为令人羡慕和追求的职业，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就能作出严格要求，良好的师德和教风才能确立，目前存在的这些弊病才能彻底消除。

原载《开放时代》二〇〇一年第一期，第一一三—一一六页。

人文千秋

我的人文和科学观

多年前，一些学者发起了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当时我虽也颇为关注，但对“人文精神”的确切含义并不十分明白，而且参与讨论或卷入争论的人似乎也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说法。争论的双方都有我的朋友，我也曾将双方的一些意见作过沟通。尽管我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弥合双方的分歧，但我却发现，他们的观点其实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即使看来针锋相对的提法，如果撇开抽象的概念，把话说得明白一点，也不会水火不兼容。

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一度想弄个明白。但稍一留意就急流勇退，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即使不会超过对“文化”所作的定义，大概也少不了多少。所以，我放弃了寻找标准答案的念头，而代之以考虑一种自己的定义。我一直认为，对不同的定义，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取舍，只要自己一以贯之，遵守选定的定义，或者在需要改变时加以说明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人文精神”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所处的社会、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固然是促使我思考人文精神的重要因素，但随着环境保护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迫使我更多地考虑人的价值，即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人类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未来生存空间 · 自然空间》一书中我说明了我的观点，最近的南极之行使我更坚定了原来的信念。

由于要探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可避免要涉及科学技术的作用，使我不得不将人文观与科学观联系起来，或者说在思考人的价值和人的作用时比较注意从科学的角度作一番考察，看看是否现实，是否可行。同时，由于我从事的专业——历史地理——兼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特征，研究的过程也在不断加强我的思考。

不过，我至今还没有形成自以为完整的人文观和科学

观，要不是本书编者的推动，我还没有勇气写这篇文章。也正因为如此，本文不是系统的论述，只是与此有关的一些想法。

一、人要不要精神生活

这些年来，一些人常表现出赤裸裸的物欲，上至党政高官，下至平民百姓，以至历来被视为神圣纯洁的学术、教育、文艺、医务、宗教、司法各界中，都有那么一些人，公然为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不择手段，不知羞耻，甚至不顾法律，不计后果。尽管表现方式不同，这些人所信奉的都是钱和物。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要名誉和地位，但就他们的目的而言，名誉和地位只是换取金钱的手段，对不能为他们带来利益的名誉和地位，他们完全可以弃之如敝屣。如果说，以前有人还会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借口，或者盖上一块遮羞布，现在却已堂而皇之，甚至可以提出理论根据。说一句大白话，就是在这世界上，只有钱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自私自利或个人主义的问题，也不想涉及公与私的关系这方面，上述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此有关，我只想说一点，除了物质生活之外，人要不要精神生活？

表面看来，那些人追逐的只是某一样具体的东西，如一台彩电、一辆汽车、一套房子或者一叠票子，即使如此，在物的背后也还有物质以外的东西。任何一种用品，除了它的实用功能外，一般都有其象征性的、心理的、精神的功能，往往会与身份、地位或权力有关，而且会因地因时而异。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一部单喇叭录音机就足以炫耀拥有海外关系或外汇，提着它在大街上走过，必定会招来啧啧称奇的议论和无比羡慕的注目礼。但如果今天再有

人用它招摇过市，不是被当作找不到工作的民工，就会被人怀疑精神不大正常。当初这部录音机对主人来说，绝不仅仅限于录音或放音，或许他还不懂如何操作，显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满足。同样，在今天穿一条牛仔裤，除非是顶级名牌或十分特殊，否则决不会引起旁人的关注，所以穿的人只是考虑是否舒适或是否美观。但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前，有人穿牛仔裤肯定是出于精神方面的考虑——要么是刻意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么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审美情趣，以至不惜冒受到鄙视甚至被批判的风险。

显然，那种声称不需要精神生活的人并非没有精神生活，只是自己不觉得，或者故意不承认而已。当然也有的人是由于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因而不得不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例如一些知识分子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除了设法维持温饱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精神享受，久而久之对精神生活就会麻木不仁。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性对精神生活的渴望也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就连尚未脱贫的农户过年时也会在家里贴上春联和窗花，在门上倒贴一个“福”字。另一类物质生活已经极其丰富的人却还在拼命攫取财富，他们得到的钱和物已经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甚至为如何花掉这些钱、用掉这些物而发愁。如果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他们完全不必这样做。当一个富商在他十只手指上套上沉重的足金宝石戒指时，当一位贪官不时在计算他的赃款增加了几个零时，当一群暴发户在豪华酒店斗富时，难道能说他们没有精神生活？至于人们在政治压力或暴力作用下被迫放弃某种精神生活时，他们必定已被要求接受另一种精神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彻底“破四旧”的结果毁灭了大量人类文明的精华，剥夺了大批人享受精神生活的权利，但红卫兵的目的是“破旧立新”，代之以红色恐怖、红海洋、“三忠于四无限”，以便建成一个红彤

形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

过度强调精神生活，甚至企图以虚幻的精神生活来抑制或取代物质生活，无疑是不现实的，或者只能用虚伪的形式而存在。尤其是在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盲目地提倡和追求精神生活，结果往往连正常的物质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除非实行强制手段，或者采用迷信欺骗，一般人不可能在衣食不继的情况下追求精神生活。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不顾具体条件，将过多的精力和物力用之于精神生活，必然会影响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古代中国社会曾经有过相当发达的精神生活，创造过灿烂的精神文明。在一个完全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社会中，这样的追求几乎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除了少数已经担任了行政官员的人多少从事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外，绝大多数文人并不直接或间接地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也很少学习儒家经典和传统的人文学科以外的知识。他们不仅鄙视体力劳动，也蔑视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中国历史上不乏杰出的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和人文学者，但科学家、有文化的技术人才却与知识分子的总数不成比例，少数今天被我们称之为科学家的人，往往也是科场或官场失意后的业余爱好者，或者是有职务之便可利用，例如有资格参与天象的观察、历法的修订，或者保管着地图和档案。

但是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忽视社会对正常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看不到精神生活对社会进步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性，甚至将“经济效益”、“为现实服务”作为衡量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唯一标准，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仅仅满足人们最低限度的物质需求，任何一个社会都不难做到。如果将人的需求都物化了，例如吃饭就是为了获取必要的营养和热量，那只要生产达到标准的复合食品

就行了；如果穿衣只是为了保暖和遮羞，那也只要制造统一的制服就行了。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吃饭和穿衣并非单纯的物质需要，而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享受，所以才有所谓的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随着生产的发展，要满足人们对基本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精神生活所占的比例必定会越来越高。如果社会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不足，剩余的生产力就会无用武之地，经济的发展会缺乏动力。另一方面，人们的余暇时间会越来越多，除了用之于健身养生之外，都离不开精神生活。这反过来又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应该越来越多，才能满足全社会在这方面的需求。

追求精神生活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但精神生活离不开人的个性，不能简单地复制，也不一定能不断进步。前人在精神方面的高峰，或许永远没有人再能超越。精神方面的活动主要是通过人来传播的，一旦中断，或许再也无法恢复。精神活动的价值既不能用物质来计算，也难以用现实来判断，今天视为无用的东西或许正是前人经验的结晶和未来智慧的源泉。所以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不讲求精神生活，甚至完全停止精神活动，当时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用毛泽东的话说“地球照样在转”，但这样的中断肯定会导致某些精神活动的衰退或断绝，尤其是那些不绝如缕的孤门绝学。

二、衣食足就能知荣辱吗

十多年前曾经参加过一位高层领导召开的座谈会，在他花了两个多小时谈了如何将城市建成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后，我问他：“你没有谈到文化教育，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文化教育，一个城市能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吗？”

他的回答相当坦率："给我几年时间，等我将经济理顺了，手里有了钱，一定会发展文化教育。"尽管我不完全赞成他的看法，因为不重视的原因并非完全是没有钱，但我还是欣赏他的基本立场——一旦有了钱就会发展文化教育。

不过这并不是一般性的规律，即政府手里有了钱就自然而然会去发展文化教育，或者说有了钱，精神生活就会丰富，质量必定会提高。精神生活当然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不能指望人们会饿着肚子去欣赏古典音乐，也不能要求连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的山村教师讲究仪表风度。即使我们能找到这样的例子，但肯定不会有任何代表性。衣食足了才有重视荣辱的基本条件，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今后也不会例外。问题是此话能不能倒过来说：衣食足了就必定能知荣辱？前些年的确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人口素质、社会风尚，都可以自然提高，现在一二十年过去了，这样的必然结果是否都出现了呢？回到前面那位领导的意见，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的政府有了钱，是否都会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呢？显然未必。

反对我的意见的人会举出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一次次的改朝换代，无数人事沧桑，多少草莽英雄、贩夫走卒、平民百姓成了帝王卿相、达官贵人，以至文人雅士。开国之初或得势伊始，他们或许粗俗不堪，胸无点墨，以至士人落魄，斯文扫地，但稍假时日，或数代以后，这些人的后裔无不知书达礼，至少也会冒充斯文，皇帝同样会稽古右文，士人照样得到重用，两三千年来中国文化，包括其精神文明方面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破坏，但屡废屡兴，长盛不衰。依照他们的说法，目前的情况不过是兴衰间的一个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文化的提高和精神生活丰富是自然而然的事，就像中国历史上曾经一次次重

复出现的那样，所以完全不必作杞人之忧。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从春秋战国至清朝取代明朝，中国基本价值观念和文化走向一直没有改变，所以任何王朝如果要确立它们的政治地位、巩固他们的统治，就不得不接受这一传统并且加以利用。甚至连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尽管已经是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却只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所以，尽管改朝换代，家族兴替，文化或精神的传带者可以变化，但文化或精神本身没有改变，谁想成为统治者、社会的上层或拥有文化或精神财富的人，就只能接受传统的文化或精神。由于传统精神武器从未丧失，因此即使是在大乱之后，精神文化不绝如缕，知识分子也会充满自信，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作不懈的努力。而且由于不存在其他更强大、更有生命力的新文化的竞争，统治者、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也别无选择。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自己没有文化，最看不起儒生，以至当着众人的面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但投奔刘邦的前秦朝博士叔孙通千方百计使他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靠“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使他亲身体会到按照儒家礼制做皇帝的尊严，开始重视儒生的作用。经过叔孙通等儒生不懈的努力，儒家学说在汉朝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是汉朝的皇帝找到了其他治理天下的精神武器，要是儒生们不坚持自己的学说和人格，为了顺从刘邦而将自己的帽子全部改成尿壶，结果又会怎样呢？前一个条件当然是重要前提，但后一个条件是同样重要的。如果没有叔孙通等知识分子的坚持，刘邦等统治者不会自动接受自己原来不熟悉、不喜欢、不感兴趣的传统文化或精神武器，即使他们已经有了足够权力，即使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和发展了，也完全可能将掌握着的人力物力用之于穷兵黩武，修建宫室陵墓，求神访仙。

还有的人会以美国为例：美国开发之初也是物欲横流，

人们不惜一切手段寻求土地、黄金，剥削黑奴。不少产业巨头既无文化，也不讲究道德，起家的手段并不正当。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早已跻身于文化发达国家之列，比之于西方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来也毫不逊色。那些产业巨头也已繁衍出文化层次高的家族，俨然精神贵族。而兴办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医院和各种慈善事业所需款项，相当大一部分就出于富翁的捐赠。在他们看来，中国只要能像美国那样成为经济强国，也自然会成为文化富国，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的发达就是必然结果。其实他们又忽略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的作用，一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作用。美国初期的人口虽然是以因种种原由逃离欧洲的移民为主，但西方价值观念并没有因为他们迁离欧洲而削弱。实际上，从首批移民乘“五月花”号到达美国之际，到十三州宣布独立之初，西方的价值观念从未在美国中断过。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没有改变过。那种认为美国因商品经济发达而“一切向钱看”，不要传统文化，不讲究精神生活，完全是出于误解。还应该看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或者说美国人的母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美国精神文明的源泉和榜样。即使英国人乃至其他欧洲国家的人长期视美国人为暴发户，讥笑美国人是不文明的乡下人，客观上正是促使美国在精神文明上进步，希望他们对欧洲文化亦步亦趋。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新兴的美国人也充分意识到自己在精神文明上的差距。那些暴发后的亿万富翁为了摆脱自己的卑微出身，改变致富过程中的罪恶形象，只有根据西方传统文化的要求重塑自己，教育后代。其他由温饱步入小康和富裕的美国人大多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如果说价值观念或宗教信仰只能起到引导和规范作用的话，法律扮演了强制的角色。有关遗产继

承、捐赠文教和慈善事业、减免税等法律法规迫使美国的大小富翁将大笔资产用之于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公益和慈善事业，使全社会对精神文明的投入大幅度增加。

反观中国的情况，就不容乐观，因为我们正是缺少这两方面的条件。

从价值观念上说，经过二十世纪国内的剧烈变革，特别是经过后期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已被冲击殆尽，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又受到政治与商业利益的双重影响，不仅没有起到创新的作用，反而导致了不少糟粕的沉渣泛起。对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本来就因解释的多变而无法确立，又因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和改革开放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而西方的价值观念虽然早已在中国传播，并随着开放而长驱直入，但影响毕竟有限。加上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抵制，所以即使在中国比较西化的人群中，这种价值观念也往往是实用的、不完整的。今天的中国很难说有哪一种思想或价值观念已经取得了真正主导的地位，从而成为新的精神文明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了足够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人，即使他们非常愿意丰富精神生活，也会不知所从，甚至南辕北辙。

另一方面，中国远没有建立起与物质文明的进步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并不足以引导或强制富人将财富投入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即使是拟议中的遗产税开征，具体的措施还是很不够的。相反，由于近年来党政官员中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以及由此而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正将社会风气引向反面，并且为民间的富人树立了恶例。官商勾结、官匪勾结的黑暗势力正在侵蚀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即使是通过合法途径积聚了财富的新富

人，为了自己的发展，或者仅仅是为了自己生命和财产安全，也不得不顺从或迎合这种黑暗势力。由于官员、富人的社会地位和炫耀作用，他们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为相当大一部分人所仿效。

总之，衣食足只是提供了知荣辱的物质条件，是否能真的知荣辱，至少还要有上面这两方面的条件。

三、人文精神与以人为本

我认为，人文精神的精髓和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将人类的利益放在首位。人类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需求，两者固然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偏废，但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对衣食不继的人来说，解决生存问题自然是当务之急。但即使是挣扎在饥饿线或死亡在线的人，也不能无视他们的精神需求和人格尊严。

以人为本的另一个原则，就是推己及人。自己是人，别人也是人。对自己讲人文精神，对别人也要讲人文精神。关心人，但不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未必就能施于人，还得看别人是否需要，是否愿意。

以人为本，看来十分简单明白，不过遇到实际问题时，一些人的想法和做法往往与这一原则相悖，包括一些自以为很有人文精神或很文明的人。

十多年前，在哈佛大学一所宿舍楼的大厅中，一位娶了洋太太而自然成为洋人的青年在展出他的画。一幅素描上画着一大片低矮的草房和木板房，他特意在上面写着："这是我家乡的旧房，可惜现在已经被拆除，建成毫无特色的新房。"我问了他一句："你家乡人喜欢住旧房还是住新房？"他支支吾吾没有回答。画上的旧房显然并无多少特色，更不像是值得保存的文物，至少在画上没有专门

说明，为什么他非得让自己的家乡父老一直住下去？此人如果十分爱好，完全可以不离开家乡，长住在那样的房子中发思古之幽情，或者好好体会一下其中的人文精神。人在美国，也可以掏些美元出来，请家乡人保留一些下来。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资格阻止家乡人自愿迁居新房。至于新建筑毫无特色，也得看具体原因，刚解决温饱时顾不得那么多，也是情理中事。

类似的情况其实经常能遇到。住在独门小院或高层套房中的专家学者们大谈石库门房子和四合院的优点，现在的石库门和四合院如何宝贵，住在里面如何有文化情趣，却根本不顾目前大多数石库门、四合院早已住上了“七十二家房客”，成了充分利用、无限分割的大杂院，哪里还有什么优点可言！专家学者们考虑过如何维护这些住户的基本人权，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吗？还有些居住在明清古屋中的居民，不仅要忍受房倾屋漏、冬冷夏热之苦，还得面对每天涌来的大批游客，甚至夏天午睡时也得面对门窗外指指点点的人群。在我亲眼看到这一幕时，听到的是主人愤怒的声音：“这房子怎么不早点坍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保护文物，包括保护有价值的旧建筑和成片的旧民居，更不是主张要一律拆除，而是认为研究这些问题时都不能离开对人的关怀，既要考虑他们自己和其他观赏者的兴趣，更应该顾及居民和当事人的权益。我曾经在江西乐安县的千年古村——流坑村作过考察，发现那些积淀着深厚文化基础的古建筑在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霜之后，已经无法满足村民的居住要求和精神生活。有的是古建筑的先天不足，如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厅堂以外的建筑面积狭小，通风和采光条件很差；建筑密度过大，人口增加后没有扩展余地。有的则是变革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造成的，如流坑村当年的经济繁盛是依靠竹木贸

易和水运，其文化的发达也离不开科举制度和当地人雄厚的财力，而今这些都已不复存在，名人用过的书房只能改作卧室，或者用来堆放柴草，甚至权充猪圈。留在村里的人至多只有中学文化程度，就是要打工的青年也只能远走他乡，守着老屋、翻着族谱的老人中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本族本地的历史。如果我们真讲人文精神，难道能不首先关怀这里的人？反之，如果离开了生活在这个古村中的人，即使将这一批古建筑保住了——且不说需要多大的代价或者实际上是否可能——与古建筑同在的文化也就永远消失了。

这些年来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无疑是人类的一种进步。从中国的现实看，环境保护还刚刚开始，还做得很不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环境本身，还是为了生活在环境中的人？在环境保护与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协调两方面的利益，平衡两者的关系？

如果将我们所处的环境分为两部分，即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前者自然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就是后者，只要有人类存在，也难以再保持纯粹的生态平衡，实际早已变成了人类生态系统。人类的利益和需求不可能与所在的生态系统完全一致，即使是关系到长远利益时，人类首先也要考虑自己的生存和繁衍。要是人类自己灭绝了，或者在这一生态系统中的人灭绝了，那么这一生态系统对于人类来说，就不会有什么意义。如果一种昆虫所吃的是人类所必需的粮食，人绝不会等到粮食被昆虫吃完了，再等昆虫的天敌来消灭它们。如果土地的肥力不足以保证粮食的生产，人可能会放火烧掉地面的植被，或者杀死一批小动物、砍下一些植物当肥料，在工业发达后也可能生产出化学肥料，不能为了保持生态平衡而听任土地保持贫瘠。在生存

与破坏生态平衡不能两全时，人类只能选择生存，哪怕这样做会留下长期的祸患。在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与破坏生态环境产生矛盾时，人类可以有所选择和调整，向自然环境作暂时的妥协，但也不会放弃对生活水平的追求。

在人类生态系统中，人是主人，是本位。人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为了自然的完美与和谐才去保护环境，只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去追求自然的完美与和谐，而且判断自然是否完美与和谐的标准只能由人来决定。离开了人和人的利益，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对人类又有多大的意义呢？为了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可以在某一段时间内让某些人牺牲一些利益，但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生存。正如适度人口只能通过人类自觉的控制来达到，而不能用天灾人祸来屠杀一部分人的方法来实现一样。当一头濒危动物危及一个人的生命时，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在不伤害它的情况下保护人的安全。但如果只能在二者间作出选择的话，就只能选择人，即使那是一头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物。同样，在一些人的最低生活水平还无法维持的条件下，即使他们的生产方式有害于环境保护，也只能暂时容许，除非其他人能够在不损害他们尊严的前提下提供足够的帮助，让他们先摆脱困境。一条鲸在发达国家的海滩上搁浅，人们千方百计将它推入海中加以解救，但当它搁浅在非洲海滩时却被饥饿的人们当食品吃了。我们固然应该赞扬解救鲸的人，但也没有理由指责吃掉它的饥民，如果他们确实找不到其他食品、又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的话。如果有谁应该受到批评，那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竟然没有给他们必要的救援，而与此同时一些人正为改善他们宠物的生活条件不遗余力。国际保护南极海豹的条约就将“必要时作为人与狗的食物”列为允许捕猎海豹的例外情况之一，如果在南极活动的人以及为他们拉雪橇的狗到了不得不以

海豹肉维持生命时，平时的保护对象海豹也只能作出牺牲。这样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人的生命的珍惜和对“以人为本”原则的共识。我并不反对保护动物，将人类的爱心施及动物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连动物都会受到人的保护，人对同类无疑更应该关怀有加。何况任何事都有次序，有轻重缓急。与人相比，动物毕竟是第二位的，动物的利益岂能与人类的利益相提并论？

四、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说到底，人文精神只是一种理念。要使这种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就离不开科学精神。

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经常被人们引用，作为中国古人早已对物质可以被无限分割的认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庄子的说法只是一种哲学观念，或者说是一种逻辑推理的结果。“日取其半”，这“半”是永远存在的；如果说哪一天“竭”了，那这一半跑到哪里去了呢？但是从单纯的逻辑推理，也有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反驳：“日取其半”是有限度的，因为到了一定的程度，人已经没有能力“日取其半”了，所以用不着等“万世”，这一过程就停止了。无论如何，这一说法并不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物质可以被无限分割的真理，更不能证明当时人已经提示了物质结构的秘密，了解了分子、原子、中子、质子，或者掌握了纳米技术。只有科学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这一说法才得到了验证，它的科学意义才得到了阐发。

现在往往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实这是今人对这四个字赋予的新含义，并不符合这句话的原意。不过，中国古代的哲人的确不乏这方面的精辟见解，概括起来，都主张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而不

是对自然无限制的索取；认识到人类的局限，而不是将人类的意志强加于自然；注意自然界的休养生息，保持生态的自然平衡，才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爱护人类，也爱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但这些认识并没有成为人类的自觉行动，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自然环境遭受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而主要的破坏因素恰恰是人类的活动。原因何在？就是人类缺乏科学，不能掌握与自然相处的主动。在极其复杂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面前，仅仅凭着一种善意、一种良知、一种观念，而不了解自然界的实际情况和基本规律，想和谐也和谐不了。

应该承认，即使是一位平庸的统治者，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不会不认真办理。例如，资源的利用怎样才算适度？土地利用的方式怎样最有效？水旱灾害怎样才能减少？如果有正确的答案，他们不会不听，可惜长期以来，没有人能够找出正确的解答。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黄河在江苏、河南决口，第二年，朝廷派出的特使阿弥达再次出发探寻黄河的正源，因为当时的人认为，只有找到黄河真正的源头，在那里祭祀河神，才能使河神显灵，保证黄河的安流。乾隆皇帝和他的臣子可谓用心良苦，结果却无济于事。要是当时就能对黄河水患的形成作出科学分析，就不至于把希望寄托在河神身上。

即使对自然规律有所了解，也还得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使正确的认识产生实际作用。例如，早在西汉时人们就已注意到了黄河挟带的巨大泥沙量，也知道这些泥沙的危害。此后直到清朝，不断有学者指出，山区或河流上游的滥垦滥伐是导致中下游河道淤塞、水旱灾害频繁的根源。但在无法缓解人口压力，使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和嗷嗷待哺的灾民有饭可吃的情况下，谁又能制止他们疯狂地涌向山区，采用掠夺式开垦，以便养活他们自己呢？明朝初年，

当局曾将地处今湖北西北，与陕西、河南交界的荆襄山区划为禁区，这固然是为了防止它成为潜在的反势力的基地，但客观上也起了维护生态平衡、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的作用。可是当不断涌入的流民、灾民达到数十万，当局的军事镇压和武力遣送已经无济于事时，就不得不同意他们就地入籍，并设置了新的行政区域。清代中期以降，类似的情况一次次在汉水上游、南方山区、云贵高原重演，但政府除了采取默许态度或最终给予承认以外，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因为谁也无法使如此多的流民和贫民有饭吃、有田种。而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除了充分运用科学和技术手段之外，是别无选择的。所以仅仅从人文精神出发关怀人类，充其量只是给被关怀的对象一种精神享受或精神力量。要把这种精神转化为物质基础，只能依靠科学技术。

即使是科学技术的观念或想法，也只有变成现实之后，才能产生物质产品和社会影响。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从大量史料和实物中发掘出了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但必须注意的是，书中举出的不少成就实际上只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只说明当时人已经有了这样的观念。但这种观念一般都没有引起当时社会的注意，更没有变为生产力，制造出具体的产品，有的只是一种想法，甚至连提出这种想法的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它的意义和后果。比起没有这种想法或观念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种领先或成就，但与已经产生了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相比，毕竟有本质的区别。从提出或假设一个科学原理，到进行证实并加以运用，还需要作长期的艰苦努力，有的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还应该指出，前人的一些科学观念一般都不会是完整的，有的只包含了若干科学成分，有的只是一些基本的、

普遍性的原理，不顾实际地一味夸大拔高，加以神秘化，就会产生迷信。而且其中科学、合理的成分发展到今天，早已为更加先进完整的体系所取代，除了要作科技史的研究之外，一般人根本没有必要再学习，更不必奉若神明。

像被一些人吹得神乎其神的风水，在地理学思想史上的确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反映了古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和选择，包含了科学的成分，如对环境的整体评价，对地表水、地下水、流沙、岩洞、地形、地势、方向、风向、降水量、植被、景观、心理等因素的了解和运用，一些建筑物或设施的选址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成功的。但用今天的科学技术，我们完全可以更准确更全面地考察这些因素，凡是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内容已经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和运用，为什么放着现成的科学技术不用，却要用模糊不清、真假参半的风水原理呢？难道使用罗盘比今天的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测距更精确？难道凭经验在地表的观察比各种科学仪表和设备对地质结构的调查更详细？其实，就是那些声称相信风水的建筑师，又有哪个不是受过正规的建筑学训练，有过建筑设计的实践经验？而风水师们所鼓吹的恰恰是那些玄而又玄、无法验证的教条，或者是他们随意编造出来的“灵验”故事，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提：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为迷信风水，为了一块风水宝地而倾家荡产，导致争夺械斗？无数被风水先生选定的“阴宅”耗费了中国多少宝贵的土地和资源？

又如《周易》及阴阳说，也被一些人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似乎成了集科学的大成，成了中国以至世界一切科学的源泉。其实稍为懂一点中国历史就不难看出，在先秦时代人们绝对不可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所涉及的各方面知识。一般来说，精神、理念、个人的能力未必会不断进步，不存在后人超过前人的规律，但知识、科学、技术、

人类的整体能力总是不断积累和进步的。先秦的学者再伟大，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达到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现代科学家学习和运用《周易》或阴阳说所取得的成就，与《周易》或阴阳本身的科学价值不能混为一谈。例如，尽管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从中国的阴阳说得到启发的故事已经不止一次被指出并非事实，但不少人还是津津乐道，以此来证明《周易》的伟大。姑且不论此事的真伪，就算真有其事，那么比莱布尼茨对《周易》不知熟悉多少倍、又不知有多少《周易》专家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发明二进制并进而研制出计算器呢？

有些人担心我们过于强调科学会导致“科学主义”，但是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对中国学者来说，主要的问题还是缺乏科学精神，科学讲得太少。就是为了确立人文精神，我们也应该确立科学精神。

原载侯样祥主编《我的人文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一九二—二一〇页。

新版世界地图引发的争议

——《苹果里的五角星——〈系列世界地图〉诞生纪实》序

大概因为我曾经于二〇〇〇年十月参加过本书几位作者在肇庆组织的一次研讨会，并见过他们研制的新版世界地图，所以他们要我为本书的出版写一篇序。我一直想推却，虽然我对中国地图史有一些兴趣，并且写过一本小册子，但对地图测绘这一专业却知之不多，对世界地图发展过程的了解也很有限。不过在仔细读完书稿后，我却改变了看法，觉得有必要将这本书推荐给更多的读者，因为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世界地图本身。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论述作者研制新版世界地图的历史背景、科学原理、文化意义和具体过程，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反映在这过程中的激烈争论，并全文收录了有关报道和反对者的批评意见。反对者都是地图专家或主管部门负责人，既专业又权威，但他们的意见却并非都是从地图和测绘本身出发的，这就相当耐人寻味。

双方争论的第一点，是中国现行的世界地图将中国置于世界地图的中间，是否受到“利玛窦迎合中国官员自大心理而变动绘制”的影响？其实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反方也承认“把自己的国家置于世界地图的中间，已成世界惯例”。既然如此，反方难道不知道，在利玛窦将世界地图引进明朝之前，中国还从来没有过世界地图，而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之所以能在明朝士大夫中顺利传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将当时欧洲通行的画法作了调整，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地图的中央。清朝康熙年间聘用西方传教士测绘成的《皇舆全图》，也将通过首都北京的子午线定为零度经线。中国现行的世界地图并非凭空而来，最终采用以一百五十度经线为中央经线，固然有技术方面的考虑，但能说没有受到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吗？反方还提出：“照此逻辑，英法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澳、中等国都犯下了以自己为世界中心的自大心理的大错”。一方面，受中

国中心影响与“以自己为世界中心的自大心理”还有程度上的区别，并没有那么严重；另一方面，英法等欧洲国家正是存在着“以自己为世界中心的自大心理”，非但如此，还利用它们一度曾经拥有的霸权地位作出过大量对它们有利的规定。就是以反方自己提到的一八八四年国际经度会议通过以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地球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经线一事来说，英国和欧洲以外有几个国家参加？谁有发言权？这不正是大英帝国霸权的产物吗？今天我们当然不得不承认这一已经得到世界公认的原则，但回顾历史时，难道能否认这样的背景吗？至于将正方的说法称之为“甚至是对广大制图工作者的污辱和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歪曲”，就有在学术争议中挑起感情纠纷、引入政治斗争之嫌，有失学者风度，完全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潮流。

双方争议的第二点，是新版世界地图与现行版的优劣，即以零度经线为中央经线与以一百五十度经线为中央经线的利弊。我以为，这也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显然正反双方都有这样的常识，由于地球本身是一个球体，所以将它反映在一个平面上，画成平面地图时，无论采用哪一种投影方法都只能相对准确，无论以哪一条经线作为中央经线都会顾此失彼。最好的办法是大家都用地球仪，随时都可以选择以不同的经线为中央经线；而且地球仪最好上下也能转，也可以将两极置于上下以外的位置。但这是不现实的，也失去了地图的本意。在我们局外人看来，双方都没有违背“以我为主”的原则，正方将中国由地图的中央移到地图的东方，也有几条有利于中国的理由，所不同的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所以，双方都应该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争论，而不要一味夸大自己方案的优点，回避同时存在的缺点，而从现有材料看，双方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一个国家自然应该有官方的、法定、用于政治目的的

地图，但并不等于不允许存在非官方的、不违反国家法律的、用于非政治目的（如经济活动、学术研究、教学和训练、日常生活）的地图。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当然应该遵守，但不等于说对这些法律和法规不能提出异议，不能提出修改意见。法定地图应该显示一个国家的准确边界和行政区划界线，反映国家的外交政策和立场，而使用不同的经线作中央经线显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因为无论以哪一条经线为中央经线，都可以相对准确地反映官方立场。实际上，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公众对世界地图也提出了不同的需要，要了解或研究欧美之间、环大西洋地区的人希望有将大西洋画为一个整体的地图，往南极考察的人最好有一幅以南极为中心的世界地图，而通行的世界地图很难说明北京至纽约的最近航线为什么应该通过北极，这些功能都不是一种法定地图所能包括的。

应该指出，中国历来有重视地图的传统，但也给了地图过于沉重的、不现实的使命。在专制时代，地图是皇家和政治的专利，不仅平民百姓无缘使用，就是官员、学者也不能随便拥有。康熙年间绘制成的当时世界上最精确、范围最广的实测《皇舆全图》，在中国只能藏于深宫密室，一百多年后在中国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传到欧洲的一幅不久就得到出版流传，日本军方也据以编成军用地图，为侵华日军所用。地图固然可以代表国家主权，但离开了国家实力，主权是无法靠地图来维持的。地图史界经常引用北宋时沈括与辽国谈判时根据旧地图上的画法争回领土的例子，却不提当时宋朝在实力上的相对优势，否则辽国是绝对不会受到旧地图约束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绝不是因为地图画得不准确，而在中法战争后能部分收回被侵占的领土也不是地图的功劳。我们的地图上在南海诸岛四周画上一个圈，对明确中国对南海

诸岛的主权固然有利，但这种独特的画法也使不少人产生误解，以为这个圈内都是中国的领海。在一段时间内，对较大比例尺的地图实行保密或许不无需要，但到了卫星遥感地图普及，国外大比例尺地图已经成为普通商品的情况下再这样做，就有点自欺欺人，并且根本起不到保守国家机密的目的，只能给自己添麻烦。民用地图一律不许画等高线的规定，也不适应旅游、户外运动、探险、科学考察日益发展的需要。重新如实定位地图的功能，适时调整相关的法律法规，实属必要，也是中国地图事业适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

双方争论的第三点，是新版世界地图能不能算“发明”，该不该申请专利？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所谓“发明”，根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就是“看到或找到别人不知道的事物和规律”；或者是指“创造新的事物或方法”。所以，称发明者，也可指不大的事物，并不一定要重大甚至伟大。用零度经线作中央经线的世界地图在其他国家有，在中国也有过，但几十年后有人重新发现，又作了些修改，称为“发明”也未尝不可，只是不要太夸张。至于申请专利，其实只是一种保护知识产权的手段，并不是一种科学水平的评价。反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如果零度中央经线取得了专利，那么置中国原有的零度经线地图于何地？如果外国零度中央经线世界地图设计者提出抗议，如果……岂不是一片混乱 ”中国原有的零度中央经线地图申请过专利吗？如果没有，其他人为什么不能申请呢？外国零度中央经线世界地图的设计者编过中文版吗？到中国来申请过专利吗？如果没有，中国当然可以批准首先提出的申请，他凭什么提出抗议呢？反方虽然有善良用心，似乎并不懂专利的基本常识，这样的辩驳看起来义正辞严，却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

但正方也有缺点。或许是为了引人注目，或许是急于摆脱来自权威人士的压力，正方的主要观点都是通过大众新闻媒体发表的，如本书所引的主要论据都发表于广东肇庆一张地方报纸《西江日报》，还有一些也是报纸上的报导，因而免不了有一些言过其实或不够准确的地方。如果将这些论据写成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主要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必定能更准确地阐述作者的观点和这项工作的意义。但我在书中没有发现，在引用的参考文献中也没有找到。

就书稿而言，全文引用正、反双方的言论虽然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未免显得有些重复和冗长，并且浪费篇幅，减少了可读性。参考文献过多，少数文章与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完全可以精简，否则就有浮夸之嫌。致谢的名单也是如此，像我就只去开过一次会，通过几次电话，实在没有出过什么力，完全可以从名单中删去。

这段话似乎不该在序言中说，但郝晓光博士事先要我自由地写，包括对他们的批评。既然他有这样的雅量，我就不能拂他的好意。如果作者们有不同意见，就以此为契机开始新的争论吧！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二〇〇四年二月六日，第九版。

人文千秋

科举制度：存废皆有理

一种制度能在一个国家长期存在，肯定有其适应性和合理性。同样，一种制度被废除，并且再未恢复，也可以肯定有其必然的原因。

从隋唐到清末，中国的科举制度存在了一千多年。此期间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开科取士的做法却一直没有改变。中国的人口从五六千万增加到四亿多，疆域范围由数百万平方公里扩展到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科举制度的具体方法和名额不无改变，基本原则却一仍其旧。科举制度不仅在中原王朝长期延续，还影响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推行到朝鲜、越南等藩属国。

任何制度的合理性都是相对的，科举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今天要评论其优劣，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更不能无视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在科举制度产生和实行之前，人才的选拔有两种主要的办法：一是世袭等级制，一是举荐制。前者规定某些职位是世袭的，只能由担任该职位者的男性后代继承。这类职位范围很广，既有天子、诸侯王、贵族等君主和统治者，也包括一些专业性强的官职，如太史，司马迁即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太史职位。其他职位也只在特定的阶级或阶层中选拔，如魏晋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和此后逐渐形成的高门世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多数重要职位只能在出身特定家族的人中挑选。在公共教育几乎不存在的时代，为了一些专业知识，特别是口耳相传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承，对诸如天文、档案、史料、礼仪、艺术等方面的职位实行世袭不失为一种有效措施，但同时也剥夺了其他更合适的人才的机会。政治上的垄断则对社会的正常运作与进步毫无积极作用可言，只是能维持某些特权家族与阶层的利益。

举荐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袭制的局限，但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弊病。且不说在专制集权制度下必然出现的

腐败，如政治权力的干预甚至逼迫、钱财的贿赂、人情的影响等造成的营私舞弊，即使当事人完全出于公心，也还有两个无法克服的不利因素。第一是个人的接触和了解范围毕竟有限，但为了对自己的推荐负责，他只能在这范围内提出。而有举荐权的人只是一部分官员、贵族、名流，能获得他们举荐的人自然少而又少。虽然偶尔也允许个人自荐，但草民百姓的自荐一般很难通过各级地方官的筛选，能够上达天听的更是凤毛麟角。第二是缺乏统一的标准，推荐者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而推荐者本人的水平、判断能力和选择标准相差悬殊，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正因为如此，科举制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首先是打破了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垄断，除了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其次是标准一致，各级考试都有统一的程序、形式和内容，即使主考官免不了个人好恶，也已受到很大制约。再则，随着科举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制度日趋严密。其中不少做法实际沿用至今，甚至比今天的规则严密得多。尽管科举制难免也有缺点，但在当时条件下，还能找到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科举制最受诟病的，一是遗漏了不少人才，二是考试内容毫无实际意义，三是耗读书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些需要具体分析，全面认识。说到遗漏人才，我们的确可以举出一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往往在科举中落第。但科举的目的是为选拔官员，并非选拔社会的各类人才。有些人虽有其他方面的才能，却未必适合当官员，考不上科举倒是很正常的。如李白，无疑是旷世奇才、天才诗人。但从他对韩荆州的谄媚和受永王之召的轻率看，他肯定不适合当官。所以他考不上科举既不是坏事，也不能证明科举埋没人才，倒是成就了一代诗人。反之，由科举入仕的人中虽不乏庸庸碌碌之辈，但对中国历史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大多也在其中。至于其中出

现奸佞，与科举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选择标准中本来就只凭考试成绩，对未来的奸佞是无法识别的。第二点也是任何考试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考试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对考生打分排序，所以必须有一套通用的程序，便于不同的考官之间有比较共同的标准，八股文正是这些需求的产物。科举制本来就是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产物，决定读书人对科举态度的是传统文化和价值取向，而不是科举制，不能本末倒置，以果为因。在科举实行之前，读书人在干什么？难道在从事科研、管理、文艺创作或生产劳动吗？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清末说废就废，再未恢复呢？

中国以往的教育以儒家学说和文史为主，科举取士也以此为标准，但到西方现代科学传入，这样的知识结构和选拔标准就无法适应。科举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但新形势下需要的外交、法律、管理、警察、军事、科技、金融、财务、民政等很多方面的官员却无法通过科举来选拔，也不是临时开设的“经济特科”所能囊括。科举的基础是精英教育，而要进行国民教育就只能采用现代教育制度，设立各类各级学校，设置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种课程。科举只是为官方选拔行政官员，无法为社会选拔各类人才。当行政官员在全社会的人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时，科举制的适应范围也越来越小。无可奈何花落去，科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势所必然。

但科举制的普遍和积极意义早已在各国通行的文官制度中得到体现，考试更成为无法替代的选拔人才方式。考试应该并可以不断改进，却不可能废除。近年来对高考的批评不绝于耳，但谁能想出不需要考试、取代考试的更好办法？

原载《新京报》二〇〇五年九月九日，第C02版“科举百年祭”。

书系

人文千秋

尊重历史，立足现实

如果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算起，中国全国性的行政区划已经实行了二千二百多年。在此漫长的年代间，不仅以中央集权制度为基础的行政区划制度长期保持稳定，而且一些具体的行政区域也往往持续几百上千年，有些县的存在甚至已超过二千二百年。在中国所有的制度中，行政区划制度是持续时间最长、相对最稳定的制度。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对现行行政区划制度的认识和任何可能的改革，都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历史的基础之上。限于篇幅，这里就谈两个方面：

一是一级政区设置中的一些特殊因素。

行政区域的设立和划分，既是国家进行日常管理的需要，也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因此必须兼顾内政和外交、自然和人文、经济和文化、传统和现实等各种因素。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形势、不同区域、不同统治集团的需要和利益不同，侧重点和出发点也有差异，但基本原则却是一致的。而一种行政区域或区域类型的设置如能长期延续，特别是在政权更迭后仍不改变，就足以证明这类设置的合理性，至少能证明是利大于弊。另一方面，由于时过境迁，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利也可能转变为弊，因此适当进行必要的调整，也是完全必要的。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起着更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对行政区划也是如此。因此古代对行政区域的设置，往往强调应按照自然地理条件，即“山川形便”。即使如此，自然条件只是诸多因素之一，“山川形便”并非唯一或决定性的条件，必要时中央政府会有意识地打破自然条件的制约，造成“犬牙交错”的局面，以利于防止和破坏分裂割据。

这一点已经得到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地图的证实。在其中的《驻军图》上，汉朝与南越国之间的界线，

并非沿南岭山脉的分水岭划定，而是或南或北，不时越过山脉深入南侧。显然，这样的划界使中央政府能控制南越的战略要点，使南越无法利用天然屏障形成完整的防线。

这一原理在元朝得到进一步的运用，具体反映在秦岭南北政区的变化。自秦汉至宋金，秦岭历来是不同一级政区之间的天然界限。但从北宋末年开始到蒙元，秦岭一直是南北政权争夺的焦点，也是南方政权对抗北方政权的有利因素。元朝统一南北后，首都设在北方，自然希望造成北方对南方的优势，因此将地处秦岭之南的汉中盆地划给本来在秦岭以北的陕西，打破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封闭性地形。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无弊病，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直到今天，汉中盆地一带的经济文化与关中还有很大区别，而更接近于四川；由汉中至关中的交通比从汉中去四川更困难；但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由于此后的明、清都建都于北方，这条界线延续至今。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都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后，曾划定一片范围很大的中央直辖区。他深知南京偏于南方，不利于控制北方和西北，曾先后将西安和开封列为迁都候选对象。在得知西安、开封完全不适合建都后，又决定在故乡（今安徽凤阳）兴建中都。这一宏大规划虽因不切实际及朱棣迁都北京而废止，却留下了一个相当于今江苏、安徽和上海市在内，跨长江和淮河两个流域的一级政区——南直隶（今江苏南京）。清初继承了这个政区，只是改名江南。但这个政区毕竟太大，长江以南部分又是天下财赋之地，在全国所占比例过高，因此决定由北而南一分为二，成为此后的江苏（含今上海市）和安徽两省。当年分省时当然不会不考虑自然条件，也可以将这一区域按南北划分，即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分别划为不同的政区。但苏南与苏北，皖南与淮南、淮北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实在

太大，如果按南北划分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全国最富的政区和一个相当穷的政区，所以结果还是由北而南划分为东、西两个政区。这样的分法并非没有矛盾，因此从清末至民国期间都有重划苏、皖省界或设立“淮海省”等各种建议。不过直到今天，除了上海市早已另设为直辖市以外，苏、皖两省的界线基本还是明朝的南京和清初的江南的旧界，而两省间的界线也与当初划界所定大致相同，说明这样的划分的合理性是主要的。

大政区的设立和划分往往体现中央集权的需要，甚至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天津政区地位的变化，显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有关，特别是他对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看法和他对“两个司令部”形势的估计，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天津始而由直辖市降至河北省会，又降至地级市，但在六十年代初却又升为直辖市。本来，在离北京如此近的地方没有必要再设立一个直辖市，因为当时全国除了北京市外只有一个上海市，即使要设第三个，完全可以选择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南方中的任何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必在华北设第二个。从天津在经济、文化甚至军事上的重要性来说，也找不到明显的理由，唯一的原因是“政治”。联系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对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指责和“二月兵变”的谣言，尽管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但可以肯定这是毛泽东所采取的特殊措施。退一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主持中央政府日常事务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不可能作出这样决定的。时至今日，天津虽还维持着直辖市的地位，却一直处于相当尴尬的处境：作为中国仅有的四个直辖市（且不说重庆实际是一个特殊的省）之一，天津能发挥的地区性作用却相当有限，更不用说它的全国性影响。相反，北京东扩、“大北京”（即包

括天津在内）和“京津唐城市带”的建议或规划不时见于报道。今后天津如不并入北京，或与北京有明确分工以便互补互利，就不可能摆脱“直辖市”名实不符的窘境。

另一个例子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肢解和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和西部分别被划入黑龙江、吉林、辽宁和甘肃四省，当时公开的理由是内蒙辖区太大，东西、南北相距太远，开“积代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简称）时最远的代表路上要花半个多月。但没有公开宣扬的理由却是为了防止“内人党”（“四人帮”制造的“内蒙古人民党”冤案，实际并不存在）搞民族分裂，防止他们与“苏修”勾结，巩固边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内蒙古自治区的辖区完全恢复原状，主要出发点却是消除后者的影响。但前者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完全不予考虑也是不合理的。例如，如果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便利考虑，内蒙古与东北三省为邻的地区改由该省管辖，比由距离远得多的呼和浩特管辖更合理和有效。但两者显然无法兼顾，只能在权衡利弊和轻重缓急后作出选择。

总之，一级政区的形成、变化或稳定都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尽管其中一些因素因时过境迁，已不再起作用，甚至已起相反的作用，但是否已达到必须使一级政区实行相应的变化的程度，必须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和评估。

二是确定政区层级的根据。

行政区划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区设置的层级。秦始皇建立郡县制时，从中央到地方中间只有两级，即郡和县。开始全国号称“三十六郡”，以后经过增加和调整，有近五十个（一般说法有四十六至四十八个，但近年从湖南里耶秦简所见又有“洞庭郡”，可能还有个别未见于现存史料记载者）。到公元初的西汉末年，全国设有百余个郡级

政区和一千五百多个县级政区，管辖面积三四百万平方公里。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百余个政区，平均每个郡级单位管理一二十个最多三四十个县级单位，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下，政令的上通下达、人员和物资的征调流通大致能够正常维持，所以两级制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但早在西汉中期的武帝时代，随着疆域的扩展，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政区已有鞭长莫及之势。例如，在平定南越国后，最南的郡县已在今越南中部；东北最远的政区已在朝鲜半岛中部；西南的郡县达到今中缅、中老边境；河西诸郡的西端直抵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因此，朝廷在首都所在的特别监察区“司隶校尉部”以外又设置了十三个监察区——“州”。每州分别监察若干郡级政区，全国的郡级政区无一例外。宣帝时在今新疆和中亚设置西域都护府，由于距离过于遥远，范围又过于广阔，因此只派遣少量将士和行政人员，实行军事监护，在其内部实行高度自治，原来的治理方式，包括众多的“国”完全保留。

东汉期间，原来监察性质的州逐渐演变为郡以上的一级政区，郡县两级制变成了州郡县三级制。此后，虽有相当复杂的变化，但都不外于虚实两种三级制。对此，先师谭其骧先生作过总结：“秦和西汉初期疆域比较小，其时所采用的单纯二级政区制，自汉武帝扩展疆域以后，已不宜于继续采用。但多级制亦不利于政令民情的上下传达，所以二千年来最常用的是三级制。有时用实三级，有时用虚三级。这里所谓虚三级，是指第一级或第二级并不全面掌握地方权力，或一级权力分属于几个机构的三级制而言。粗略统计一下：汉武帝以后的两汉三百年是虚三级；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是实三级；隋至唐初期一百四五十年是二级制；开元以后先是虚三级，二十多年后即转为实三级；历二百余年至宋初始改为二级。但不旋踵即转入虚三级，历

三百年至元代始变为多级制。元明清六百多年显然都是多级制，大多数地区的实级一般都是省、府（路、州）、县三级。辛亥革命后七十多年北洋军阀、国民党、新中国三个阶段，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虚三级制。”“政区的这些演变规律，一方面正好说明了中国自秦汉以来长期在中央集权制统治之下，所以中央的使者能以监督的名义侵夺地方官的权力，终于使中央使者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原来的地方长官降而成为他的下级或僚属。但另一方面，因为由这种方式形成的一级政区辖境、权力过大，所以一到乱世，这种政区的首长很容易成为破坏统一的割据者，犹如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唐安史乱后的节度使和民国的督军、省主席等。”[1]

解放之初，中国一度设立大区，即省级政区之上再按地域设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行政（军政）区，这样在中央之下就形成了大区——省——专区——县四级制。但不久大区撤销，又恢复到三级制。而且三级中的专区一级是虚的，即专员公署只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其首长专员是省长的代表，都不是实际一级政府或行政首长。正因为如此，专区一级不能召开人代会，也不开政协，只有省人大和省政协派出的工作组或联络组。唯一的例外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可能出现省、自治区下辖自治州，州下辖县（或自治县），是实三级。

民国初年废除了前清的府一级，将实三级变为虚三级，并且延续了近七十年，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由专制而共和，体现在行政区划的层级上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削减和地方权力的增强，是各级行政区治理权的合理分配。同时随着火车、汽车、轮船、自行车、飞机、电报、电话、邮政等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的运用和普及，政令的上通下达、人员

1 《中国历代行政区概述》，载《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四四—四六页。

和物资的运送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因而一个政区的有效管辖范围可以扩大，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可能增强，省和县两级之间的府一级能够虚化。将中间一级政区虚化，也可以精简机构，减少行政人员，节约政府开支，并提高行政效率。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管县”和“地改市”的推行，中国的虚三级实际已变成实三级，即省——市——县（市）。其中的市（地级），不仅已设置与省级机构和县级机构相应的全套政府，实际管辖着所属的县或县级市，并且通过召开人代会设立了人大常委会。而根据现行《宪法》第三十条规定：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也就是，一般情况下，只能有省—县、市两级，只有在“较大的市”才能下辖区、县。严格说来，《宪法》中这个“较大的市”是模糊的，不规范的。因为“较大”既不是定性，又不是一个级别，更没有确定具体的标准，以至原来的“地区”几乎都成了“较大的市”，不仅直接管辖县，近年已像直辖市一样，将下辖的县改区了。

究竟是修改《宪法》，使之符合实际状况；还是用《宪法》来规范行政区划？今天的交通运输和信息手段比上一个世纪又有了飞速进步，照理说，同一级或同一个政区的有效管辖范围和层级都可以大幅度扩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合理分权、精简行政机构、减少行政人员、提高行政效率，正是未来改革的目标。那么，中国的政区层级究竟应该是实三级，还是虚三级，甚至实二级呢？

原载《江汉论坛》二〇〇六年第一期，第七六—七九页。

书系

人文千秋

评《1421：中国发现世界》

——兼论真实史料的重要性

在纪念郑和航海六百周年之际，英国加文·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的中译本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媒体上的介绍和评论颇多，作者和此书再度成为新闻。

记得二〇〇二年此书在伦敦首发当天，我接受过一位记者的电话采访。当时我谈了两点看法：此书的结论能否成立，关键是看作者能拿出什么证据。即使作者的结论（如郑和船队首先到达美洲）成立，也不会改写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历史，因为历史学家所谓“发现”，并不是指一般的到达，而是指到达后引起的有影响的变化。所以仅仅证明郑和到过那里，是不足以推翻哥伦布“发现”论的。现在翻阅中译本后，我的看法没有改变。第二点看法不涉及这本书本身，本文着重谈第一点。

一

要评价这本书，首先评价者和读者都要端正自己的态度。纪念要选择时间，如一百整年，但学术研究不应也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五百九十九年与六百零一年没有什么不同。纪念要着眼当前，面向未来，要古为今用，有所取舍，作学术评价就只能尊重历史事实，讲究全面准确。纪念要考虑民族感情、政治导向和国家利益，复原历史真相时只能站在人类的共同立场，不偏不倚。因此，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可以作为纪念郑和航海六百周年的活动之一，但对此书的评价不能受到这一因素和其他现实因素的影响。如果因为要纪念郑和，或者要使纪念活动热闹顺利，就一定要肯定这本书，或者不能批评这本书，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我很钦佩孟席斯丰富的想象力和执著的追求，如果用于写一部科幻小说或历史小说，或许能取得成功。但如果用严肃的历史著作的标准来看，我只能遗憾地说，作者是从错误的假设出发，采用了不可靠的或并不存在的证据，

又通过非正常的推导过程，得出了离奇的结论。

简单地说，作者首先发现了一些绘制于十五世纪前期至十六世纪前期的海图或地图，而他肯定这些地图反映的地图知识是当时欧洲人尚未掌握的，一些地方是欧洲人没有到过的，因而他推断只有郑和的船队才具备到达这些地方并精确绘制在地图上的可能，然后用各方面的证据加以证实，最后得出郑和船队曾航行于全世界，包括非洲、美洲、南极洲和北极洲的结论。可见，支持作者的基础极其脆弱，因为只要其中一项被否定，或不能成立，结论就变得毫无意义。

据作者在《引言》中介绍[1]，他的研究来源于收藏在明尼苏达大学贝尔图书馆的早期地图和海图，特别是其中一幅据称是绘制于一四二四年、有着一位威尼斯制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Zuane Pizzigano）的签名。但对这样重要的证据，翻遍全书，找不到一张完整的照片，一九一页前的一页彩照显然只选取了一部分，而且模糊不清，对该图的质地、尺寸、内容和收藏过程毫无说明。作者称收藏者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是一位富有的英国收藏家，出生于十八世纪晚期，“但他的那些藏品事实上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半个世纪前才被再次发现”。那么是谁鉴定这幅地图绘制于一四二四年？谁能确定这个签名是真的呢？如果是出于某位测绘学权威，或是地图史学界的一致意见，就得说明依据和出处。如果是作者自己鉴定的，就更应该列出证据和理由，但全书都没有交代。对其他作为根据的那几幅地图或海图也同样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相信“这份地图的年代的来源和确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要知道，如果这些地图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稍有问题，全书就成

1〔英〕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1421：中国发现世界》，师研群译，北京：京华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以下引文及证据出于本书者不再一一注明。

了空中楼阁。

即使作者对这些地图制作年代的判断没有错误，他由此作出的推断也过于片面和武断。他认为图上标识了一些当时欧洲人没到过的地方，“根据我们已经接受的历史知识，欧洲人在七十年后才去那儿探险”，所以只有郑和船队的航行和发现才能填补这一空白。依此类推，他将反映在那些地图上的全部地理知识，包括非洲、大洋洲、南极洲、美洲等都归功于郑和船队。

首先，他的前提就相当危险，既然目前对郑和航海还有不少未解之谜，那么对欧洲人的探险和地理发现也未必都已了解，肯定欧洲人不可能自己掌握这些地理知识的理由并不充分。

其次，欧洲人难道只能从郑和船队获得地理知识吗？十五世纪初期或此前的地理发现或航海知识难道只有中国一个来源吗？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和实践领先于中国，至少不在中国之下。特别是在印度洋和由阿拉伯半岛至中国的航线，基本是由阿拉伯人垄断的。唐朝随高仙芝西征而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战中被俘的杜环，于宝应初（七六二）搭乘商船由大食（今阿拉伯半岛）回到广州[1]，说明在西亚与中国间已有稳定的航线。唐朝的广州已出现由阿拉伯人聚居的“蕃坊”，宋朝的泉州已成为阿拉伯移民集中、富有阿拉伯文化特色的城市，阿拉伯裔移民蒲寿庚（一说占城人）拥有大量海船，在泉州担任南宋的提举市舶（约相当于海关关长兼港务局长）达三十年。元朝与蒙古四大汗国的并存，使中国与阿拉伯的联系更加频繁，也通过阿拉伯人获得了大量地理知识和航海经验。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

1 见杜环：《经行记》，杜佑：《通典．边防》引．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第五二七九—五二八〇页。

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二百二十余个，远远超过此前宋朝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等书，而汪大渊就有搭乘海船两下东西洋的经历 。

就是郑和的远航，也明显得益于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郑和本身是“回回”后裔，其先世系蒙元时由境外迁入。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到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他从小就有机会了解阿拉伯地区的知识。目前所知郑和船队在印度洋的航线和到达之处，都没有超过阿拉伯人的范围，如果不利用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倒是不可思议的。近来引人注目的肯尼亚拉木岛，正处于阿拉伯半岛进入东非海岸的中转站，至今还聚居着阿拉伯人，他们的迁入远在郑和之前。二〇〇三年五月我曾在岛上考察，亲身感受了浓厚的阿拉伯文化。郑和船队到过的木骨都沙（今摩加迪沙）和幔巴撒（今蒙巴萨）都在此前阿拉伯人已经开辟的航线之内。

日本地图史家海野一隆早已指出：“正如蒙古人统治亚欧时刺激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一样，伊斯兰的地图学也对周围地区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当然包括对东方的影响。”“至于世界地图之传入中国，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大明混一图》等的出现可见一斑。该两图均继承了元朝李泽民《声教广被图》（约一二三〇年，已佚）的谱系。此外，从《元经世大典地理图》的内容来看，当时画有经纬线的地域图无疑已经传入中国。元朝接受伊斯兰地图学影响的主要是属于统治阶层的蒙古人、色目人，还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以‘大地平坦说’为前提的中国传统的地图学。元朝朱思本的《舆地图》仍无视欧洲和非洲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1]可见，蒙元时中国的地图上之所以能出现非洲，中国人的地理知识之所以能超过以往，正是得益于阿拉伯

1〔日〕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王妙发译，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第四八页。

地理知识和地图的传入。而朱思本地图和中国传统地图的局限，也是没有及时学习和吸取这类新知识所致。

海野一隆还指出："因为郑和本人即为伊斯兰教徒，因而明初的《郑和航海图》里，也是以伊斯兰式的'指'来表示纬度值的。十五世纪初，在北京曾出现过阿里·伊斯塔库里《诸国道里记》（波斯语）的抄本，内含色彩鲜艳的地图。一六一六年刊《陕西四镇图说》一书中则收载有中亚、西亚的地图（《西域图略》），无疑是伊斯兰地图的翻译和摘要[1]。"所以，不仅郑和本人及其率领的船队，就是到十七世纪初的晚明时代，中国人对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的地理知识基本还是来自阿拉伯人。

《混一图》和明朝初年的地图上出现非洲，当然是反映了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识。如果这上面描绘了好望角，也只能是阿拉伯人航海的成就，一定要归功于郑和实在是因果倒置。我不明白，自称对航海史和地图测绘史作过充分了解的孟席斯为什么竟无视阿拉伯人的航海和地图测绘成就，丝毫不考虑其成就和影响？如果说这是出于某种不便言明的原因的话，下面的推论就使人百思不得其解：连作者本人也承认《混一图》绘制于一四〇二年，比郑和首航早了三年，怎么可能用来证明郑和的航程包括好望角和非洲在内呢？要说这一发现来自郑和，连最简单的逻辑都不讲，岂非荒谬？

当然，作者也列举了大量事例。但稍加分析和追究，却都无法成立，或者毫无根据。这类例子，几乎是该书的全部，只能姑且举数例：

浏河天妃宫中的《通番事迹碑》原碑虽堙，但明人钱谷所编《吴都文粹续集》录有原文，其中有"抵于西域忽

1〔日〕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王妙发译，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第四八页。

鲁谟斯等三十余国”。而福建长乐天妃行宫中的《天妃灵应之记碑》原碑还在，上面刻着“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1]。但作者硬要说“三十”是“三千”之误。如果当时真要刻上“千”字，即使事后发现误刻为“十”，也不难将“十”字改这“千”字。反之，如果已经将“十”误刻为“千”，倒不容易改正。即使改了，也会留下痕迹。现在两处的碑文都作“十”字，就可说明此字绝无错误。

作者一度认为佛得角一块碑上的铭文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但据西安碑林的专家鉴定结果并非汉字，后印度专家认为“看起来像”十五世纪前通用于卡拉拉邦马拉雅拉语。这最多只能证明印度人到过那里，但作者却将这作为郑和船队到达的证据，理由是船队的翻译来自卡拉拉邦，所以使用了自己的文字。但这条理由完全是作者自己的推测，没有任何证据。

作者断定郑和从美洲将玉米带回中国，“中国的记载说，郑和将军带回一些‘有着特别大穗的谷物’”。但根据注释，这句话是出于J.J.L.Duvendak 于一九四九年出版的《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中国在非洲的发现）。从书名看就有些文不对题，而无论如何，这不是“中国的记载”的原始出处。实际上，有关玉米传入中国的论著相当多，作者完全可以引用更权威可信的说法。可惜这些论著中并没有郑和将玉米带回中国的证据，所以只能找那种毫无史料价值的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材料。

作者认为罗得岛上的石塔也是郑和船队造的，“就我个人的看法，塔的窗户设计和安放位置接近于宋代的灯塔。这些灯塔是用来导航进入华南福建省刺桐（泉州）港口的

1 据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史迹文物选》，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五四页。

中国和阿拉伯的贸易船队。”但从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石塔明显带有阿拉伯风格，却看不出中国宋代的影子。作者承认，如果能对该塔粘合石块的“泥浆”作一次分析，就能断定是否用了中国的糯米，据说被当局拒绝。既然如此，怎么能将石塔列为证据呢？

最后还必须指出，作者认为“只有中国舰队能在欧洲人之前发现新世界”，理由之一是“中国要求郑和去完成这项工作”，这是作者没有从整体上了解中国的历史和郑和航海的目的所致。以往认为郑和的主要使命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多数学者已予否定，而认为是为了宣扬国威，扩大邦交，也有贸易方面的需求。这两方面的使命都限于已知的范围和现实的可能，无论如何，明朝统治者与郑和个人都不会超越当时中国的天下观，去探求什么新世界，因为明朝既不乏土地，也不缺财富，更不想打破“天圆地方”的平面地理观念。

当然，作为一种想象或探索，此书或许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此书的标新立异也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一时畅销也在情理之中。

或许有人会说，孟席斯的书充分肯定了郑和航海的伟大贡献，有利于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但无论他们与作者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离开了历史事实，这一切都只是虚幻的泡影，只能是对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嘲弄。

二

本来，对受过历史学基本训练的人来说，要评价和鉴别这本书并不困难，所以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历史学界和学术界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多数人毫无兴趣，认为它不值得评价。但我发现，在中国，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这本书

的人中也不乏学过历史的人，这就不能不使我惊奇和遗憾。当然，其中必定有人是出于学术以外的原因，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如果从学术角度看，我想还是一个老问题，即如何对待史料。

近年来，不时可以见到一些“新发现”、“新观点”，有的相当耸人听闻，却能不胫而走，甚至洛阳纸贵，特别是其中某些出于外国人，而又被某些人认为对中国有利的新说，更是身价百倍。因为国人一直相信“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现在既然连洋人都认为是这样，那就确定无疑了。其实稍仔细看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新说或者是对已有史料的误读曲解，或者根本没有史料根据。

有些人很注意学术规范，但不能仅仅看形式。从形式上看，这类论著往往做得很规范，像孟席斯的书就有很多注释，引经据典，给人史料非常丰富的感觉。还有的书引用的材料中有各种外语，着实镇住了多数读者，因为谁也不能掌握那么多种语言，一时也找不到那么多语种的著作。但是，真正的或者最重要的学术规范，还得看形式后面的实质，而最基本的一条还是史料是否过硬，证据是否充足。如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二〇〇二年初出版的《光明之城》曾经被有些人当作重大发现，但从史料的角度看，这本书却毫无价值。

根据李学勤先生为此书写的《导读》，此书属来历不明，除了那位编译者之外，没有任何证据。“编译者戴维·塞尔本是有许多作品的学者，生于伦敦，从小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在牛津大学攻读法学，成绩优异。他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印度新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工作，并于牛津的拉斯金学院任教达二十年，现居于意大利中部的古城乌尔比诺。”我们对塞尔本先生的学者身份和语言、法学、社会学方面的学识当然不应怀疑，但他对书中涉及的中国历史、哲学、社会、文化究竟有多少了解？对书中

出现的黄帝、皋陶、汉武帝、司马迁、王莽、汉明帝、老子、孔子、曾子、孟子、杨朱、韩非、杜甫、李白、王安石、朱熹、陈亮等，加上他自己承认还有许多辨识不出的原名，他到底译对了多少？在没有办法作任何核对，没有任何其他人参与的情况下，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如果现在发表的文本根本就是译者的误读或误译，我们却将它当成信史，去纠正或推翻现有的历史，岂非铸成大错？

更大的问题是，世界上只有译者塞尔本先生一个人可以证明原书的存在，《光明之城》的写本至今还只存在于他的描述之中。“据说，他是在一九九〇年，从一个造访他在乌尔比诺的家的客人那里，初次获知这一写本的存在的。那年十二月，他在马尔凯大区某地的藏家手里，见到了这部写本。此后，塞尔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说服藏家，允许他在藏家本人监督下检视和试读。直到一九九一年九月，经过长时间讨论与公布写本有关的种种问题之后，塞尔本终能在藏家房子里仔细研译这部写本。塞尔本对藏家的姓名和地址讳莫如深。他说，这是出于藏家和他的约定，因此写本的来源和所有权都不清楚，书中没有写本的照片，也没有完整成段的原文。……写本如何传流下来，不能完全知道。……至于《光明之城》写本为什么长期秘藏，是没有人知道的问题，塞尔本以为是由于写本的宗教内涵。”

当然我们不应该怀疑塞尔本先生的道德，不能随便怀疑他作假，但是我们不得不质疑这一神秘而漫长的过程。从“作者”雅各布一二九〇年“写”下这些东西，到塞尔本见到它们，中间长达七百年，谁能保证没有篡改或作伪？写本如何、何时到了藏家之手？藏家是什么身份？谁能保证写本到藏家之前不被篡改，或者不是假货？谁能保证藏家本人不是作伪者？现存的写本究竟是不是七百年前的原物？如果不是，这个写本产生于何时？这些都是无法回答

的问题，我们只能相信塞尔本一个人。即使我们完全相信塞尔本的人格，也无法轻易相信他的学术判断力。君子可欺之以方，要是他被藏家或什么人蒙骗了呢？哪怕有第二个人能够看一下写本原件，能够多少证明一下塞尔本的说法都好，可惜连这也没有。冒如此大的风险来承认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值得吗？应该吗？

而且，即使根据塞尔本的说法，藏家的隐秘也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说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如今早已消除。如果真有不便公开的原因，为什么经不起塞尔本的劝诱？如果是有道义上的原因，现在岂非已经违背？如果这本写本是用不光彩的手段获得的，现在也已经为世人所知。如果是为了钱，更只要直截了当提出来就可以了。再说，来源不能说，全文不能公布，代表性的照片或一段原文总能公布吧！世界拍卖的不少宝物都没有公布藏家的姓名和来源，但从来没有不让别人看到原物的，更不用说应该先公布照片或详细的说明。如果全世界的学者都一致抵制这本书，或许还能迫使塞尔本或藏家披露真相，可惜大家太天真了，先让塞尔本获得了充分的效益，这方面的压力已经有限。

要是此事发生在中国，一位并非历史专业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从未见于著录的七百年前的史书稿本，他对书的来源和收藏者秘而不宣，也不发表任何原文和照片，历史学界会接受吗？我们会承认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吗？我可以肯定不会。历史学研究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史料必须可靠，尽可能有第一手的来源。难道洋学者就可以不遵守学术规范？记得在国内出现“新发现的《孙子兵法》”一类伪作时，学术界的态度都相当明确，我希望对来自外国的“新发现”也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态度。

要是这本书的内容是否定马可·波罗的记载，是描述泉州如何荒凉黑暗，说泉州人如何保守落后，中国学者是

否还会有那么大的热情？其实，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同样的，而且对这样一类渲染“光明”的书更要特别谨慎。这些年，我们常看到一个什么发现将中国历史或发明提前多少年的报导，事后却往往不知所终。但却从来没有见过某一发现将中国的历史或发明推迟了多少年，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其实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成绩。这种现象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历史一种不健康的心态，我希望这种心态不要影响到对《光明之城》的评价。

或许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冤枉了塞尔本先生。我以为不会，因为我们只是不相信、不采用这本书，只是迫使他拿出证据来，这完全是正常的学术规范的要求。或许有人认为，这本书里有不少新鲜的内容，不用太可惜。但出处不可靠的史料，越是新鲜问题越大。再说，如果是仅见于这本书的内容，充其量只能是个孤证，还是需要有其他史料印证，暂时不采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中国历史研究能做的工作很多，何必急于从这样一本来历不明的书中找史料呢？

这些意见，我在二〇〇二年就发表过，现在三年多过去了，塞尔本一直没有拿出新的证据来，也没有进一步公布这篇文稿的来源，近来似乎不再有人谈《光明之城》了。不过这些并不重要，我还是这样的看法：什么时候证实了这篇文稿的真实性，它才具有史料价值，才能用之于历史研究。

现代人的创造力加上某些人出于种种目的的伪造，不时会有一些耸人听闻、难以置信的新闻和旧闻公布，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但作为历史学者，必须守住一条底线——一切证据必须来自可靠的史料。

如果是出于学术以外的目的，那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原载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二〇〇六年六月，第二三—二六页。

迁徙的姓氏：追寻移民的脚步

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历来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姓氏，没有非常特殊的原因是不会改变的。但考察今天中国的姓氏分布，就可以发现，人口少的姓往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只存在于某些地区，甚至只有一个地方才有。但人口多的姓却遍布各地，人口最多的几个姓甚至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海外。

不过姓氏刚形成时，一姓一氏只限于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宗族之间，分布范围不可能很广。不同的宗族采用同一姓氏的可能性虽然也存在，但毕竟有限。所以每个氏或姓都有自己的起源地，该姓氏的人口扩展到其他地方主要是迁移的结果。

另一方面，汉族及其祖先华夏诸族有慎终追远的传统，只要有可能，都会记载本家族的起源和迁移过程。现在的家(族)谱中几乎都有本族的世系表(图)，追溯到本族的“始祖”和“始迁祖”。相比之下，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加上附会的成分，“始祖”和从他开始的世系往往模糊不清，而从“始迁祖”开始的世系和迁移路线、年代却大多确切可考。可见一姓一氏人口的范围无不与迁移有关，今天的姓氏分布是历代人口迁移的结果。

人口迁移的方式很多，对不同姓氏的影响也不同，下面举最重要的几种。

一、分封产生的迁移

华夏诸族发祥于中原，大致即今天的河南、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北西南、安徽西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特有的姓氏也集中在这一区域之内。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国君将本族子弟和贵族、大臣分封到各地，以后大多在当地定居，他们的姓氏也随着分布到各地。例如，周王姬姓，被分封到各地的周王宗室就将姬姓

带到各地。又如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尚被封于齐（今山东中部），姜姓也从今陕西扩大到山东。不少姓的起源都是某国，原来都是地名，分封为国后成为国名，以后又被封君及其后裔采用为姓。

西汉初曾大封同姓王和异姓王，异姓王存在时间很短，而且除个别外都不得善终，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在封地繁衍的后代。同姓王却长期存在，有的王绵延数代，子孙众多，他们的封地就成为刘姓的聚居地。如彭城（今江苏徐州）是楚王等王的封地，以后成为刘姓的郡望（主要发祥地），重要性超过了刘邦的故乡沛县（今江苏沛县）和皇族聚居的国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到西汉末年，刘氏宗室人口超过十万，除了长安一带外，大多居住在祖先的封国封邑附近。如后来成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刘秀，就因祖上被封的侯国在南阳（今河南南阳）而成为南阳人。东汉时也是如此，如刘备是中山王后裔，虽然家境已没落，但还是住在离中山不远的涿郡（今河北涿州）。

明太祖朱元璋将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都封为王，分居各地。明朝对宗室在政治上严格控制，不让他们离开封地，不得从事任何职业，连科举也不能考，但另一方面又给予优厚待遇，只要长大成人，都能获得爵位和俸禄。有一位亲王竟创造了一项有一百个儿子继承爵位的纪录，在诸王的封地都留下了大量朱姓人口。如明末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就住在南昌，是宁王的后代。

二、强制性迁移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首都或特定地区的经济实力，或者为了打击敌国，削弱或消灭反抗势力，历来统治者都曾实施强制性的迁移，用行政或军事手段，将某些地方的人口迁入指定地区，也包括将被贬斥的官员、俘虏、

罪犯流放安置到边远地区。这类措施相传在上古三代就已实行，夏朝最后一位国君桀就被推翻他的商朝放逐到巢。

秦始皇在灭六国的前后，不断将各国的国君、贵族、大臣和有影响的家族迁入秦国旧地和边远地区。赵国的卓氏就是以“迁虏”的身份迁至蜀郡临邛（今四川邛崃），以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自作主张嫁给司马相如的卓文君就是卓氏后裔。汉高祖继续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将六国旧族和地方豪强迁至首都所在的关中，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景、屈氏等都是迁移对象。田氏从今山东迁入关中后，不仅一度垄断了商业，还繁衍出大批后裔。由于田氏人口实在太多，只能按“第一、第二、第三”分房排列，有的后裔干脆将编号当作姓了，史书上留下了“第五仲”、“第五伦”这样的人物。

首都的建立和迁移也必然伴随着大批宗室、高官、富户从各地迁至首都，或从旧都迁至新都一带。例如，北魏曾将河西走廊和北方各地的重要人物及其家族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北方、西北以及境外的不少非汉族人口也在平城周围定居。到孝文帝南迁，就将他们全部迁至洛阳。到东、西魏分裂，一部分人又随西魏迁至长安，一些来自中亚或蒙古高原的家族以后发展成关中大姓。西魏攻占梁朝的首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北周灭北齐时，都曾将对方的要人迁入关中。隋灭陈后，陈朝宗室都被北迁。由于陈氏子孙众多，以后又得到隋朝的优待，派往各地当官，形成陈姓人口遍布的局面。明朝初年，朱元璋曾将各地富户、工匠迁入南京，到他的子孙迁都北京后，其中大部分又被迁至北京。

这类迁移中包括平民百姓及贫民、流民，如明朝建都北京后，为加强首都地区的实力，恢复华北的经济，曾多次从山西移民华北，其中一个重要的集合和出发地点就是

山西洪洞县。由于这类移民大多没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也缺乏文化，加上官方史料没有具体记载，等到他们子孙繁衍，宗族发达，要通过修家谱寻根时，已经无法找到确切的来源，只能“从众”，将一些有踪迹可追的地点当作共同的根，“洪桐大槐树”逐渐成了多数北方人的出处。现存的很多家谱都写着本族迁自“山西洪洞大槐树”。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往往会将本民族人口迁至各地，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如前秦的苻坚曾将苻氏和氐族子弟迁往各地，元朝也将蒙古人派驻各省。清朝入关后，就将满族八旗部署在全国，各省城一般都建有专供满族军民居住的满城。辛亥革命后，多数满人改用汉姓，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散处各地的满族姓氏，如关，改自关尔佳氏；叶，改自叶赫氏。

有一类迁移往往使后裔不愿记录，如明、清时都曾将一些罪犯流放到云南、贵州和西北边疆，其中有些人也留下了人口众多的家族。但对祖先这样的出身和来源，家谱中往往不愿记载，或者不愿记载迁移的真正原因。而受贬斥的官员中不乏忠臣名人，往往成为一些家族附会的对象。如海南岛一些李姓家族自称为唐朝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宰相李德裕的后代，而史书上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三、因战乱引起的迁移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南迁，都是中原地区战乱的产物。从秦汉开始，黄河中下游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唐以后虽然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除了分裂时期外，政治中心基本还在北方。正因为如此，皇室、贵族、高官、名流、富商及世家大族也都聚居于北方。但无论是异族入侵、权力斗争，还是民众暴动，往往以夺取首都为目标，所以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战乱大多发生于北方。在这种

形势下，北方民众就会迁往各地避难，其中最主要的迁移方向还是生存和开发条件最好的南方。

早在公元初的两汉之际，就有不少人为躲避战乱而南迁，最远的是从海路迁到交趾（今越南）。东汉末年至三国初前期，上百万人从中原迁至江淮之间、长江以南、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但相比之下，以后的三次南迁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以至北方的大姓几乎都有人迁移，并且在南方定居。

第一次是永嘉之乱后的南迁，发生在西晋末永嘉年间，从公元四世纪初一直延续了一百多年，南朝期间余波不绝。由于晋朝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重建，北方的上层人物和世家大族大多有人南迁，所以史书中可考的南迁姓氏就相当多：

今甘肃境内有安定席氏、皇甫氏，泥阳傅氏，略阳垣氏，武威阴氏。

今宁夏境内有北地傅氏。

今陕西境内有北地傅氏，扶风马氏、鲁氏，京兆韦氏、魏氏，天水赵氏、杨氏，陇西辛氏。

今河北境内有范阳张氏、祖氏、卢氏，高阳许氏，广平刘氏，清河张氏，魏郡申氏，中山魏氏、甄氏。

今山西境内有河东裴氏、王氏、卫氏、薛氏、柳氏，太原王氏、温氏、孙氏，平昌孟氏，平原刘氏，泰山羊氏，平阳贾氏，雁门周氏。

今山东境内有北海王氏，兰陵蒯氏、丘氏、萧氏，北兰陵桓氏、周氏，东海徐氏、何氏、王氏、虞氏，东莱刘氏，东平范氏，东莞徐氏、刘氏、孙氏、臧氏，高平刘氏、张氏、檀氏、徐氏、郗氏，青州申氏、桓氏，琅邪王氏、孙氏、颜氏、诸葛氏，乐安任氏，鲁国孔氏，任城魏氏，平原明氏，濮阳吴氏。

今河南境内有陈郡谢氏、殷氏，陈留阮氏、尉氏、蔡氏、江氏，河南褚氏、康氏、庞氏、宗氏，河内向氏、郭氏、山氏、司马氏，弘农杨氏、王氏，扶乐袁氏，济阳江氏，洛阳胡氏、王氏，南阳刘氏、宗氏、乐氏、范氏，沛国刘氏、王氏、朱氏、桓氏，彭城刘氏，汝南周氏、应氏，荥阳郑氏、毛氏，颍川钟氏、荀氏、庾氏，新野庾氏，义阳朱氏。

今安徽境内有谯国夏侯氏、桓氏，庐江韩氏、何氏。

今江苏境内有临淮陈氏、任氏，下邳赵氏。

这些大姓大多定居在长江流域和江淮之间，其中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南部最为集中。在南朝期间，尤其是侯景之乱后，有些人才继续南迁至今江西、福建、广东等地。

由于从魏晋以来特别重视门阀，家族背景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朝廷最重要的官职完全被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几个高门世族所垄断，这些家族中的白痴也能当官，即使不当官也高贵无比。所以谱牒之学倍受重视，各姓都有详细的家（族）谱，官方也要查阅谱牒来确定一个人的出身。这也导致伪造冒充和后世家谱中的附会假托，如福建现存的家谱中声称是永嘉之乱后迁入的，大多并不可信。

这期间还有些特殊的迁移，如十六国中北燕的后裔冯氏，从北方由海路南迁，在今广东定居，成为当地大族。到南朝末，冯盎娶俚（黎）族首领冼氏女为妻。这位冼夫人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地方安宁作出了杰出贡献。唐玄宗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也是冯氏的后代。

第二次是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后的南迁。安禄山在幽州（今北京）发动叛乱后，先后占据唐朝的东都洛阳和首都长安，“四海南奔似永嘉”，北方又出现南迁大潮。安史之乱平息后，北方藩镇割据，战乱不断，持续到唐末五

代，所以多数南迁人口就在南方定居。但由于政治中心仍在北方，此后一二百年间也有相对或短暂的安定，不少高官大族还是选择返回北方。这次南迁的范围比上一次更广，江西成为主要的迁入地，移民大量迁入福建、湖南，有的已迁入两广和海南岛。至此，北方的汉族姓氏几乎已遍布南方各地。

第三次是北宋末靖康之乱后的南迁。由于金兵由北向南全面推进，以后宋金边界又固定在淮河一线，加上到北宋末年人口已达一亿，南方平原地区的人口已相当饱和，南迁人口较前两次更加深入丘陵和偏远地带，更多人口迁入四川、福建、两广。临安（今浙江杭州）是首都所在，加上江南经济发达，生活优裕，吸引大批北方移民定居。来自开封等地的上层移民聚居于杭州城内，在当地形成一种以北方口音为主、带儿化的新方言。赵氏宗室除集中于杭州外，还聚居在福州等地。孔子的嫡系后裔从山东曲阜迁至今浙江衢州，繁衍至今，被称为“南孔”。

四、生存性的迁移

这类迁移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成语就形象地描述了先民为了生存而迁入荒山丛林中开垦定居的艰辛。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存压力的加剧，就是不发生战乱，大批农民也在不断地从中原迁往周边，由平原迁往山区。但在战乱以后，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口真空，或者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或者原来封禁的地区对民众开放，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这类移民往往有集中的迁出地和迁入地，因此不啻一次姓氏大迁移。如明清期间，江西是一个主要的移民输出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迁入湖广（今湖北、湖南）。到清初，四川受战乱影响，人口稀少，清政府采取鼓励迁入的政策，大批移民从湖广等地涌入四

川，形成“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流。今天四川和重庆的大部分人是当初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姓氏大多可以追溯到湖北、湖南，或进一步追溯到江西。近代东北人大多是“闯关东”的产物，是一八六〇年清政府开放东北封禁地后由山东等地迁入的。内蒙古的汉人主要也是实行“放垦”后由山西等地“走西口”迁入。他们的姓氏当然也与迁出地相同。

和“洪洞大槐树”一样，这类移民也有共同的源头，如“麻城孝感乡”（迁往四川）、“南雄珠玑巷”（迁往广州一带）、“江西瓦屑坝”（迁往安徽安庆一带）、“苏州阊门外”（迁往苏北）、“南京杨柳巷”（迁往云南）等。虽然这类地点并不一定是移民真正的祖籍，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从众”的文化认同，但家谱上的记载必须与此一致，因此不能不进行合理的编造。

五、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姓氏的“汉化”

由于中原长期处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位，对周边人口有巨大的吸引力，少数民族的内迁一直在进行。东汉以后，大批非汉族人口从北方、西北边疆和中亚各地迁入内地，有的民族基本都已移居中原，有的还成为统治民族。由于华夏（汉族）文化始终处于优势，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为了有效地掌握政权，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汉族文化，包括主动采用汉姓。而被统治的少数民族为了生存的需要，也不得不改用汉姓。他们有的就以故乡的谐音为姓，如来自中亚费而干纳盆地一带的“昭武九姓”，就根据汉译康国、安国、米国、曹国、白国等改姓康、安、米、曹、白等。有的则攀附汉族某一大姓，如匈奴的一支自称是曾与刘邦“结为兄弟”的冒顿单于之后，因而改姓刘。更多的则是将原来多音节的姓简化为单音节的姓，或双音节的

复姓。

这类改变一般是逐渐进行的，但在统治者大力倡导甚至强制推行的情况下，就会集中进行。如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的同时，下令鲜卑族全部改汉姓，本族拓跋改为元姓；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改姓，如拓跋的一支改姓长孙，达奚改为奚，丘穆陵改为穆，步陆孤改为陆，勿忸于改为于，普陋茹改为茹，贺葛改为葛，阿伏于改为阿，迄豆陵改为窦，侯莫陈改为陈，独孤浑改为杜，等等。但到了后来，其中多数家族有意无意隐去了真正的族源，反而认同于同样的汉姓了。

在南方，随着大批汉人的南迁，当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处于劣势，连数量上的优势也逐渐丧失。在民族歧视的影响下，留在原地或迁入汉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家族只能改用汉姓。为了改变自己的非汉族身份，还要在家谱中编造一段根本不存在的迁移史，证明本家族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如清代学者、贵州独山莫与俦、莫友芝父子一直被认为迁自江宁（今江苏南京），实际是本土的布依族。著名的纳西族历史学家、已故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在解放前一直自称是“桐城方氏”。

也有一些非汉家族采用了汉族中没有或罕用的姓，如蒙古族姓萨，傣族姓刀，有的将本民族的姓直接译为多音节的姓。迁入湖南桃源的一支维吾尔人姓翦，史学家翦伯赞属此家族。随着他们迁居各地，这些姓氏也有了更广泛的分布。如萨氏是海军世家，其中不少人定居在福建。

六、移居海外

东亚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朝鲜、越南曾经是中原王朝的郡县，近代以前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中文曾经是它们唯一的文字或官方语言。这些国家的一部分人口本来就

是中原移民的后裔，还保留着原来的姓氏。如朝鲜和韩国的郑、柳、车、赵、王、李等，像郑氏都以河南荥阳为郡望，与中国的郑氏并无不同。但大部分汉姓人口都是土著，他们之所以采用汉姓，就像中国南方的土著一样，只是一种文化认同。韩国有大量朱姓、孔姓人口自称是朱熹、孔子的后裔，朱姓人口还相当多。实际上其中多数是出于“仰慕华风”，并非真有血统关系。日本的汉姓也有类似情况。

从明代中叶起迁往东南亚各地和近代迁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般都保留着原来的姓氏。即使在加入当地国籍，改用当地语言的姓名后，一般还采用本姓，或者另有一个中文姓名。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一方面有大批新移民迁往世界各国，另一方面有不少海外华人寻根访祖，恢复与故乡或本家族的联系。今天，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找不到中国的姓氏了。

原载《中国国家地理》二〇〇七年第二期，第六六—七九页。

从历史地理看长时段环境变迁

历史地理对长时段环境变迁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弥补古地理与现代地理之间的空缺。如对还不存在科学观测记录的历史时期，现代地理往往束手无策，以观测数据或数据为信息来源的其他研究手段也难以进行，而历史地理却能以文献记载为主要依据，得出一些尽管粗略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下面就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西北地区的环境变迁和“全球变暖”谈一些看法。

近年来，环境变迁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西北地区的环境变迁更受重视，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国家将西部开发列为发展重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已知的历史记载显示在以往数千年间，当地的环境变迁相对剧烈，影响较大。在“全球变暖”趋势几成定论的前提下，人们往往以西北环境变迁的例子求证以往，规划未来。毫无疑问，如果对过去的环境变迁作出片面的或错误的结论，必然会影响今天的政策和对未来的规划。

比较常见的说法，是认为西北地区本来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气候适宜，只是由于人类长期的滥垦乱伐，战乱破坏，才造成水土流失，森林消失，植被稀少，所以只要人类作出努力就能恢复西北的自然环境，“重建秀美山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以往数千年间，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黄土高原和黄土覆盖的区域不可能存在茂密的森林，人类活动的确造成了局部地区的生态失衡，但沙漠、戈壁、干旱区早已存在，因此即使人类作出最大努力，也不可能使西北变成“塞上江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不同结论的产生都离不开历史地理研究，甚至是以同样的史料为依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除了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外，问题出在没有能够充分地扬历史地理研究之长，避历史地理研究之短。

历史地理可以研究长时段的环境变迁，这是中国历史地理的一项“专利”，因为中国可以找到以往两三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史料。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历史地理学很发达的西方国家都不具备这一基本条件，所以一般只能依靠最近两三百年至多数百年的史料，进行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而难以进行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因为两三百年的时间对自然地理的变迁来说，实在太短，往往不足以产生显著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史料毕竟不同于现代的观测数据或数据，存在先天不足——覆盖面不广，不具有连续性，精度不够，主观意识太强。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由于现存的史料相对较多、较密集，还有可能通过比较分析加以鉴别，而在史料本来就不多的西北地区，有些阶段或区域能收集和应用的史料实在太少，甚至只有寥寥数十字。更麻烦的是，这些史料的主观意识极强，精度却相当差。由本地人形成的记录大多缺乏横向比较，眼界有限，客观上起了误导作用。如十六国时期夏主赫连勃勃曾赞扬统万城一带自然环境为“天下”最佳，但赫连氏到过的“天下”不出今陕西关中至内蒙古南部的范围，他的判断毫无普遍意义可言。何况他肯定当地的环境的目的是为了营建新都，更多着眼于军事和政治形势。但外来者的记载也有明显局限，在他们的眼中，西北地区是夷狄、边疆、异域、荒野、战场、他乡，除了个别人有亲身经历外，一般并没有深入实地，大多得之传闻，人云亦云，或者照抄旧说。对涉及儒家经典的内容，如对黄河的发源地和上游河道，只能墨守“导河积石”的概念，用“重源伏流”进行曲解。

正因为如此，对所有的史料都必须用已知的科学原理加以检验，方能肯定其学科价值，即用于历史地理研究的作用。当然，已知的科学原理不一定完全正确，科学原理

本身也是在发展的，与之不符的史料并不一定就错了，但在不足于推翻现有原理的情况下，这类史料只能存疑，而不能贸然采用。其次，对采用的史料一定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即确定其时间、地点和程度。不能将特殊性当成普遍性，把偶然当作必然。对无法定量或定性的材料只能量力而行，不能望文生义、妄自推测、张冠李戴、勉强凑合。对受史料条件所限，无法填补的空白和无法解释的矛盾，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实事求是，把空白和矛盾留待今后或他人。

综合迄今为止的历史地理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环境变迁应该作更全面的思考：

首先，不应夸大西北地区古代环境的优越性。如果将“西北地区”的范围确定为今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秦岭以北和内蒙古西部的话，那么在以往两三千年间其总体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今天视为不利因素的沙漠、戈壁、盐碱地、干旱区、植被稀少的黄土高原早已存在。例如现存最早的地理和历史记载，如《禹贡》、《史记》、《汉书》等都已有相关的记载。在张骞通西域的公元前一世纪之前，今新疆的居民就已形成“城郭诸国”和“行国”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即一部分人以绿洲的农业生产为基础过着定居生活，另一部分人则以游牧为主过着迁移生活。公元初的绿洲格局基本延续到今天，河西走廊上的水系和绿洲体系大体没有改变。西北地区特别见于记载的森林、谷地、河流、绿洲大多一直存在到近代，但自古代起就有一定的范围，不能随意扩大，或以此代表全局。顺便指出，据新疆的地理学者告诉我，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疆的地表年径流量没有明显的变化。

应该承认，局部地区的地貌、景观的确发生过比较显著或剧烈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大多并非不可逆的，有的具

有一定的周期性。在西北发生的自然灾害也是如此。并不存在环境越来越差或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例如，在一定的阶段沙漠会扩大，但在另外的阶段绿洲也会扩大，沙进人退与沙退人进的现象往往并存。沙尘暴、流沙、连续干旱、暴雪、酷暑、严寒、大风、蝗灾等灾害始终存在，但并不一定越来越严重。在人类活动的影响减少后，局部地区的环境能自动修复。如东汉后黄河中游地区人口锐减，由农而牧，而荒，从而使植被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减少了流入黄河的泥沙，使黄河出现了近八百年的安流。又如清末的“陕甘回乱”和清朝的镇压在陕甘造成了一些无人区，不仅使植被得到恢复，长成了大片“梢林”，还使局部环境得到改善，抗战期间开垦的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

对人类活动的作用应作全面、客观的评价，不能认为环境的恶化都是人类破坏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和人口分布的改变与局部地区的环境变化存在密切的甚至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在环境脆弱，或发生不可逆变化的情况下，人为因素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在西北大多数地方原始环境本来就是相当脆弱的，能够提供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有限度的。但由于长期以来人口稀少，人口分布变化不大，产业结构稳定，人类活动对土地、草场、森林、水、燃料等资源的需求没有超出可供应、可再生或可循环使用的范围，所以直到近代，人类活动并未构成对西北地区环境的威胁，当地的环境也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逐渐恶化。但在人口的数量和对资源的需求、对环境的影响突破了平衡临界点后，环境的恶化就同步发生，甚至加速度地发展，本来可逆的变化也演变为不可逆。

如河西走廊的人口数量，从西汉后期大规模迁入中原农业移民开始，到本世纪初，一直在数十万至一百多万之

间波动。西汉后期，居延海一带成为屯垦区，但全部军民及其所产粮食的规模不超过一百万人口的需求。尽管对资源的利用存在浪费，生产方式相当粗放，却没有造成环境的恶化，地形、地貌和地理景观变化不大。但在当地人口达到数百万，农业生产的规模达到供应千万人口食粮，工业、服务业和生活用水量大幅度增加时，来自祁连山的水源自然无法满足需求。在上中游河道的水已被全部截留利用的情况下，下游河道和内陆湖沼的干涸就不可避免。地表水越来越少，地下水位越来越低，而开垦、耕种、放牧的面积却越来越大，水的用量越来越多，风沙的侵袭和沙漠的扩大势所必然。同样，作为罗布泊主要水源的塔里木河被层层拦截，河水被消耗殆尽，流到下游河道的水量还不如蒸发量，罗布泊岂能不干？塔里木河流域的居民自古以来都以胡杨树为建筑材料和燃料，这在楼兰古城和其他古代遗址中可以得到证明。尽管胡杨树生长缓慢，但只要生存环境得到维持，人类的砍伐量又低于新增的积蓄量，正常的更替还能维持。随着人口激增（主要是外来移民）引发的大规模砍伐，加上下游河道干涸造成的区域性干旱，胡杨树的减少以至绝迹也随之出现。近年来政府投入巨资，将塔里木河水重新引入罗布泊，如果能保持下去，那么罗布泊的恢复指日可待。

所以，西北地区改善环境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恢复原状，该沙漠的还是沙漠，戈壁就是戈壁，有些地方是胡杨林，有些地方只能是沙棘或骆驼刺，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荒则荒，这就是西北的“秀美山川”。本来是“浩浩乎平沙无垠”，“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地方，难道一定要变成“风吹草低见牛羊”或水稻丰产的“塞外江南”才行吗？

从历史地理研究获得的成果看，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

未来，调节人口的数量和布局，改变生产和生活的方式，维持水资源的平衡是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切实可行的。而挖肉补疮式的引水工程，不计成本和后果的抗沙方案，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只会加剧对环境的破坏。既然可以利用的水资源已接近极限，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减少水的用量。节水和调节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规模和方式，改变人口分布的结构，都能使同样数量的人口和同样的生产规模用水量减少，而不影响生活和生产水平的维持和提高。如人口的居住集约化和城市化，推广节水型作物，缩小农业规模，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如果人口的规模无法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就得考虑有序的外迁，或者由区域外调入必要的资源。谁也不希望绿洲变成沙漠，或者出现第二个“罗布泊”，但如果真的不可避免，就没有必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坚持“人定胜天”，“沙退人进”。

时至今日，“全球变暖”似乎已成定论，这不仅是联合国组织的各国数千位科学家宣布的结论，也已获得大多数国家政府的肯定。但从历史地理研究的结果看，对全球继续变暖的趋势是很值得怀疑的，至少目前的结论无法自圆其说。

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气象观测站能积累两百年的连续资料，能有一百七十年左右的才五十个点，其中四十五个集中在西欧。而此前或西欧以外的地区，并没有比中国历史时期留下的文献记载中更精确的数据。比如中国，最早的气象观测站是上海天文台，开始于一八七二年，即使观测数据完整并全部保存，也不过一百三十五年。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气象学家对两百年前发生过的气候变化，并没有比对中国以往数千年间的气候变化更详细、精确的资料，也没有更高明的结论。如此短的现代观测资料，对十几年至数十年的变化周期或许能起归纳、总结或预测的作用。

但对百余年或两百年以上的周期，连完整的描述都有困难，凭什么预测呢？以往一个世纪间全球的气温普遍升高固然是事实，但仅仅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就断言未来的气温肯定会持续升高，而不会出现其他可能，未免太大胆了！

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已故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对中国七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发表过重要的论著。他的主要论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文献资料，包括用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原理复原以往的气候数据所需要的大量间接的史料。在竺可桢的基础上，中国当代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又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以往的四五千年间，中国的气候发生过多次波动，出现过几次由暖到寒、由寒到暖的变化，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在商代后期（约公元前十三世纪前后）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已为多重证据所证实。中国历史上的温暖期或寒冷期的年平均气温都超过近代气象观测资料所获得的上限或下限，也就是说，从中国气候变迁史的角度看，最近一百多年间的变化都在“正常”范围之内。现在一些新闻报导往往称某地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温或最低温，这是无知和不负责任的，至少应该将“有史以来”改为“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但在观测记录较长的地方，例如上海，真要打破这个纪录并不容易。前几年夏季的持续高温似乎证实了全球变暖，但实际上，总体上还没有打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纪录，更不用说真正的历史纪录。

如果全球变暖真的是由温室气体的排放引起的，那么，且不说在地球上还没有人类或人类活动几乎不造成任何影响时已经出现过无数次冷暖的变化，就是在中国商朝，是什么造成了比今天还高的年平均气温呢？那时根本没有工

业，商朝的人口不会超过一千万，难道那时排出的温室气体比人口增加了一百三十倍又拥有巨大的工业化规模的中国还多吗？

即使将人口数量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中国以往的气候变化与人口数量的变化也不是同步的。公元初汉朝的人口有六千多万，九世纪前期的唐朝约八千万，十二世纪初的宋朝达到一亿，十七世纪初的明朝接近两亿，十九世纪中叶清朝人口突破四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超过六亿。如果人类本身、他们从事的农业生产规模和他们饲养的牲畜都会产生温室气体，并且是造成气温升高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中国的年平均气温至少应该是逐渐升高的，何至于出现多次波动？又为何与人口数量的变化没有相应的比例关系？

由于原始资料的局限，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也还无法圆满地解释气候和环境长时段变迁的原因和规律，但足以质疑现在视为定论的“全球变暖”预测和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的结论。

原载《陕西师大学报》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二〇〇七年九月，第五—八页。

人文千秋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学术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的国际化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大步进入国际学术领域，部分学科已经初步实现国际化，与国际学术界融为一体。但并非所有的学科或所有领域的研究都必须国际化，或者可能国际化。国际化也不是每一个学科或每一研究领域的第一要务，更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实现国际化的途径和要求也不尽相同，例如有的学科是以走出去为主，而另一些学科则应吸引别人走进来，别人没有兴趣，或仅有兴趣却没有能力，因而一时门庭冷落，是很正常的。

就中国历史地理而言，其国际化的途径和要求与其他学科并无二致，但有其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丰富而延续的历史文献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进行长时段历史地理研究的国家之一，在不少方面中国是唯一的。

一、中国丰富的、延续的、多样的历史文献，使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进行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国家，其研究成果为了解世界早期历史地理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或比较对象，因而使这些史料具有世界性意义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

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十七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数据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就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又扩大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研究资源，也留下了不少千古

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级地形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六千多万人发展到一八五〇年的四点三亿人，又增加到一九五三年的六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五十六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产生了周穆王、西王母、昆仑山的传说。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开通后，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

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 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升（Thomas Pereira）、罗雅各布（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数据。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基本已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文、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八千多种，

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数据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二、中国的历史文献使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可以包括历史自然地理，从而对地球环境长期的演变作出更合理的解释，有利于更准确地预测未来。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可以作为研究历史自然地理的基础，为人类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的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一百七十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五十个，其中的百分之九十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两百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

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十一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一百年的数据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一百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一百七十年的数据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中国，能够积累一百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数据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数据是从一九五八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十四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数据，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十六至十一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二十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数据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

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也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五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八十三万。而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四万人，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的最终死亡人数估计是十万左右。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三万六千立方米每秒，十二天洪水量一百一十九亿立方米，相当于五百年一遇。而二十世纪内最大的一九三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是二万二千立方米每秒；一九五八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二万二千三百立方米每秒，十二天洪水流量八十六点八亿立方米，只相当于五十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根据从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数据，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以及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作出贡献。

三、中国历史地理学如何国际化

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到今天，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

地位呢？对此，既不应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即就对中国历史地理现象的研究而言，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最多、水平最高。如前所述，中国的历史文献得天独厚，中国的研究者在语言、文化背景和实地考察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我曾经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西欧的同行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我们能进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感到很惊奇，因为他们基本上只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原因很简单，他们能利用的历史文献年代较短，无法对长时段的自然地理变化作研究，而较短时间内的自然地理状况与当代差别不大，基本可以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

中国一些重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有关环境和历史气候变迁的论著等，以及我们正在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都达到了当代世界最高水平。但由于这些论著都是以中文发表，除了地图以外，其他还很少为国外所知，也无法进入国际检索系统。例如，近年国外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的气候变迁与朝代兴衰的关系的论文可以进入《科学》、《自然》之类一流学术刊物，但实际上中国学者早已在国内发表过类似的论文。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成果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除非它们正好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意义，否则即使译为外文，也未必能引起外国学者的兴趣。

以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标准，我们就不能说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因为理论和方法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还应有普遍的适应性，才能为国际历史地理学界所承认。

中国历史地理学固然有其鲜明的特色，并且主要服务于中国的学术界和社会。但如果要贡献于全人类，要为

国际学术界所承认，就必须走向世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英语仍然是国际最重要的语言，随着信息科学和互联网的发展，其影响将越来越大。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发展与国际学术界的信息交流，并且以英语发表重要论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邀请过不少外国学者来访，参加我们主办的学术会议，不少同仁出访外国，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但欧洲和美洲的历史地理年会我们基本没有参加，国际性的《历史地理学报》（Historical Geography Journal）几乎没有发表过中国学者的论文，大陆学者基本没有用英语出版过高水平的专著，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但国际化是双向或多向的，国际学术界同样需要实现它们的“国际化”，而这个“国际化”就应该包括主动了解中国并与中国学术界交流在内。特别是那些已经认识到中国历史文献重要性的外国非中文的研究者，他们不学中文，只依靠运用翻译成外文的数据，能准确理解史料的含义吗？能取得一流成果吗？纯粹以中国的地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如果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没有新的突破，有必要以外语发表吗？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同样应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完全没有必要片面强调“全方位”。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第B3版。

书系

人文千秋

中国人的信仰

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常有人问起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当他们得知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中国的实际，并且至少已经存在了两三千年。不过他们大概并不了解，虽然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信仰。

近来儒家学说得到主流肯定，于是有人声称中国人在历史上都信奉儒家学说，信仰孔孟之道。翻开历史，表面上似乎的确如此。特别是宋元以降，上至君相鸿儒，下至吏员生童，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崇奉孔孟，讲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实际上，真正的纯儒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打着孔孟的旗号，内心什么都信，佛道鬼神，打卦算命，因果报应，只要于自己有利，或者有一个能自欺欺人的解释，都可以接受，都不妨一试。

至于在民间，尤其是在汉族地区，一般人佛、道、儒都信，天、地、君、亲、师都拜，还有极其广泛的实用性、地方性崇拜。如各地有土地神（或称土地公公）、城隍，家门口有门神，灶头有灶神，理财有财神，科第有魁星，婚姻有月老，求子有送子观音，驱蝗求刘猛将，养蚕祝蚕花娘娘，治蛟找许真君，航海靠妈祖，还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河神、海龙王、阎罗王、玉皇大帝等各司其职，简直无所不包，应有尽有。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无不有相应的神或鬼督察照料，都可以通过虔诚的谟拜和丰盛的贡品得到相应的庇佑或化解。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内容各异，这些崇拜的核心就是对因果报应的信仰，即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说一时见不到效果，那是因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所以祈求者完全可以“今世不修修来世”，在下一辈子得到弥补。

中国早期的鬼神信仰、多神信仰没有能发展成宗教，

本土产生的道教先天不足，外来的佛教越来越与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结合，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君主制度过于强大。皇帝作为“天子”体现了天命和天意，天则通过太阳黑子、日蚀、彗星、地震等各种天象和灾异显示自己的意图和警告。皇权与佛、道、儒、鬼神早已合为一体，即使偶有冲突，如官府对某些民间崇拜的禁止、对某些宗教活动的取缔，也没有影响这种广泛的结合。改朝换代或皇权的盛衰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反而会产生新的方式，或者使之更加广泛。例如，满族入主中原后，不仅全盘承接了明朝的格局，还密切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加封了班禅额尔德尼。对外来宗教，只要它能服从皇权，主动适应中国的状况，就能得到容许，并为进一步传播获得空间。如利玛窦等擅自修改教规，宣称天主教与儒家学说暗合，容许信徒保持对君主、祖宗、孔子等诸多偶像的崇拜，所以不仅能在明朝生存，还赢得包括大学士徐光启在内的一批高官和社会精英的皈依，使天主教在中国有了传播的基础。

一种信仰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得到长期延续，证明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和民众的需要，无疑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传统的延续起着积极作用。尽管从秦始皇开始，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并逐步巩固，越来越具体和深入，但直到民国年间，政治权力的作用一般仅延伸到县一级，在发达地区才能延伸到部分镇、乡。法律条文堪称严密，但也无法贯彻于基层。中国式的信仰恰当地填补了这些空白，与宗族、乡绅结合，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那时的乡村、山区、边远地区根本没有任何行政或军事机构，有的连保甲、乡丁一类治安人员也没有，更没有无所不在的警察和探头，要杀人越货易如反掌，而且几乎不会得到追究，但由于多数人相信因果报应，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即使盗匪也不会过分，

如谋财不害命，劫财时给苦主留下保命钱。又如孝道得以长期维持，表面看似乎是儒家学说和统治者倡导之功，实际上是信仰的震慑作用。不孝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更会招致天罚。我幼时还不止一次在雷雨时听到老人的警告：不孝父母会被“天打煞”（雷击而死）。有时听到绘声绘色的传闻：某村某人当场被雷击劈死，背上显出乌黑的“不孝”两字，接着就是该人具体的不孝行为。所以每次打雷时，都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惧。连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不良习惯，也会受到上天的警告，如不敬惜字纸、糟蹋粮食、说话不老实等。

由于报应可以追溯到前世，延续到来世，这种信仰也淡化了社会不公，缓解了贫富对立，调和了官民冲突。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和苦难可以解释为本人前世罪孽所致，或者是因此而形成的“命”中注定。他人之所以拥有财富、权力、地位、幸运，是由于祖上积德或本人前世的孝行善行。要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途径是从此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为本人修来世，为子孙积德。否则，下一辈子依然做牛做马，不得翻身。而那些奸臣、贪官、为富不仁、怙恶不悛的人即使能逍遥法外，生前享受荣华富贵，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并且比人间的刑罚更加严酷——人间只有打板子、上夹棍、砍头，最厉害的才是千刀万剐（凌迟），最终不过一死，而阴间会有十八层地狱，钉板、刀山、火海，只要想得出的刑具刑罚应有尽有，而且能一遍遍地用，死了再死；实在不够，让你转世为牛马，再来一个轮回。

其实早在先秦时代，学者已经明白：“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统治者再有权威和暴力，总会有人敢于对抗。人网再密，总有漏洞。唯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神力无穷，没有哪个人逃脱得了。所以有时、有人明知这些不过是吓唬人的鬼话神话，甚至是自己编出来的，但还是要以假乱

真，弄假成真，大多是为了善良的目的，以便对潜在的罪犯产生心理上的震慑，使民众特别是孩童对“天地君亲师”、法律、伦理、传统、自然现象都保持敬畏。

神道设教固然不可避免造成迷信，甚至导致愚昧，但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即使是在天灾人祸频繁、分裂割据不断、行政机构瘫痪、鸡犬之声绝迹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还不愿或不敢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尽量避免“伤天害理”的行为，或者还会“良心发现”，主要还不是靠孔孟之道，而是神道设教的效果，使因果报应的观念深入人心。

一旦这些观念都被作为封建迷信破除，又没有新的信仰替代，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用之于政治斗争或理论争论或许能鼓舞信心，振奋精神，增加胜算，让普通人当作处世原则却会造孽无穷。千岛湖事件的凶手在抢劫了数十名台胞的财物后将台胞游客锁在舱内，游客没有反抗，因为他们认为劫匪会遵守“谋财不害命”的底线，将他们锁入舱内不过是让他们无法报警，增加其逃遁的时间，谁也想不到劫匪居然杀害全部游客。那个劫匪年纪不大，据说当过兵，属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果他信鬼神，并稍有敬畏之心，绝不会下如此毒手。

政治家并非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政治信仰的对象不能是神，只能是主义或领袖。但主义和领袖是具体的，不可能十全十美，更不可能万能。如果说主义还能通过不断的修正或发展使之长期保持神圣的话，领袖毕竟是人，总不能与时俱进到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还得始终拥有常人所没有的能力和魅力，于是只能将领袖造成神。记得我幼时唱的歌，还是“亲爱的父亲毛泽东，同我们一起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学

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他还是父亲，是可以学的。但到了一九六六后，唱的已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甚至是整篇林彪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政治信仰的确能起作用。且不说革命中的千辛万苦，就是内部的路线斗争或从未间断的什么斗争，按照常理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但信仰不需要求证，只要坚信其正确就行了。主义不会错，错的是有人没有按主义办。领袖不会错，错的都是背着领袖干的。凡自己的想法与主义不合，那肯定是自己错了，知识分子要检查阶级立场，工农出身者得提高理论水平。某杰出的隐蔽工作者是中共、军统、汪伪三料间谍，功勋赫赫，但解放后还被当作汉奸文人，长期关押，晚年方获平反。他的经历常人难以想象，要没有信仰，早精神崩溃了。据说他临终前已精神失常，可见要将政治信仰坚持到底实在不容易。

政治信仰也不容易恢复。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虽然已是中学教师，还是与其他“革命小将”一样，决心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什么事都闻风而动，唯恐跟得不紧。《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不仅夜以继日贴别人大字报，还要引火烧身，鼓励学生贴自己大字报。但以后学校越搞越乱，社会上更乱，出现了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乱象怪事。以我当时的水平，也知道那些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想不到有些事得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肯定。面对报上的白纸红字(当时最新指示大多以红色印刷)，我还是认为毛主席不会错，肯定是下面的人隐瞒真相，欺骗了毛主席。但毛主席明察秋毫，怎么会上别人当呢？这种想法刚一露头，我马上警觉起来——这不是怀疑毛主席吗？多么危险！可是等到林彪“自我爆炸”，再听到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中传达时，我终于动摇了对他的信仰——既

然一九六六年就识破林彪阴谋，为什么还是让他干那么多坏事，还通过《党章》将他确立为接班人？既然洞察一切，怎么还让他出逃外蒙古？万一他不摔死，岂不是拿全国人民开玩笑吗？将毛主席当成神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

而且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政治信仰只能作用于政治家、政党骨干或少数有特殊政治兴趣的人，对多数民众是起不了作用的。

伦理道德的信仰更加理性，可惜也只限于少数社会精英，连普及到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更不用说一般民众。儒家强调慎独，一方面说明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证明要维持伦理道德的信仰多不容易！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简便易行的还是宗教信仰或准宗教信仰，如中国以往的神道设教、因果报应等。因为再强大的政党和政府都无法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完全消除社会不公，也不能使每一个人避免不幸遭遇；再发达的科学技术也不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切未解之谜；再英明的领袖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不犯错误；再先进的理论也不可能指导任何实践。但宗教和神是全能的，物质不能精神能，今世不修来世修，此岸办不到的事在彼岸办得到，其他信仰能取代吗？

原载《SOHO小报》二〇一〇年第七期，第四二—四三页；第八期，第三〇—三一页。

人文千秋

城市品性

品性，也可以称为品格，本来是用来衡量人类的一种尺度或标准，以后也用之于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或物质的产物，如艺术品、文学作品、学术成果、建筑物、景观等，自然也能包括城市。

我的理解，所谓品性，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品，一般可以理解为类型和属性。在比较、评价、鉴赏的过程中，只有同一类型或相近类型，才有实际意义。一是性，某一事物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具体内容及其具体的或抽象的表现。

就城市而言，品，主要体现在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上，如政治型、经济型、文化型、宗教型、军事型、休闲型等，或者两种及多种类型的综合型。不同的类型及其相应的功能，是决定城市之品的基础，也是城市之性赖以存在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城市方能产生和发展其独特的性。

一

在城市产生之初，它的品性只能体现在与非城市的差别，因为城市本身几乎不可能立即产生自己的品性，在城市内部也不可能马上产生品和性的基础。

早期的人类是群居的，否则无法生存和繁衍。或许当时也有高人、异人离群索居，或者在生产或迁徙中掉队落单，但除非他们重新加入群居、形成新的群居，就不可能生存，更无法繁衍。每一群体都必须自给自足，或者通过争夺其他群体的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只有当某一群体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有了一定的公共积累，产生了一定的共同需求时，城市才有可能产生。

在中国，早期的城市被称为国。所谓国，其本意是一位手持戈的人在守卫着自己的一片土地，并且用一圈围墙加以守卫。这个“国”字很恰当地显示出早期城市的功能。

实际上，在城市产生之前，聚居的人群中已经产生了一些共同的需求，如祭祀、防卫、管理等。但只有在城市形成之后，这些功能才有了专门的设施和人员。例如祭祀，一方面必须有一个共同使用的场所，另一方面，也要保证这一场所有足够的人数，自然需要有专人司其职责。再如防卫，一般已建起城墙，有的还开凿护城河，或建起类似的工事，有了专职的守卫人员。这些花费都得由城市里的人口负担，而城市人口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物资也得依靠自己生产或获得。尽管城内还保留着一些农田、菜园，但另一部分或大部分是由处于城外的郊人或野人生产的。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口可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力于经济、文化、军事、礼仪等活动，为城市的功能化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说，早期的城市毫无例外地具有一些共性的话，它们从一开始也存在自己的个性，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例如，祭祀的方式、崇拜的对象和程度、祈求的目标和结果，都会因地而异，因人而异。时间一长，这些差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但在一座城市就是一个政治实体，城市间互不统属的条件下，每座城市的基本功能并无二致，只有管理模式的不同和控制程度的强弱。

但当一个政治实体不止拥有一座城市时，或者当不同的城市结成一个实体时，城市之间逐渐产生了功能上的差异，即在保证城市的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产生了不同的附加功能。开始时，这种差异只限于政治地位，即统治和被统治。如夏、商、周的王都与各诸侯的都城之间，前者是天下共主所在，是统治各诸侯国、接受各国朝贡的，必须具备这样的功能；而后者是接受统治的“王土”，必须具备定期向天子贡献的功能。

一些较大的诸侯国已拥有不止一座城市，在它们内

部，也出现了城市功能的差异。都城具有两重功能，即在接受天子统治的同时，统治本国的其他城市。其他城市则必须具备接受都城统治的功能。到战国后期，随着郡县制雏形的形成，已经出现了不同等级的行政中心城市，相互之间存在管辖和被管辖的关系。经过秦始皇的强力推行和西汉期间的巩固，郡县制度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和城市系统：首都——郡级治所（诸侯国都）——县级（侯国、道、邑）治所。随着行政区划制度的变迁，具体的层级和名称因时而异，但这一城市体系沿续至今。首都、三十多个省级城市、两百多个市（省会、省辖、地级）和两千多个县（市）级城市构成了中国城市的绝大部分。

当一个政治实体内部拥有不止一座城市时，在行政中心之外的城市，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如依托祖先或名人陵墓、名山大川形成祭祀性城市；因地处边防或战略要地，形成军事性城市；因水陆交通路线交汇，有道路通往其他重要城市，形成交通枢纽城市；因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而形成工商业城市；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士人的聚集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使所在城市成为学术中心。

这些功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所以国都、省地一类大城市往往同时具有不止一项功能，就是中小城市，除了作为区域行政中心以外，也可以具有某项其他功能。如战国时齐国的都城临淄自然是齐国的政治中心，而且由于齐国实力强大，影响力所及远届东部各诸侯国，实际上还是太行山以东的政治中心。临淄人口多至十万户，有数十万人，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称得上是一座工商业城市。稷下学宫的设立吸引了各国的一流学者和大批士人，使临淄成为人才荟萃，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中心。作为国都，临淄的军事功能也相当完善。由于历代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长期沿用的首都往往是功能最齐全的大城市，同时发挥着

多个全国性中心的作用，西汉、隋唐的长安，东汉、北魏的洛阳，元、明、清的北京莫不如此。

有了不同的功能，城市才能显示出不同的品，才可能分为不同的类型。品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复合的或综合性的。

二

同一类型的城市不仅会有量的差异，更会有质的差异。所以，不同品的城市自然有不同的性，但相同品的城市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性。品相对稳定，性却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品可以大致分类，性却难以划分，因为既有客观标准，更有主观标准。

同样功能的城市的性之所以不同，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硬件和软件。前者是指城市基本的自然环境和建筑设施，后者是指城市里的人和那些人维持着的传统。例如中国古代的首都，必定要根据建都的基本原则选定城址，如“天下之中”、“四塞之地”、“上游形胜”、“虎踞龙盘”等。还得根据自然条件的缺陷和实际需要，建造城墙、关隘、运河、道路等，以及宫殿、园林、衙署、市场、寺庙、兵营、民居等。与此相适应的人口是皇室、贵族、宦官、文武官员、将士、居民、商人、工匠、僧尼等。这些人中间有不少是首都特有的，或者是因为首都而特别多，而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更是其他城市所无法等量齐观的。就是普通百姓，由于生活在首都，也会享受到一定的优待，形成优越感。首都的地位一经确立，还会吸引大批流动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会转化为移民。一个长期延续的首都，必定会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些因素构成了首都城市的品性，其中任何一项因素的变动都可能影响其他因素，也会改变城市的品性。

不仅如此，品性中的一些因素具有客观标准，硬件方面的基本都可以定性并定量，软件方面也有一部分可以定性定量，另一部分则只能定性而无法定量，有的则既不能定性更无法定量。对同一因素，不同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印象和感觉，产生不同的记载和评价。如对同一座长安城，皇帝、大臣、下僚、将军、士兵、贵族、平民、富户、穷人、士著、流民、汉人、胡人等会有不同的感觉，金榜题名的进士与名落孙山者之间、不断升迁的大臣与受到贬斥的官员之间、自由移民与被强制安置者之间，绝不会感知同样的景观，即使他们同时处于同一城市，他们的满意度、幸福度、适宜度会有天壤之别。

其他功能的城市，如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祭祀、旅游等类型也是如此。

所以，城市的品可以复制，性却无法复制，也不易移植，要复制一座品性完全相同的城市则绝无可能。汉高祖刘邦为了取悦于他父亲，曾将他故乡丰邑完全复制到关中，将这座新城命名为新丰，还将丰邑的居民和他们家产，包括喂养的牲畜宠物，全部迁至新丰。新丰建得惟妙惟肖，据说居民迁入时将从丰邑带来的鸡犬放在路上，它们就会找到主人的家和自己的窝。但以后新丰与关中的其他城市并无二致，可见丰邑的品性早已不复存在。其实原因很简单，刘邦可以将新丰的建筑和城市设施造得像丰邑一样，却无法改变新丰所处的关中的自然环境；刘邦可以将丰邑的居民和牲畜全部迁至新丰，却不能使他们和它们的后代不随乡入俗，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

即使城市的品不变，性也多变。但如果外界条件比较稳定，城市的基本品性也能得到延续，并且形成传统。品是性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旦城市的功能转变、增加或丧失，性也会随之变化。但性的变化未必与品同步，稳定的性往

往会滞后于品的改变，特别是在城市居民比较稳定的条件下。

三

由于城市的品性更多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因而又被称为城市的文脉。

所谓城市文脉，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传统，而不是仅仅指当时存在的文化，因此与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续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一方面是指现在的文化，一方面是指过去的文化，如果这两者是延续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如果两者是不同的，或者以往有过这样的不同，这种传统就中断了，难以形成文脉。一座城市，尽管现在的文化很发达，如果过去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要形成文化传统必定要假以时日，形成自己的文脉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绵延。

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并且得到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有可能推到极致。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记忆，提供调节人地关系和适应变化发展的经验。

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保持不变的功能。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或者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强制改变，或者被破坏殆尽，延续数百上千年的文脉就此中断，岌岌可危。例如，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建康（建业）作为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了三百多年，其功能基本不变，文脉得以延续。但到隋灭陈时将建康城彻底毁灭，将地区行政中心迁往别处，当地人口几乎全部外迁，这座六朝古都从地图上消失了。尽管以后的南京是在这片

土地上重建的，除了战火毁灭不了的古代遗址遗物外，还有多少六朝遗风？太平天国战争不仅破坏了南京城内外的大批古代建筑和文化设施，还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死亡或外逃。战后的南京虽逐渐恢复，但城内人口已以来自苏北、淮北等地的移民为主，城外也成了河南等地移民的乐土，少数幸存土著人口岂能承担延续文脉的重任？

又如，一九四九年建都北京，在时隔二十二年后这座城市重新恢复首都的地位。元、明、清、民国的首都的基本设施当然不能适应新中国首都的功能，本来可以通过新建和适当改造来实现，但在革命的“不破不立”思想指导下，却选择大拆大建和彻底改造的办法。领袖希望站在天安门上看到烟囱林立的愿望又使首都增加了经济功能，并提出了要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具体目标。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构成北京文脉的人和物都成了批判、打倒、驱逐和毁灭的对象，文脉焉能不断？

没有文脉或文脉断绝的城市并非没有品性，只是不可能有高雅的、深厚的、愉悦的、稳定的品性，甚至不可能具有与本身相适应的品性。

四

城市的主人当然希望它具有自己期望的品性，那么首先应该确定它的品，即从城市功能的定位开始。任何一项功能，都需要最低限度的物质条件和实施这项功能的人。但是要提高这项功能，使城市形成令居民满意的品性，就不能局限于物质条件，也不能只保证居民的温饱，而应注重城市在物质和精神上、硬件和软件上的全面发展。

对于一座已经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的城市，保持并改善其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延续城市的文脉。这不仅需要保留必要的物——环境、建筑和设施，更离不开能够

传承文脉的人。

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功能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原有的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加上中国有限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如果单从物质条件的需求看，城市多数原有设施的确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由于长期不重视城市建设，不重视民生，过早地剥夺了私有住房，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面临住房紧缺破败、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困难。从经济效益看，大拆大建，增加建筑密度和容积显然更有利，也能更快满足居民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像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和弄堂，即使以往有千好万好，那也既不可能成为未来民居的主要形式，也不会得到多数人的喜爱。城市居民反拆迁的抗争，大多不是对文化传统的守护或对旧居的依恋，基本上都是经济利益和社会公正的诉求。

但为延续文脉着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旧物，才能保持城市的历史记忆，才能延续城市的品性。因为这些物曾经是城市多数居民的住所或活动场所，也是当时的文化和传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如果让城市的后人仅仅凭着文字和图像去想象，大多数人不可能理解生动的历史，留下深刻的记忆。何况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居民的精神生活要求会不断提高，对国家和城市的记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记忆中还包含着我们今天不一定知道或理解的抽象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原物的保存才能给后人以破解或汲取的可能。即使是完全属于封建、迷信、腐朽、反动、罪恶的旧物，也有必要适当保留一些，以便让后人了解历史的另一面。

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传承文脉的人，有了人脉才能有文脉。四合院和胡同、石库门和弄堂里必须有一些原来的居民，或者熟悉原来生活的居民后人，真实的历史和生

活并非完全可以用文字或图像记录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居民完全有选择自己的居住方式和职业的自由，如果需要他们为了传承文脉而发挥特殊的功能，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他们合理的补偿和奖励。对一些传承特殊技艺或记忆的人，政府要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不断改善，而不能让他们去市场竞争。

这些物和人的保留必须用地方立法的方式加以保证，通过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而不能根据长官意向随意变化，也不能因为主管官员的更迭而得不到稳定。

而要做到科学决策，就离不开一批专门的研究人员，需要他们主要从事本城本地历史和文化的深入发掘、抢救、整理、研究和必要的普及。在城市新功能的建设和新文化的创建中，也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用他们的成果，使本土传统得到可能的体现，本土文化的元素渗透在新文化之中。

守旧与创新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城市品性在延续中改善，在继承中更新。居民既是城市品性的守护人，又是其批评者、改变者、塑造者。优良的城市品性使居民得到享受和陶冶，而高素质的居民也使城市品性得到完善和升华。

原载陈燮君编《城市足迹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十一月，第二五九（九—一二）页。

作者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一九五七年转学上海，一九六三年高中毕业后接受师资培训，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八年当中学教师。一九七八年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先生，一九八一年获硕士学位，留校工作，一九八三年在职获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晋升副教授，一九九一年晋升教授，一九九六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一九九九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至二〇〇七年，同年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至今。其间于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年赴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作访问学者，一九九二年至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作访问学者，一九九四年至英国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任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并多次赴香港、台湾任客座研究员或教授。二〇〇〇年十二月至二〇〇一年参加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去南极长城站，二〇〇三年二月至六月参加“走非洲”拍摄组考察北非、东非八国，二〇〇六年秋“重走玄奘路”行经中亚、南亚五国。从事历史地理、移民史、人口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主持“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研制。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教育部图书数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学会副会长、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

著述年表



1. 《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〇八页。
2. 《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二月，一六五页；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五月，一八五页；《中国统一与中国分裂》，《普天之下》韩文译本，韩国首尔：新书苑出版，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八一页。
3. 《一三六八—一九五三年中国人口研究》，〔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九二页。
4. 《亿兆斯民》，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四九页。
5. 《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四一一页。
6. 《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一一页；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一八四页。
7. 《移民与中国》（与曹树基、吴松弟合著，第一作者），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四六页。

8.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华文库，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八一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四七页。

9. 《简明中国移民史》（与曹树基、吴松弟合著，第一作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九一页。

10. 《滔滔黄河》，沧桑神州——中国历史地理谈丛，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一七七页。

11. 《泱泱中华》，沧桑神州——中国历史地理谈丛，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一八四页。

12. 《生生不息的中国人》，历史爱好者丛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北京：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一四〇页。

13. 《往事和近事》，读书文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〇〇三年八月，三八六页；二〇〇七年五月，三五三页。

14. 《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四〇二页。

15. 《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六〇六页。

16. 《天地玄黄——葛剑雄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二二一页。

17. 《泱泱汉风》，长春：长春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台北：年轮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六月，二九七页；韩国首尔：Humandom Coperation，二〇〇八年，四七二页。

18. 《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六八页。

19. 《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七〇页。

20. 《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一月，一九三页。

21. 《看得见的沧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八月，二九三页。

22. 《葛剑雄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八二页。

23. 《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九年六月，一五七页。

24. 《碎石集》，北京：学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七月，三二八页。

25. 《行路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七月，三一二页。

26. 《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一八五〇年以来）》（与侯杨方、张根福合著，第一作者），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五二页。

27. 《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二月，三二五页。

28. 《剑桥札记》，厦门：鹭江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六月，一四七页。

29.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四〇七页。

30. 《历史学是什么》（与周筱赟合著，第一作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八月，二五二页，二〇〇七年十月，三〇九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二〇〇三年，二六一页；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四一页。

31. 《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中国文库·史学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六八三页，二〇〇五年一月，六八三页。

32. 《临机随感》，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月，三二一页。

33. 《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厦门：鹭江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五月，三四四页。

34. 《禹贡传人：谭其骧传》，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三四一页。

35. 《中国移民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六月，三九五页。

36. 《走非洲》，北京：作家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五月，三〇八页。

37. 《梦想与现实》，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六月，三〇四页。

38. 《黄河》（与左鹏合著，第一作者），河流文明丛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六月，二三八页。

39. 《冷眼热言——葛剑雄时评自选集》，长春：长春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六二页。

40. 《葛剑雄演讲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八一页。

41. 《大汉王朝》，长春：长春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三月，二三五页。

42. 《人在时空之间》，北京：中华书局，二〇〇七年六月，二七三页。

43. 《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八九页。

44. 《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二〇〇

七年八月，二三三页。

45.《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七月，二五一页。

46.《读不尽的有形历史》，长沙：岳麓书社，二〇〇九年五月，一九九页。

47.《人在时空之间二集》，北京：中华书局，二〇一〇年一月，二一九页。

48.《后而立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八二页。

49.《疆域与人口》，“我们的国家”丛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一七四页。

50.《从此葡萄入汉家——〈史记·大宛列传〉》，台北：大块文化出版公司，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三九页。